

# 炎黄春秋

第 **3** 期  
2010年

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

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

东欧剧变访波兰



## 目 录

一家言	
4	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 ..... 董 健
亲历记	
8	东欧剧变访波兰 ..... 苏双碧
12	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 ..... 刘崇文
18	孩子眼中的文革岁月 ..... 张 刃
求实篇	
23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 ..... 阎长贵 杨银禄
24	“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 ..... 资中筠
26	对资中筠文章的几点补充 ..... 何 方
春秋笔	
28	《海瑞罢官》: 尚未披露的史实 ..... 李 逊
34	“飞夺泸定桥”的人和事 ..... 彭查理
40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 ..... 李继华
46	三民主义新旧说的政治背景 ..... 匡萃坚
往事录	
49	“右派”省长沙文汉 ..... 泰 栋、尚 之
55	周恩来秘会左尔格 ..... 杨国光
60	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 ..... 刘立强
64	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 ..... 苗振亚
群言堂	
68	公民教育三人谈 ..... 丁 东、智效民、赵 诚
品书斋	
72	陈明守护丁玲的尴尬 ..... 徐庆全
77	“合理想象”的妄言 ..... 王海光
文荟苑	
78	与江青有关的两本小说 ..... 小 鹰
82	艺术使我们如何面对苦难 ..... 高全喜
古今谈	
85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 雷 颐
编读窗	
87	我的一段回忆 ..... 任振邦

顾 问: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郎福呈]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 [yhcqfxb01@126.com](mailto: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6.90元

# “国进民退”的危害和根源

• 杜光

## (一)

回顾 2009 年的我国经济，不禁产生喜忧交加的感觉。喜的是在短短一年内就克服了世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继续保持了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的繁荣，使国民经济转危为安；忧的是加快了“国进民退”的步伐，扩大了国民经济中的垄断成分，削弱了民有经济，损害了市场经济，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倒退。“国进民退”将作为 2009 年经济领域的主要特征，写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为了救助因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困难，国家拨出 4 万亿元，主要用于基本建设投资，被人戏称为打造“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加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 10 万亿元的银行贷款，绝大部分贷给了国有企业，使一些垄断企业得以实现非正常的扩张，甚至投资于虽然同本业不相干、却有利可图的房地产业。一些大城市的地产招标，60%“地王”是国有企业。他们挟着巨额游资进入房地产业，抬高了地价、房价，带动了物价上涨，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扩充垄断企业的同时，是对民有企业的剥夺。当然，对民企的剥夺不是 2009 年才开始的，2004 年的铁本被勒令停建，2005 年的陕西民营石油国有化，都是“国进民退”的先例。今年这个现象更为突出，特别是从山西开始的煤炭重组，势将蔓延全国，形成全行业的“国进民退”。

## (二)

“国进民退”的危害，首先在于它是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破坏了公平竞争，损

害了市场机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曾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进民退”却与这个决定背道而驰。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规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自由竞争。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说：“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它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就是说，市场的自由竞争是在法律规范下的竞争，它是完善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优胜劣败，是十分正常的。优胜者体现着先进的生产力，优胜劣败，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但是，政治权力的介入，却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不是优胜劣败，而是劣胜优败。山东钢铁集团吞并日照钢铁公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山钢经营不善，多年亏损；日钢却运转良好，赢利颇多（有一个材料说它 2009 年上半年有 19 亿元利润）。如果按照市场规律竞争，应该是日钢兼并山钢，让先进的生产力取代落后的生产力。然而，现在却是落后的生产力取代了先进的生产力，仅仅因为山钢是国有企业，日钢是民有企业。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

其次，“国进民退”削弱了民有经济，也就削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得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有经济的盛衰荣枯为标志的。1978 年在农村兴起的包产到户，撕开了全面垄断的专制经济体制，催生了城乡的小商小贩。他们或是走街串巷，或是摆摊设点，或是长途贩运，或是自产自销，给死气沉沉的社会注入活力和生气；接着，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沛然而兴，繁花似锦，点缀着物资匮乏、生活贫困已久的社会，唤醒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和改善处境的



渴望。特别是知识分子下海和科技企业的勃兴，奠定了民有经济的牢靠基础。由包产到户和民有经济开辟的经济解放和由平反冤假错案带来的政治解放，由真理标准的讨论营造的思想解放，构成了80年代的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击退了体制内的反改革叫嚣后，民有经济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仍然面临着资金匮乏、税费繁多、国企挤压、政出多门等等先天的困境。进入新世纪后，更是不断遭到国有企业的蚕食。即使有像“36条”那样的政策开路，也难以保证民有经济的顺利发展。2009年的“国进民退”，说明有利于民有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对民有经济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

再次，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国有经济的垄断性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不相容的，垄断排斥竞争，损害市场经济。占有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垄断企业，是完善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一些垄断行业的国有经济垄断着资源和产品价格，从而也就垄断了市场。“国进民退”扩大了垄断的空间，挤压了市场的自由竞争，缩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化的程度如何，是考察经济体制改革进退成败的主要指标。“国进民退”导致垄断扩大，市场经济缩小，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大倒退的直接表现。

复次，“国进民退”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埋下隐患，潜伏着更深刻的社会危机。特别是主要靠银行贷款拉动起来的房地产业，从放贷到投资，都有很大的盲目性，水分大，泡沫多，一旦出了问题，泡沫破裂，就会连累整个国民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小年不久前就指出：“从整个经济的层面上讲风险在上升。”这是一个十分审慎的估计，也是对决策者的一个警告。

最后，“国进民退”符合于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在这些既得利益者直接间接的操控下展开的，它给有关的国有企业和管理部门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2009年的这种“改革模式”，将诱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部门，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大的规模上，以更大的热情去推动国有化进程；这是权贵资产阶级为自己摆设的盛宴。有一位经济学家说：“2009年的‘国进民退’，有可能发展为长期性的隐忧。”这个说法不

是没有道理的。

### (三)

为什么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思想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错误方针，把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

这个错误理论始于列宁和斯大林。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一篇文章里把社会主义归结为“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完成后的1936年明确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的基础是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后来还提出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承接了这个理论。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按照这个斯大林主义的模式进行的。在消灭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成分后，国民经济就成为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直到文革结束，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才改弦易辙，一方面引进外资，同时发展民有经济，恢复了市场机制，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但是，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没有放弃斯大林主义，还是把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看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坚持。这可以从中共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里得到说明。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十二大）；“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十三大）；“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十五大）；“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十七大）。这些论断，充分反映了对“公有制”的迷恋。

但是，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极端有害的。它是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垄断经济的理论支柱、权贵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护身符。国有制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更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呢?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所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将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但不是个体小生产那种结合,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实现个人所有权”。

所以,公有制就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是劳动者在他参与生产的企业里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经济制度,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分别说来,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是联合占有,劳动者用以进行生产,任何个人都无权处置;价值形态则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国家和他人无权剥夺。或者换句话说,使用价值是共同占有,交换价值属于个人所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其他权利的经济基础,劳动者(当然包括脑力劳动者)由于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才能够获得对于企业的管理权、监督权和利润分配权,才有可能成为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真正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的这个公有制理论,是建立在承认个性、尊重个性和每个人的解放这个宏大目标的基础上的。在这样的公有制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有权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人人都是有产者,甚至包括原来的资产者也不例外。中国离这个前景还很远,怎么能够侈谈“以公有制为主体”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全面实现公有制的条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只能说是具备某些公有制的因素,更不要说我们中国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私有制还有旺盛的生命力,人类还要经历漫长的路程,才能到达公有制。坦白地说,这还只是纯理论的推断,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一种理念,是人类力图摆脱现实社会种种不平等不自由状态的构想。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还需要经过实践的验证。把它生拽到中国社会,“以公有制为主体”,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但是,如果仅仅是历史的误会倒也罢了,问

题还在于它已经成为完善市场经济的障碍,成为权贵集团排挤民营企业、掠取社会财富、破坏社会公正的理论工具。“国进民退”,正是他们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结果。所以,从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十分必要的。

在2009年的反对普世价值的高潮里,有一位老共产党员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批判我,说我主张“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全面实行私有制。看来,这位在共产党里呆了七十多年的老人,大概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懂。《共产党宣言》在解释“消灭私有制”时谈到,“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并且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可见,私有制是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和“奴役他人劳动”为特征的,实现人人有产,而且并不“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恰恰与私有制相反,是公有制的特征。可是,这位批判我的老共产党员却把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说成是私有制,而把那种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专制国家垄断制当成公有制,是非如此颠倒,真令人哑然失笑!

前面我说过,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人人有产,包括原来的有产者,即资本家。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理解,既然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怎么还能让资本家继续“有产”呢?这就联系到深一层的理论问题:所谓“剥夺剥夺者”,是指剥夺资产阶级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劳动者的权利,也就是前面所引的“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却并不剥夺他们以资本或脑力劳动参与生产而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和机会。也就是说,绝不是把资产者的全部资产都剥夺干净,而是让他们获得与劳动者同样的参与生产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恢弘的理论原则里得到启发。“解放全人类”是不是包括资本家?当然包括。如果把资本家都扫地出门,使他们成为无产者,岂不是又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实现公有制不是要使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这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下转45页)

# 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

• 董 健

## 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有着根本性区别

“和谐社会”是公民社会还是臣民社会？传统的和谐社会，尽管有古代礼乐文化的背景，有一些朴素的自由、民主的因素，尽管这个社会也有比较宽松、稳定、太平的时候，但都还是脱离不了臣民社会的总框架。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则应该是现代的公民社会。确认“个人”本位的独立、尊严和价值，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现代公民社会之政治伦理、道德伦理的文化价值基础，是现代启蒙主义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但在我国，个人主义长期遭到否定和批判。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当权到共产党主政，都批判个人主义，都党国至上。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说：“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臣民社会注重社会和谐。”

两种社会的区别，关键在于“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人权第一、个人本位、尊重个人的价值，这是公民社会；君权第一、个人臣服、不看重个人价值，这是臣民社会。臣就是臣服、服从。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就是臣民社会。权位最高的是皇帝，皇家统治着全国。每一个地方的大官都臣服于皇帝，而老百姓都要臣服于地方那个最基层的官员。按照儒家学说是一个伦理社会，在家庭里面都要臣服于家长，具体来讲儿子要臣服于父亲，妻子要臣服于丈夫。一切人的关系都是一个臣服的关系，一个服从的关系。鲁迅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句话非常的厉害，他就是想揭示这个现象，他说中国的文化说到底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侍奉主子”，就是服从，就是臣服，一层一层地侍奉上去，是臣服的文化。这样一个社会，就叫臣民社会。中央各部的大官在皇帝面前下跪、称臣，都

是臣。

这样一个社会的结构当然是一个政治专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构。这个臣民社会有时候统治比较稳固，比较安定，譬如说没有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以至对内对外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灾荒，这个社会比较升平，一般的人认为这就是和谐，所以卢梭说臣民社会是向往和谐的。下对上要臣服，上对下也要说得过去，剥削压迫不能太过分了。下头对上头不能造反，必须臣服。这个关系能够维持到不爆发革命，不爆发不造反，能够平稳地往下发展。而这种和谐是臣民社会的和谐，在西方也存在过。儒家的礼乐文化对维护臣民社会是有作用的。礼乐文化在早期是比较活跃的，到了后期，就是秦汉以后，就被僵化了，乐的层面向礼的层面过渡了，乐被礼化了，适应了专制统治的要求。

什么叫公民社会呢？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在古希腊，就有公民社会的萌芽。中国古代也有过公民社会的萌芽。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些民主诉求，强调人民大众的主人翁地位，强调老百姓的权利，强调人道等等，都是公民社会的萌芽。但是秦汉之后，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完善以后，这些因素就抛弃了，民主的萌芽就被扼杀了。到了近代，才有“人权”、“公民社会”的追求。

在西方，真正的公民社会是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之后兴起的。启蒙主义开启了世界的现代史。现代公民社会由此而生。“启蒙”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解释，但主要是从西方来的。英文的启蒙叫做Enlightenment，Light是光，Enlightenment就是照亮。专制统治者的很多愚民观念把人们的头脑弄得非常的愚昧、黑暗，人们看不到历史的真相，不知道真理在哪里，自己的脑子也不会真正地思考，而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按照别人告诉他的观念来思考。这个脑子不是一片黑暗吗？启蒙主义者要把这些人的头脑照亮，把理性的光打进去。我们



用中国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把头脑弄明白。本来是一个不明白的人,现在我明白了,我就会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了,我就不再听信你原来告诉我的那些蒙蔽我愚昧我的话了,我就要问一个为什么了。所以启蒙主义这种思想文化运动,它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是一种精神的准备。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两点。第一反对真理的垄断,真理并不是少数权势者垄断的。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也要明白真理,反对真理的垄断。如果太阳是真理的代表,太阳是大家的,太阳的光线照到每一个身上,而不是只照到个别人身上。第二个就是反对权力的垄断。财产的分配权,资源配置权,政治管理权等等,不应该是少数人垄断,应该由全民通过一定程序解决,全体公民用权就是民主,少数弄权者用权就是专制。这样一来在西方就掀起了很强大的现代启蒙主义运动。一大批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当然是继承着古希腊以来的民主传统精神),这些价值观念的核心就人的价值和尊严,就是“个人”的权利的不可动摇性。每一个人生来就有他的权利,是天赋人权。

公民社会显然与臣民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公民社会里就取消了“臣服”,没有臣服的关系。不管哪一级对哪一级,都没有臣服的关系。整个国家机器在按照民主和法制运转。老百姓不用对政府“臣服”,政府机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现在报纸上都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不是官老爷。老百姓纳税人是主人。这就是公民社会。台湾国民党掌权几十年,在民主选举中曾经一度失去了权力,现在又重新掌权。我记得民进党的陈水扁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在接受英国BBC记者采访时讲了一句话:“不管这两个党将来发展如何,也不管存在哪些问题,这一事件本身是中国从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个大的转折,什么转折,就是通过非暴力手段,通过民主和理性把权力进行了交接。”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面把权力夺过来,是通过战争打下来的。就是四人帮掌权被推翻,都要通过“小暴力”,不通过暴力抓不起来,陈云无奈地说:“下不为例。”公民社会通过非暴力的、民主的方式进行权力转换以后,掌权的人就不会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但是在臣民社会,我用暴力把你打倒,夺取了这个权力,我掌权者本人就缺乏安全

感,我老是想着你会不会用暴力推翻我,所以我就用暴力维护我的权力。毛泽东用暴力推翻了国民党,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后来一直就强调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甚至要七八年来一次。他就生怕有人要用暴力推翻他,老是感到不安全,动辄说我还是想要去井冈山打游击。暴力所取得的权力往往用暴力维持,而暴力维持的社会绝无公民社会可言。

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应该是现代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传统的臣民社会。传统的臣民社会只有部分的时代比较安定,如康乾盛世,可称之为“古典和谐社会”,不是现代和谐社会。现代的和谐社会,就是我们现代正在争取、还没有达到的现代公民社会。

## 个人主义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要达到现代公民社会,除了继续坚持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公民社会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必须真正地建立起来。承认“个人”本位的高度尊严和不可动摇性,便是建立这种新伦理的首要前提。在传统的臣民社会,完全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被工具化、奴才化,只是权势专制下的“子民”。所谓“个人主义”是一个反面的东西。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个人主义也是完全被否定的。我这个年纪的人是在声讨个人主义,处处防御个人主义中长大的。“个人主义”这个词不是我国固有文化中所有的,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能找到一些根源。这个词在西方叫Individualism。在启蒙主义的视野里,每一个“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个人”都享有种种个性自由并担负社会责任。所谓“天赋人权”压倒了“君权神授”。然而,在我1949年以后接受的教育当中,个人主义却是一个坏东西。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文艺界的负责人周扬来总结这场运动,叫做《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他总结文艺界犯错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个人主义,他说:“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万恶之源。”多可怕啊,是万恶之源!

现在我们读了很多有关启蒙主义、人的现代化的书,读到了许多学者总结中国历史的书,我们

才晓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个人主义这个词是一个正面的概念,是讲“个人”本位的重要性,强调人本身的独立、价值和尊严。它与传统的专制主义针锋相对。这个“个人”是有权利的、有尊严的。我很看重我自己,你也要尊重我,当然我也要尊重别人。这个和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不是一回事,后者不应该说成“个人主义”。在西方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Egoism,指那种非常自私,只考虑个人的思想。结果一查字典,也翻译成个人主义,所以在中国现代把这个事情搞得非常混乱。在五四文化运动的时候,个人主义还没有被歪曲,在那时鼓吹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一批先进文化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还是一个正面的价值。在我的印象中,个人主义作为一个正面的道德观念,传入中国,大概是1900年前后的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1900年前后这个词传到中国,刚开始翻译成“个人”或者翻译成“个性主义”或者翻译成个人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讲究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候,个人主义还是一个体现着人之现代化追求的价值。

当时在好多新的刊物上也宣传过个人主义。鼓吹个人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胡适。他写的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叫做《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是挪威的一个作家,戏剧家,专以个人主义为武器与“社会”作战,即与权力掌控者斗争。在他的戏剧当中,个人主义作为一个正面的道德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自主,强调个人反抗“社会”的压迫。他崇尚的是一种个人主义高尚的人格。易卜生主义产生在挪威不是偶然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挪威的农民是人格最健全的人,是有自由精神的农民,只有这种人才能产生健康的正直的人格,这种人格就是个人主义,所以在易卜生来说个人主义是一个正面道德力量。胡适就写了一篇文章,讲易卜生的个人主义,鼓励在中国兴起个人主义价值观。现代的公民社会,如果离开了对“个人”本位的确立,离开了对每一个人的独立、尊严的承认,就不可能建立,必然还会回到臣民社会中去。因为臣民社会不承认“个人”,所有的人在统治者心目中都是工具化、非人化、奴隶化的,都是他们暴力夺取和维护独裁政权的炮灰。中共有一位元帅曾经说过:“我打仗就是往锅底填柴火。”填的这些柴火就是士兵,所以战争这个东西是不允许个人主

义的。在战争思维、暴力思维之下,就不可能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合法性必然是在和平的、开明的时期才能有。个人主义价值观总是与现代的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专制社会的“万恶之源”,因为它与人类文明的现代时期共命运。

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承认人的个性差别,承认每一个人都有发展自己个性、维护自己个性的权利,这是一种现代文明。所以每一个人不仅有生存的权利,而且有言论的、思想的、政治的权利,这些都建立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人的自由不是空洞的吗?有什么自由啊?我们爱国,爱自己的民族,但掌权者不能利用这些来吞噬“个人”。个人服从“集体”,大家都一致,高度一致,一言堂那就谈不到个人,也谈不上个人主义。自由与个人主义相联系,自由与民主体制相联系,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些东西都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支撑。否定了个人主义,只承认集体主义,使个人完全失去自觉,人人都成了“驯服工具”。从电视上看到,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记者采访他,有什么感想啊?有的人大代表从非常边远落后的地区来,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就说很感谢党和政府叫他到北京来见了世面。完全不是人大代表所应该讲的。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到北京来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要提意见,要批评政府哪一点没有做到,哪一点没有做好,要传达人民的意见和要求。“我第一次到北京,住得很好,吃得很好,非常感谢党、感谢国家……”,他完全不知道他作为人大代表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他是“臣民”,不是公民。

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也往往否定个人主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滋养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母亲只滋养了我的肉体,我的精神是靠党管的,都缺乏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性,而强调了一种精神上的依附性。这样,在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开展的那种教育运动中,个性、个人主义全被否定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地消灭,结果就被扭曲、变形,所以就讲假话,公开讲的全是一些空话,专讲那些符合集体主义、符合党的要求的东西,符合“国家”利益的话。他内心就保留了一个别人不能窥探的世界,那个世界本来可以和别人交流的他,不交流,而且他的个性要求都变形了。人们一些感



情、欲望,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允许它合理地、公开地讲出来,他们就讲假的、好听的话。本来合理地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现在变成了不合理的,就转入“地下”了,转入地下就要变形,一变形就变成了不好的东西。为什么一直接受集体主义教育,一直接受廉政教育,但是一有机会就贪污,就是人的正当的个性受到了压抑之后,他的那些不正当恶欲就得到恶性膨胀。如果有健全的个人主义,有易卜生主义那样的人格,他就不会说一套干一套了。另外说明集体主义在他身上是虚伪的。有没有集体主义,当然有集体主义,国家的集体要求,爱国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但是集体主义当它否认健康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它就会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最早指出这种集体主义的虚假性的是马克思,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说到过。如果我们否定了人的健康的个人主义,这个集体主义就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变成人性健康发展的束缚和障碍。这是马克思指出过的。集体主义变成了虚假主义,我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所以当有些人一旦发现他这个地区,他这个单位,甚至他这个国家那个“集体”是对他的蒙蔽和欺骗的时候(你们这些当官的,让我服从集体,你们贪污那么多跑到国外去了,原来是假的),这个被愚弄的人在价值观上必然发生断裂、崩溃。什么集体主义也不相信了。这个时候他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也建立不起来了。个人主义在一百多年前传入中国,一直遭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误解、歪曲和批判。1907年鲁迅写过一篇长文《文化偏至论》,指出个人主义这一理念刚传入中国,“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诤,苟被其谏,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你看,个人主义成了一个大罪名,是骂人的话。这种迷误一直传到1949年之后,1958年周扬撰文(此文经毛泽东修改)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说明,反个人主义是一个多么强大的阵势。

“国家”、“民族”、“集体”、“党”是反个人主义者所用的主要依据。鲁迅在上文中,提出以“人国”——“个人”本位得到尊重的国家,取代“沙聚之邦”——没有“个人”人格的一群奴隶组成的国家。当权者总是以国家的名义来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针对这种思想,鲁迅主张“立人”。他说我们

要把人立起来。鲁迅讲的这个立人就是要尊重“个人”本位,尊重个性,把人的品格提高。鲁迅说这个国家有两种情况,如果每个人思想解放,有健全的个人主义,人格得以“立”,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人国”,是“人”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经过启蒙,没有建立健全的个人人格,人们都是奴隶都是臣民,那么这个国家不能叫“人国”,而叫“沙聚之邦”,就是很大的一堆沙子;中国过去,特别是旧中国确实是沙聚之邦。鲁迅要把沙聚之邦建设成人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个人主义人格的健全。

针对以“国家”至上反对“个人”本位的思想,胡适说过一段很尖锐的话,大意也是这样的。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此话见他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如果大家都是奴隶都是臣民,加在一起也不强大。他和鲁迅的话不是一致的吗?鲁迅叫沙聚之邦,就是由一群奴隶组成的国家。胡适讲的是现代的国家,和鲁迅的话是一致的。但是胡适的话,过去都是受批判的,国共两党都骂胡适,蒋介石、毛泽东都否定胡适思想。传统的专制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相结合,为我国现代化造成了种种思想上的障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拒绝和批判,是包含着深刻历史教训的。

总之,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必须是现代公民社会。正如卢梭所言,“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政治伦理、道德伦理的文化价值基础,就是注重“个人”本位的独立、尊严和价值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作为人道主义的基石,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过光辉作用。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发展过个人主义,但也恰恰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破坏了人的个性之多样性,金钱万能的社会使人异化、失去个性。健全的个人主义是在那些资产阶级的批判者的文化批判中才得到维护和发展的(如易卜生、罗曼·罗兰对个人主义的张扬)。马克思主义也试图以新的途径高举“个性”的大旗。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些个人主义的遗产,推动我们的公民社会的建设。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副校长)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东欧巨变访波兰

● 苏双碧

1989年和1995年我先后两次率团访问波兰(其中一次还访问了阿尔巴尼亚)。这里我主要谈谈第一次访问波兰的观感。当时波兰这个国家正经历着和平演变的历程,访波期间又正值东欧巨变之时。在那特殊年代,身临其境,自有一翻特殊的感受。

## “你们是去访问一个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的党”

应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刊《新路》杂志之请,《求是》杂志原定于1989年7月组团访问波兰。但波兰统一工人党正经历过“六·四”和平演变而丧失了政权的事件。这就是根据2月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定于6月4日举行议会选举,在选举中,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遭到重创,在议会的299个席位中只得了5席。随后于6月18日的参议院选举中,在100个席位中,竟未得一席,丧失了组阁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好按原计划于7月间组团去波兰访问。

三四个个月后,即1989年10月,有关部门向我们建议,认为在政局动荡之时去看看还有点意思。随后《新路》杂志也来信,说明原邀请仍有效,并说要去希望早点去,越往后接待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1月16日率《求是》杂志代表团由北京出发到波兰访问。代表团由我和沈迎选、乌兰三人组成,其中乌兰是外交部的,在波兰工作过,会波兰语,对代表团来说有诸多方便。

下午3时离开北京,之前波兰驻华大使馆派一位公使衔参赞来机场送行。他在中国多年,对中国很熟悉。此时此刻,他的心情似乎不大好,沉默了好一会才说:“你们是去访问一个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的党。这个党要改名,自然也要修改党纲。”我问他政权已经易主,工作是否会变动,

他说不知道。又说他们外交部有个规定:一是忠于政府,二是不参加党派活动。言下之意是信守这两条,就可以留下继续工作。握别时他恳切地说:“希望您访波回来后能见面。”据我所知,他并没有离开中国。一年后在一次波兰驻华使馆的招待会上,他见到我并热情和我交谈,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比上次见面时要好多了。

由于时差的关系,尽管在莫斯科转机时耽误了一些时间,我们还是在当天晚上华沙时间十点钟就到达华沙。《新路》杂志副总编辑以及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到机场迎接我们。随后把我们送到政府宾馆。这是一座主要用来接待外宾的宾馆,规模不大,但还舒适。离它不远就是波兰总统府,挨着总统府是澡盆公园,属皇家园林。因为公园的临街附近有一尊肖邦塑像,有些中国人就称这里是肖邦公园。在华沙期间不论早晚,只要能够抽出时间,我们都要到这个公园去散步。

第二天,访问活动正式开始。上午就安排了三个活动。首先是安排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亚特。但亚特临时有事没有来,改由党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向我们介绍了议会选举失利和今后党的工作设想。他认为党处于非常时期,必须支持现政府的主张。对如何恢复党的正常活动,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了200多种方案,归纳起来不外两种流派:一是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主张经济实行国家所有制,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工人运动中社会党一派,主张统一工人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即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两种流派,主张改为社会民主党的占多数。在东欧巨变中,走社会民主党道路,成了他们共同的方向。首先是匈牙利,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十四次党代会,决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随后就是波兰,民主德国,



保加利亚等等。都先后把共产党、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这似乎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正如这位意识形态部长所说的,特别是青年党员中,持社会党方向的人更多。接着,他谈了党更名的具体步骤。他说:“明年二月要召开党代会,产生一个综合纲领,发表共同宣言,新的党不论世界观、哲学观、政治观皆可入党。在这次党代会上,正式宣布停止工人党的活动,并产生新的政党。即‘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党改名后,到底还有多少人能留在党内,很难说。在一次民意测验中,有很多人回答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位意识形态部长对党所处的前景也有点茫然。

会见之后,我们被安排去访问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总部。这两个党原先是工人党的执政联盟,不久前在圆桌会议上倒戈和工人党分道扬镳。我当时有点奇怪,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安排这两个活动。陪同说是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波兰当前的现状。这当然也无可非议。

10点半左右,我们来到民主党总部,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民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主要介绍了他们和工人党如何从联盟到分裂的过程,不同意有人说他们“背叛”了工人党。最后我们访问了农民党总部。接待我们的是农民党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他介绍了农民党的组织和现状,提倡农民自治,不受任何政党和教会左右。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党人数不少,但社会影响似乎不太大。它和民主党加入工人党的执政联盟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它的退出也没有对工人党的执政起什么大的破坏作用。统一工人党之所以失去政权,是统一工人党执政期间,经济未能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未能提高;加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搞独裁统治,没有民主。工人党在群众中丧失民心,人民群众很自然地要抛弃它。

这次访问尽管是应统一工人党党刊《新路》杂志的邀请而来,许多人都把我们当成统一工人党的最后一批客人,会见我们的大多是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他们基本上都是谈党要改名,要筹建新党,都在为召开党代会做准备。他们认为新党和统一工人党告别是严肃的,合理的。尽管他们也说不主张完全否定党的四十年历史,但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和统一工人党毕竟不是一回事。党的性质不同,纲领不同,主义不同,改名或重建都意味着原来党的失败,意味着政权的变色。

## 我们成了工人党的最后一批客人

波兰的和平演变,由于部队基本上没有介入,没有起来维护统一工人党的政权,新旧政权的过渡是和平过渡;虽然也发生一些工人罢工,或群众集会游行,但社会上的冲击力并不太大。我在政府宾馆曾经遇到波兰人民军的一位军官,我问他是不是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他说是。我问他怎样处理新旧政权转变中的自我,他说:“很简单,把党证撕掉就完了。”说得很轻松。后来我一想,也可以理解: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在新政权下,原来的政党、党员和军人之间只能居其一。

和平演变是相对于暴力而讲的,至于对新旧政权的态度,对经历几十年奋斗的党的怀恋,一句话,在不少人中,思想斗争还是十分激烈的。在



中共中央党刊《求是》杂志社

波兰我们参观了一个博物馆,是联合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是欧洲最完好的哥特式建筑。馆长是一位虔诚的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状很钦佩,对中国代表团很热情。她介绍说,这里供有一尊圣母像,有1500年的历史。当中有个市政大厅,一般不对外开放。馆长听说我们来自中国,不仅热情地接待我们,而且亲自动手做了一盘点心招待我们。当她把我们引进市政大厅时,她让我坐在正面的一张椅子上,并郑重其事地说:你坐的这个位置是前一位中国客人某某某坐的位子。我一听连忙站了起来,觉得这个位子过于神圣,我不该坐在那里。可是她一手又把我按回去,并庄重而深沉地说:“你就该坐在这里,因为你们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团,又是我们工人党的最后一批客人。”说着,她声音有点哽咽了。这种情况,我们在波兰访问期间曾多次碰到过。11月22日,我们到波兰最大的一个省卡托维兹访问。这个省是波兰的工业区,拥有22万工人党的党员,对党要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不少党员表示抵制和不满。那天我们从克拉科夫到卡托维兹,正遇上大雪,加上在路上更换轮胎,原计划上午10点到卡托维兹,结果快到中午12点才到达。省委管文教的书记、作家捷林斯基为迎接我们,在办公楼前的雪地里站了近两个小时。一见面就激动得掉下眼泪。他说:“你们的党更坚强了。我们的党已经放弃了领导权。”他把我们引进一个宽敞但很陈旧的会议室,然后从口袋里抽出一份材料,是他给党中央的上书,表示坚决反对工人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主张改名为共产党。他说他属于现实主义派,要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指责那些主张党更名并热心于筹备这一工作的领导人是对国家的命运“极不负责任”,表示要和他们斗争到底,直到拉出队伍另立新党。到会的人大多表示同意捷林斯基的观点。但就全党来说,这种观点毕竟是少数,几个月之后,即1990年2月,党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报纸刊登了捷林斯基拉起一帮人,成立波兰共产党的消息。据说只有400多人,且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次访问,正是工人党大步演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时刻,所有接触到的工人党领导,几乎都放弃对原来政党的信念,不敢面对党的四十多年的

奋斗历史。当然这也不奇怪,波兰教会影响很大,它对保存波兰的语言和民族文化有过重要贡献。因此,波兰人信教的特别多。据说工人党党员信教的竟达70%以上。这样一来,信奉马列主义也就可想而知了。加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波兰人对俄国,当然也包括苏联,成见很深。不论是党员还是群众,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都认为是属于清除影响问题。对斯大林基本上全面否定,因为斯大林当政期间,和东欧各国积累了许多恩怨。对列宁一般也都是持否定态度。我们所到的各级党的活动场所或党的负责人的办公场所都没有看到列宁的像。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华沙大学我们拜见一位历史学教授,他是工人党有影响的党员,“7·8”运动的发起人。按照他的说法,运动的目的是,是要让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奋斗,包括议会道路,争取在议会占多数。他想通过议会斗争来保持党和社会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的地位。比起我们接触到的其他领导人来,他还对过去历史有点怀恋。于是,我们就问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原工人党的指导思想怎么看。恰巧他的办公室内放着一尊列宁的半身塑像。我们就以此为问题问他:“您的办公室还放着列宁的像,这是不是意味着您对列宁有肯定的看法?”看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很敏感的。他说:“我不想对其他国家的人物进行评论。列宁应由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们去评论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不能继续使用列宁那套模式了。我们在70年代就找到了和列宁不相同的道路。”

由于社会处在动荡和变革时期,社会各阶层思想都很活跃,自由度很大。我们在克拉科夫访问时,应左派俱乐部之约出席一个座谈会。当地的一些作家、艺术家、诗人、记者出席了会议。俱乐部的主席曾经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个老革命。这个组织当时省委是支持的,后来因为要求 and 党对话,要求批评政府,要求支持工人合法要求而被当成反对派。特别是军管之后,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自动退党。现在这个俱乐部又开始活动了。俱乐部成员思想很活跃,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克拉科夫座谈会结束后,我们收到一份请柬,邀请我们去出席一个叫“性与艺术”的展览会开幕式。因为一个“性”字开头,使



我很犹豫。我把《新路》派来的工人党陪同找来，问其究竟，才知道是抽象派的一个普通画展。在华沙我们也收到类似的请柬，要我们去出席一个电影招待会，片名叫《性与电话》，又是一个“性”字。因为有官员陪同，不去又不好。我因牙疼没有去，让两位年轻人去看看。回来之后，他们说，片名故弄玄虚，内容和性根本没有关系。恰巧那天晚上有位大学教授来访，我和他谈起这件事。他说这反映了文化界一部分人要求开放多些。比如在深夜“儿童不宜”的节目里播放一些更加刺激的内容。有些影院已经在萌动。尽管不少人反对，但看来是挡不住的。不过，这位教授说，由于多年思想禁锢，看到一点新动向就不习惯，其实，开放一点，开初可能有点影响，习惯了就好了，也就不会那么多人热心去看了。

克拉科夫是波兰古老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大学、电视台、报社，以及米兹凯维奇广场。工人党的省委书记还亲自向我们介绍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传统。离开克拉科夫后，我们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法西斯在这里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许多证据，如焚尸炉、死人留下的头发、眼镜等等，至今看到仍令人发指。

随后几天，我们到卡托维兹、弗罗茨瓦夫参观访问。我们参观了伊尔契汽车制造厂。据说中国曾向这个厂买过汽车，和中国关系很好。晚餐特地请了会做四川菜的厨师来给我们做中国菜。主人的热情和真诚使我们很感激。厂长亲自来陪我们吃饭。他一到就交代服务人员把餐厅迎面的一个走廊门关上。他说是因为隔壁小餐厅等会儿有几个台湾人用餐。我问他台湾人到这里干什么，他说是来买汽车的。可知以民间的名义，他们和台湾还是有来往的。

在离开弗罗茨瓦夫的头一天晚饭前，服务员通知我们，为欢送我们，宾馆为我们加了几个菜。代表团的年轻人听说加菜，就想喝点白酒。于是，他们去找《新路》的陪同，建议晚餐时喝点白酒。陪同说工人党中央有个规定，接待外宾一律不招待白酒。我问他内宾是不是也一样，他说内宾规定就更严了。不过，晚饭时，陪同还是从书包里拿出一小瓶白酒来。但他当即声明，这是用他自己的钱买的。他说明天就要回华沙了，今天大家欢聚一下。这件事引发我的一点思考，看来工人党

的失败主要并不仅是腐败。而主要是有诸如上述提到的政治原因。

11月27日回到华沙，出访波兰已经接近尾声。11月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巴莱茨基会见，是这次访问最高层次的会见。中国驻波大使出席作陪。这位书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波兰党当前的情况，党的去向，是改造还是成立新党，是改名还是保留原名。老党员希望保留党的名称，年轻人希望改名。在谈到党改名后的前景时，他说波兰党现有200万党员，改名后能剩多少党员，有的人估计能剩30万人。我插话问他，改名后党员要不要重新登记。如果重新登记恐怕留下的就更少了。他说现有的党员只参加活动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办什么手续。不过在一个多月后，即1990年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华沙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主张国家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党代会后，进行登记的党员只有47000多人。工人党结束了长达41年的统治。

当我们要离开华沙时，一位来送行的朋友说，设若你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华沙，你可以打听一下我们的党中央大厦归属何主了。联想到前一天下午，一位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我们告别时，说了欢迎我们再次来华沙的话之后，立即改口说：“也不知道你们下次再来时我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一种失落、恐惧、无法面对将来的预想，使200多万工人党员惴惴不安。

5年后，即1995年，我再一次率中国新闻代表团来华沙时，昔日宏伟的统一工人党大厦已经变成几个公司的办公地点。昔日有过接触的人和单位，大多因为单位取消，人事变迁，也都找不到了。

（作者为《求是》杂志前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

• 刘崇文

## 下台前在上海与李先念的会见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还在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他说,我今年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开他的“生活会”之前,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

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准备开好党的十三大,如何妥善处理好学生闹事等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在加紧酝酿“废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无觉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何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



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 李先念说 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

耀邦同志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先念开“生活会”的事,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先念同志说耀邦阳的多,阴的少。赵紫阳则说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当时流传这么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无”。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

阳,被耀邦拒绝。因为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跑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

职务,就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

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

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我跟他讲,1956年波匈事件后,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过废除终身制的问题。我把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找出来给他看了,少奇同志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8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作了8年的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少奇同志的这次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耀邦同志看后说,历史证明,这样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我告诉耀邦同志,有件事对我们这代人启迪和影响十分深刻,那就是1976年,中国相继逝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在当时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人们惶恐不安,担心中国的天会塌下来。结果,不仅天没塌,相反在毛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崭新时期。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一代胜过一代的真理呢?!

耀邦同志说,后来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时代在进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了。我问他,那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总理、部长卸任后可以退为平民,而我们却很难做到呢?他反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根据我的经历、感受、了解和观察,无非一不放心,二不放权。总觉得年轻人(实际很多人都不年轻了)不成熟,怕他们出偏差,捅漏子;而在“官本位”的情况下,权力地位又使人留恋难舍。耀邦同志说: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成功与失败中不断探索前进的,你总不能只许前人犯错误,不许后人出偏差。“官本位”是封建社会留下的残余影响,所以我们要改革。这里,我想起1982年中央关于老干部退休离休的决定,那是耀邦同志亲自指导起草的。为了顺利推行老干部离退休,耀邦同志主张给老干部增加荣誉津贴(文件上叫生活补助),有人不同意给,不同意给那么多。耀邦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有许多补贴,什么伙食补贴,工作误餐,办公用房,出差补助,等等,退休后多数同志有困难。我们不像那些发达国家,现在还是低薪制,多数老干部退休离休后确有困难。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思想向先进看齐,但政策要照顾多数。

总之,耀邦同志不遗余力推进废除终身制,他衷心希望退下来后“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就是为了在我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 欣赏和钦佩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耀邦同志一直主张写张治中的戏。他说,张治中在蒋介石两次反共时都曾上书表示反对。解放后他也从不骂蒋介石,这是毛主席发现的。解放前后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他是不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他也是不同意的。有一次毛主席找他,同时还有别的人,他离毛较远。毛主席说,张先生,你怎么躲在后头?他说,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在重庆谈判时,是他千方百计保护毛主席的。耀邦同志说,张治中是个政治家,是有独立人格的。民主人士中,第一是宋庆龄,第二就是张治中。他在国民党是个上将。



他还特别器重有学问、有才华、有本事的人。李宗仁的私人医生×××,是最早到延安去的医生,能做心脏外科手术,是有名的一把刀。我们在南宁时,他也在那里,当时已88岁了,曾来看望过耀邦同志。他说要搬回成都去住,已给他找妥了房子,但表示冬天没有暖气,怕冷。耀邦就告诉有关方面,希望帮他解决暖气问题。离开南宁回北京前,还专门要送他一份礼物,李昭同志只好找了两瓶好酒给他送去。

1987年春节,也就是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后不久,文怀沙教授突然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赠给他一副对联: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后来德平(耀邦的长子)去拜访了文怀沙,才知道这是从陆游寄朱熹的诗句中采撷来的。文怀沙对德平说:一叶知秋。1988年耀邦在烟台休养时,写了一首古风,要德平送给文怀沙,请他指正。这首古风是: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久疑出,有如久疑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对这首古风,文怀沙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但他觉得还拿不稳,就去请教钱钟书。钱说:“既不帮忙,也不帮闲。”耀邦知道后,不仅没有气恼,相反对钱的为人表示欣赏,并说乔木很钦佩钱钟书,认为他学识渊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李锐送给耀邦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书的扉页题写了“是非公道在人心”的诗句。耀邦认为李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在兼任毛泽东秘书时敢于当面直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尖锐批评大跃进的错误,因此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后写出并出版了《庐山会议纪实》;他还写了《论三峡工程》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耀邦后来写诗赠他:“延水创伤甚,庐山复蒙羞。犟劲终不悔,雕虫度春秋。狂歌妖雾扫,拨乱尽同俦。胸中浪潮涌,笔下蛟龙游。调反三峡坝,言诤九派流。潇湘一冷月,青光耀斗牛。”

耀邦下台以后,中央办公厅突然给他送来一幅刘海粟的画,原来是刘海粟专门为耀邦画的,而且早就画好了,交给中办转交,在中办压了将

近半年。耀邦说:我和刘海粟没打过交道,就是1986年6月那次访问欧洲四国时,在法国总统举行的宴会上和他见过一面。他那时也正在法国,人家也邀请他参加了,我同他握了手。我在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估计给他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访问欧洲四国的讲话,我修改了十遍,那个反应是很好的。

耀邦同志从来对自己的文章、报告和讲话,都是亲自设计、亲自构思、亲自主持撰写或亲自口授文字措词,然后亲自修改定稿。他绝不照念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或署名别人代他写好的文章。他几乎对每一篇文章或讲话,都要求精益求精,既要有深刻的思想观点,又要有生动的语言文字。最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反对党八股、一般化、四平八稳、死板、枯燥。因此,他的文章人们爱看,他的讲话人们爱听。耀邦同志告诉我,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乔木看了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2000多字,概括了毛的一生,没有套话。还有纪念王稼祥的文章,朱仲丽(稼祥的夫人)看后哭了好几次。耀邦说,他写东西,是先有个总体设想,然后一段一段构思,想好一段写一段,最后总括而成。有时半夜有了好的想法,爬起来又写。他还说:原来还准备写一篇纪念弼时同志的文章,可是下台后试了几次,怎么也写不成了,没有那个气势和高度了,不在总书记那个地位,有些话就写不出来了。他说,本来我就准备写这三个人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是受命写的。稼祥和弼时同志和我有特殊的关系。

耀邦下台后,邓力群多次提出要编辑出版耀邦的文集。虽然在改革开放事业上,他们两人经常意见相左,邓力群自认是胡耀邦的反对派,但作为一个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人,对耀邦的文章,也表示欣赏和钦佩。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在十分惊愕之余,以无比真挚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规模,自发地深切悼念和缅怀这位已被免职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住地,人流如织,络绎不绝,一束束鲜花,一幅幅挽联,表达了人民对耀邦无限的敬爱和无尽的哀思。人民纪念碑上,曾挂出“中国魂”的巨幅幕幛。

住地灵堂，人们向耀邦遗像倾诉心声。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在看到媒体报导越来越高涨的悼念活动、越来越浓烈的哀思情绪后，高层传话：太热了，要降温！即使如此，到举行追悼会和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两旁，仍是人山人海，挤满了自发前来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

一位被免职下台的党的总书记，为什么这样牵动各行各业各阶层人们的心弦，引起全国上下如此剧烈的反响？首先当然是由于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上，作出了世人皆知的独特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实惠和福泽。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耀邦同志的正直善良、清正廉洁、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在人民中享有广泛的声誉；人们反对独断专行、弄权枉法、贪污腐败，期盼政治民主、社会宽松、官场清明，把真正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希望，寄托到胡耀邦的身上。这是中国人民在饱受封建残余思想的危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压抑后，在经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苦难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觉醒和迸发出来的强烈心愿。这也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切希望，对党的良心和良知的可贵信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党内党外，人们对胡耀邦

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处理，表示不平 and 同情。毕竟世界已站到 21 世纪的大门口，时代的潮流正在滚滚向前，人民和历史都不能容忍违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发生。

1988 年 9 月，耀邦写了一首《戏题养马岛——拟赠胡绩伟同志》的诗，共六句。

攀从秦皇下沧蓬，  
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  
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  
牧人一夜变衰翁。

胡绩伟是在耀邦逝世后才看到这首诗的。他说，这是耀邦留下的一首很重要的遗诗，表达了他最关心的还是时局。他用“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两句诗，概括了他下台的沉重教训。

这里，我步这首诗的韵，写了一首和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世事无常若转蓬，劬劳心瘁两袖空；  
但求人间皆乐土，岂顾身后影无踪；  
生杀予夺决一人，民望饥渴呼德翁。  
德翁，德先生，即民主，民主领袖。

2009 年 10 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 徐庆全)

SIEMENS


声望听力  
 好听力，好生活

#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看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508A/B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 2009030029 号

# 孩子眼中的文革岁月

● 张 刃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13岁,在天津读小学,正准备毕业升学考试。“革命”打乱了一切,大人们自顾不暇,我们无学可上,成了四处游荡的“野孩子”。那时,我家分居京津两地,我来来去去,目睹和体验了种种荒唐、丑恶和无奈。

## 红卫兵与“破四旧”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随着人流挤上了去北京“串联”的列车。说是“串联”,其实是“回家”,坐车不要钱,还挺新鲜。只是那车上太挤了,根本没地方坐,连行李架上都是人,而且走走停停,我站了5个多小时才到北京。

北大附中去看姐姐。她说,学校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弟成立了“红卫兵”,把同学们也分成了等次。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打入另册,我们这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非红非黑,属于“外围”,暂时还没有受到冲击。但她说,红卫兵拿着铜扣皮带抽打“黑五类”的同学挺可怕的。那时,我第一次觉得,人不再是平等的了。

哥哥所在的北京63中面目全非。到处是大字报,教室里的桌椅都拼成了床铺,革命学生留宿学校。楼道里,不时走过被学生押解的老师,一个个灰头土脸。记得最清楚的是校长被墨汁、墨水涂得满身满脸,头上扣着一个纸篓,外面糊上白纸,写上“打倒”之类,很像电影里演的当年“打土豪、斗地主”的场面。我既好奇又害怕,心想,曾经被学生敬畏的老师怎么忽然间就成了这个样子?这世界真是变了。

8月18日,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就起床了,走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百万红卫兵集会,据说毛主席要检阅。我们被安排在纪念碑北侧,离天安门城楼远着呢。天亮之后,人越聚越多,我却越来越困,直想睡觉。前面人声鼎沸,大家都向前涌,说

毛主席走到红卫兵中间来了。我根本挤不过去,几乎原地不动地在那里听完了林彪的讲话。前面的红卫兵“幸福”得泪流满面,后面的我们却懒散地或坐或卧,无所事事。这就是我参加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全部经过。没有激动、没有兴奋,更是连毛主席的身影都没看清楚。我想,那天的百万之众,绝大多数恐怕和我一样,有幸走近毛主席的微乎其微。但那毕竟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许多人都曾把它作为自己的光荣,向别人炫耀。

北京开始“破四旧”了。哥哥毁掉了家里的手摇留声机,砸碎了妈妈收集的几十张老唱片,封存了大部分书籍。街道上商店牌匾、路标,只要是“革命”色彩的,统统砸掉,重新命名,以至到处都是重复的革命性名称,以致只听名字却分不清哪是工厂、商店、学校了。

北京乱起来了,我回到了天津。家里也在“破四旧”。所谓“四旧”,是指一切不符合“革命”要求的东西。精神上的“四旧”很难说如何破,破到什么程度,但物质上的“四旧”则很容易破得非常彻底。

那年,奶奶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为了不给子孙找麻烦,她带头“破四旧”,每天都在悄悄地但很迅速地消灭家里所有可能招来是非的东西。她怕人看见,就每天不停地点炉子,把能烧的东西都烧掉了。我记得比较珍贵的有:我家几代人的所有照片(包括清末时外曾祖父留洋,五四时代祖父在北大读书、南开任教以及父亲在抗日战争战场上的留影),家里所有的名人字画,祖传的刺绣、首饰以及祖宗的牌位等等,连仅有的几件清代瓷器也砸掉了。至于爸爸的书,更是在“剿灭”之列,只剩下了毛选、干部必读(建国初期指定的干部读物)、联共党史、马恩选集之类。书架很快变得空空荡荡,并以杂物填充了。可以说,短



短的几天,我家几乎完全“革命化”了。

爸爸的日记、剪报是他亲手销毁的。一天夜里,我陪着他到了海河边。他从黑书包里掏出来一册一册的本子,默默地撕碎,悄悄地撒入无声的河水里。没有犹豫,没有惋惜。我不做声地看着他机械的动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只知道,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向这海河里扔过多少东西,不仅有文字,而且有珠宝,甚至包括自己的躯体。在那段日子,海河边几乎每天都会拖上几具自杀者的尸体,最多时可以排成一排,无人认领,无人管理,有的还盖上一块破席,有的则完全暴露,加之夏季天热,尸体变形、发臭,现在想起来还有恐惧之感。

社会上开始了抄家行动。红卫兵与街道居委会联合起来,排查管内所有的“黑五类”,并且把“黑”者扩大到了资本家、小业主以及一切可以视为“有钱”的家庭。(后来把“黑五类”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连同知识分子并称“黑九类”,就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由来)排查之后就去抄家,除去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统统抄没,能烧的、能砸的,当场烧、砸,其余的全部运走。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凭据,也没有任何可以辩白的机会,真正的无法无天。

抄家之外是批斗,二者同时进行。所有被批斗者都被称为“牛鬼蛇神”,无论男女老幼都被剃成阴阳头,即一半寸发一半光头。在那种形势下,人格、尊严、羞耻完全被“革命的暴力”毁灭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活下去,如小说《芙蓉镇》里右派分子所说,“像狗一样活下去”。不甘受辱者,只有走自杀之路。即使自杀,也要落下一个“自绝于革命,死有余辜”的罪名。好在死者无知,不再为此烦恼。我家一位邻居,曾用几寸长的铁钉往自己的头颅里砸,以求解脱,结果“自杀未遂”,人却落下了残疾,而且被斗得更苦更惨。

## 血腥的“红色恐怖”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津铁路一中的红卫兵突然包围并占领了市工商联、民建的机关大院,扣押了所有在场的人员。那天恰好是学习日,平时不来机关的前资本家、现工商联和民建

成员也按时到场,结果一网打尽。“冠生园”老板石某迟到,推门探头就揪了进去,人说他是“自投罗网”。

我父亲时任市民建副秘书长兼史料委员会负责人,当时还在塘沽搞四清,侥幸“漏网”。而我家原来就住在机关后院,搬出去不过半月,仅一街之隔,也算幸免于难。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院里玩,没想到亲眼目睹“红色恐怖”,受到一次强烈刺激。

资本家们(包括当权派)被拘押在大会议室里写交代材料。连续几天时间,除去拉到外面游街、批斗,就是坐在那里,不准躺下睡觉,每天只给两顿窝头咸菜,上厕所也要由人押解。

天津工商联机关是一座英式楼房,非常考究,在天津的洋房里也堪称一流。那做工精细的门窗地板,拼出各种图案的彩色玻璃和迷宫一样的几十个房间,曾是我十分喜爱玩耍的地方。那些日子,一切都变得那么丑陋、那么肮脏、那么昏暗。几十人挤在一间会议室里,日夜困守,气味实在难闻。

因为是孩子,红卫兵似乎并不把我放在眼里,有时候我还可以和机关食堂的齐师傅、李师傅去给拘押者送饭。那天,我送饭后刚要走,忽听有人报告“上厕所”。不知为什么,红卫兵竟指着我说:“小孩,你带他去。注意,防止他干坏事。”我回过头去,发现那人竟是王光英。刚想叫“王伯伯”,忽然想到这场合不对,他是“阶级敌人”啊。不过,我太熟悉他了,前两天还在院里和我说笑,他能对我干什么坏事?

短短几天时间,王光英明显地苍老、虚弱了。他步履沉重地在我的“陪同”下走向厕所。出来时,他突然轻轻地叫着我的小名,问可不可以给他搞点水来喝。我连忙点头,推开一间办公室,打了一杯凉水递给他,他竟一饮而尽。那一瞬间,我竟产生一种感慨:无论当初多么潇洒、倜傥之人,到了这步田地,也只有最低要求了。想起他被红卫兵连踢带打赶到外面批斗,手里拿着自己的皮鞋在地上爬,嘴里还要不停地自报“我是臭资本家王光英”时的情景,我真有些可怜他,可怜那房间里我熟悉和不熟悉的所有被凌辱的人。但我帮不了他们。我只是个孩子,孩子能懂什么、做什么?况且是在那样的环境中。

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轮番地游街、批斗。工商联人才济济,许多人是在天津以至全国数得上的名流,如毕鸣歧、朱继圣、董晓轩、王光英等等。而工商联机关地处市中心,位于花园路,那路环绕当年的英国小花园而筑,呈圆形,正好用来游街。名人加闹市,那场面可想而知。每次游街,都是瘦高的董晓轩排在最前面,加上纸帽子,愈发显现,他被冠以“妖道”之名,后面便是牛鬼蛇神方队,人人带高帽、挂纸牌,浩浩荡荡,每次都会引来成千上万人围观。

红卫兵打人真狠。我至今弄不懂,要怀着什么样的仇恨才可以下那样的黑手。令我没齿难忘的,是那些红卫兵痛打资本家车重远的场景。车重远并不是什么大资本家,当时约五十岁,胖胖的,人很和善,平时常与我们小孩子说笑,谁也想不到他会死于非命。红卫兵用棍棒打他,他起初并不吭声,后来开始哀嚎,惹得红卫兵不高兴了,愈发打得重。终于,他被打出血来。也许是血腥冲激了兽性,那些人简直像疯了一样,不分部位地乱打。夏季穿着本来就少,衣服打烂了,露出皮肉。不知是不是铁器所致,那一下,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皮开肉绽,伤口外翻,渗出了鲜血。车重远没有了声息,直至不再动弹。一条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他是被活活打死的。

也就是从那一刻,我意识到了这“革命”是带有血腥的,照应了毛泽东所说“革命是暴动”。那是我一生迄今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人被活活打死。即使在今天,当我把它落在文字上的时候,我仍感到恐怖,同时多了一种当时没有的愤怒和慨叹:这就是“革命”么?这种“革命”怎么可能把人们带向光明?

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不知使多少人死于非命。能够活下来的真是幸运。1993年3月,我采访“两会”时,当年在天津工商联被拘押的人中,王光英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国权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人民大会堂巧遇王光英夫人英伊利,按小时候的习惯,我称她“英姑姑”,彼此问候了工作、生活,感叹彼此变化,但谁也不提那段往事。不堪回首啊。

### 全面“内战内乱”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权,掀起“一月风暴”,迅速引发各地“全面内战”。那时,几乎天天听到武斗的消息,经常可以在街头看到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臂佩袖章、手持各种械斗工具的造反派,一队队,一车车,很是威风,也很令人恐怖。

就武斗的程度和范围而言,天津还不算惨烈,至少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动枪动炮,最多是铁器。况且,那时家长一再嘱咐,看到武斗赶紧跑开,否则,误伤是没人管的。

各地传来的消息就不同了。今天说这里开了枪,死了多少人;明天说那里坦克上了街,造成流血事件。武斗带来了社会的混乱,各种刑事犯罪乘势而起,而且多为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市公安局门口张贴的各地布告,从一个侧面印证着这些消息。那些布告一张挨一张,贴在公安局围墙外,长达数十米,并且不断更换。每张布告上都有判处死刑的罪犯名单,每个名字上都印上了大大的红色斜叉。天津市也不时召开公判大会,尔后将死刑犯用大卡车拉着游街示众,最后押赴刑场枪决,引得成千上万人围观。

我们无所事事,家里也还暂时平安,于是每天出去看批斗、看游街、看大字报、看辩论会。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挺热闹。当然,看到流血的场面,看到人折磨人,心里也不舒服。但那时到处如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偶尔也回学校去看看,那里已是破败不堪。许多教室都被五花八门的什么组织占据为“总部”了。那年月,除了“黑五类”,似乎是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个组织。于是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也成立一个“造反团”。很快就买来了红布,做好了袖章,那袖章足有20公分宽,戴在胳膊上很“神气”。只是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那钱怎么来的?又凭什么手续就办成了?真是匪夷所思。

有了“组织”总要干点啥。没有地盘、没有经费,连人都极少,把自家弟弟拉上也不超过10人,能干什么?去别的单位“造反”?没那个胆量,去了人家也不会搭理你的。上街去辩论?自己连个“观点”都没有,找谁去辩?在学校“造反”?老师们都回家了,同学们都在忙自己的事,连“革命对象”都找不到。因此,除了涂抹几条标语,我们基本无事可干。

商量来商量去,我们决定去串联——只有脑袋和身体是自己的。当时,全国大串联的高潮已经过去,白坐火车已经很难,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返回原籍去闹革命,车站才会给你一张返程并且直达目的地的车票,并标明不准中途下车改变路线。于是我们决定徒步去北京,按照当时流行说法,这叫“革命小将新的长征壮举”。

## 夭折的“长征壮举”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天很冷,我们穿着棉衣,背着背包,足足走了一天,黄昏时到了距天津60华里的杨村,当地人看我们几个孩子竟然要走到北京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有吃有住,我们酣然入睡。

第二天就不那么美妙了。又走了一天,到了河西务,再往前就是北京地界。但是,河西务住满了人,都是从天津来,到北京去的造反派工人,好像去上访之类,途中住了下来。我们几个人转了半天,竟找不到可以吃住的地方。怎么办?一番磋商,大家决定连夜行军。

河西务地处京津中间,前面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进入北京管界之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公路上没有路灯,只有偶尔经过的汽车扫过一道光束。天越发冷了,我们饥肠辘辘,越走越慢。最要命的是,我临行前新买的解放胶鞋夹脚,疼得厉害,以致一拐一拐的。终于,我们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商量新的对策。继续前行几乎无望,在野外过夜,不冻死才怪,唯一的办法是拦截一辆汽车把我们拉到北京去。

我们试图拦车了,但很不成功。远远看到一束灯光,我们就在路边扬起手来,但那车呼啸而过,连减速的意思都没有。

队伍中有人哭了,后悔不该出来;有人抱怨应该在河西务凑合一夜,也不至于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受罪。我只好鼓励大家,这里离北京不远了,肯定能搭上车。到了北京,我熟,负责找地方吃住。现在的关键是拦住一辆车。扬手的办法不灵,我们决定几个人一字排开“封锁”道路,不信谁敢从我们身上轧过去。

这招果然奏效,一辆卡车终于停在了我们面前。司机对我们的举动大发其火,骂我们不要命,

“黑灯瞎火的撞死几个算谁的责任?”我们连声叫着叔叔、师傅,说我们去北京串联,有人病了,走不动了,帮帮忙吧。好说歹说,司机总算同意了,但声明,只负责拉我们到大北窑,剩下的事他就不管了,我说“没有问题,我们自会想办法。”几个人争先恐后地爬上了敞篷车厢,司机临上车时还嘟囔了一句:“这叫嘛玩意儿呢,弄一帮孩子到处乱串。”我们没人应声,裹了裹棉衣睡着了。“新长征”壮举就这样夭折了。

司机还是个好心人,多开了一段,把我们直接拉到了天安门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那里设有外地学生接待站。我们千恩万谢地下了车,走进了文化宫。接待站里到处都是人,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深夜,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无人接待。好在北京的许多学校都住有外地学生,我从北京转学去天津才一年多,就带着同学们到我原来的学校住了一夜。第二天,大家各奔东西,天知道谁真的去串联了,串什么联。反正我回了母亲所在的外交学院,被管束起来,再没去乱跑。

我们这个“造反团”惟一的一次行动就这样结束了,自动散伙,再也没有联系。我们的“组织”存续了个把月,真是短命。

有意思的是,那双在天津买的穿了两天夹脚的“新”鞋,我拿到北京西单商场向售货员说明了情况,她居然给我退换了一双合脚的鞋。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

## 张闻天是条汉子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直属院校,是培养外交官的地方,陈毅副总理曾兼任院长。一天下午,有消息说晚上要召开批斗大会,把外交部的当权派们拉来示众,可能还有陈毅元帅。那时候关于陈毅的传闻很多,特别是他对造反派的“不客气”更被许多人传为美谈。再说,他是刚刚发生的“二月逆流黑干将”,这次批斗怕是躲不过的。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天黑之后,我就早早地跑到图书馆去了。批斗会场不大,挤满了人。主持人照例带领大家朗读了毛主席语录,敬祝万寿无疆之后,一声断喝: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闻天押上来!张闻天?!在场人群一阵骚动。原来,陈毅元帅没有被造反派搞到手,他们就把时任副部



长的张闻天弄来了。

张闻天穿一件灰色对襟的中式棉衣,棕色制服裤,脚踏棉布鞋,神态安详,微微低着头,站在会场中央。从他放下围巾,解开领扣的动作中,看得出,他对这种场面处之泰然,内心毫无惶恐。造反派轮番发言,指斥他推行“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指使薄一波等61人集体叛党等等。他默默地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当造反派就上述问题指着鼻子要他做出交代时,会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张闻天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缓,但很清晰:“我们国家的外交路线、外交政策,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和批准的。如果说有错误,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负责的。我个人认为,外交工作中个别的失误是有的,但说路线错了,我不同意。”“薄一波等人出狱是党中央批准的。我当时是中央负责人,当然知道并签了字。这件事当时就有结论,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知道。现在说他们是叛徒集团,不符合历史事实。”

张闻天的这番“交代”,无疑是与造反派针锋相对的,是对他们的反驳。在当时的条件下,说出这番话是需要勇气的,要冒更猛烈的批斗,甚至人身伤害风险,但他说了,平静而且坚定地说了。

“张闻天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张闻天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的呼叫声淹没了张闻天的声音。批斗会不得不草草收场。他很从容地转身走了,留下了一个年过七旬老共产党人的背影。

42年前的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记着它。张闻天是我亲眼见到并且亲耳听到讲话的、党内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领导人,而且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说了那样一番特殊的话。在当时,以我的年龄、心理,我很佩服他。因为他与那些在批斗中吓得胡乱认罪,自轻自贱,以求宽容的人太不一样了。张闻天是条汉子。

## “逍遥派”在运动中

1967年,全国到处都在夺权,到处都在武斗,局面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老百姓弄不懂千变万化的政局,夺权也没有自己的份儿,于是出现了大批不介入派别斗争的“逍遥派”。风靡全国的鸡血疗法、制作和交换毛主席像章以及自制家具等等,都是那时百姓们的“时尚”。女孩子们

还发明了,在塑料纱窗上绣毛主席像,并戏称“造反派搞路线斗争,我们搞线路斗争”。我也是“逍遥派”之一。

我热衷于收集各种内部出版物,无非是毛主席讲话、林彪语录、文化大革命文献汇编以及各类组织的小报、刊物。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和平路汽车站去,那里有一个自发的“市场”,有一批专门从事这门行当的人,悄悄地进行暗中交易。我与他们混得挺熟,但从不知道姓名谁,他们彼此也很少提名道姓,只是悄悄地相互递送各种版本的材料。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些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还是以交流为乐趣。据我所知,那里的《毛主席文选》已经出到了十二卷!现在想起来,不能不佩服当时的人们,竟能够在那时就编出多卷本的毛泽东文集。

民间编辑的《毛选》收录的都是正式出版的四卷之外的文章,很多是讲话记录稿,非常口语化。就是在这些文章里,我读出了毛的渊博、文采、风格,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认为,在这些方面,毛身后的领袖们没有能够超过他的。

抢传单、撒传单是文革中一大“景致”。熙熙攘攘的街头,忽然有人向空中抛撒出传单,如片片雪花,漫天飞舞,路人争相拾取,颇似在电影中看到的我地下工作者与敌人斗争的场面。

我曾经抢到、拾到不少传单,其实也看不大懂,大多都订成本子写字了。后来表姐她们厂也造反了,也搞油印的传单,她请我帮助刻写蜡板,自然我也有了成沓的传单,于是带着弟弟跑到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去。我不敢在人群中撒,怕的是传单没撒出去,自己就会被大人们撕碎了。我们爬到劝业场的最高层——八楼天华影剧院,从窗口往下撒,看着自己的举动引来那么多人疯抢,真是很开心。

文革中“培养”了不少刻印传单的“高手”,但更多的是写毛笔字的人才。每天写,一写就是几十张,有些人的毛笔字练得相当不错。这可是发明书法的前人没有想到的“用场”。不过,写大字报练出的毛笔字没有“体”,若归类也只能算“大字报体”。

(作者为《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萧 徐)

#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

• 阎长贵 杨银禄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师,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材料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不过迄今不断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前不久《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指阎长贵)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

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需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们尽自己应尽的一点责任。

前几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商量问问汪东兴同志。这份材料我们从网上下载后寄给了汪延群同志(汪东兴的女儿)。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

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

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两位作者系“文革”中江青的秘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 “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

## • 资中筠

《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刊载关于“三反”运动的文章，结尾称该运动“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实在难以苟同。诚然，由于对当代史真相的屏蔽，一般民众只知当年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被毛主席下令枪毙，感到无比痛快。由于法治不健全，中国老百姓仍未摆脱期盼“青天老爷”或“明君”为民除害的传统心理，出于对今日贪腐之痛恨，把那场运动理想化，也不足为怪。但是本文前半部明明披露了许多“扩大化”的情节（当然远不足以反映其严重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令人不解。这里面的逻辑说明长年政治运动熏陶下的思维定式影响深远。

其一，只问结果，不问程序。如果说，最后“树立正气……树立共产党的威望”的结果值得肯定，那么在这过程中无数受冤屈、受伤害、人格被侮辱、精神受戕害、家破人亡，乃至自杀的人呢？最后“落实政策”受罚、判刑的人数如此“少”（姑不论其中尚有多少冤案），更说明原来蒙冤人数之多，他们所受的有形、无形的损失，以及直接、间接受其牵连的受害者，是无法统计，也无法弥补的，更不用说已经“迫害致死”的生命。为了“除恶”，必须以如此广大的善良人们的身家性命为代价吗？而且，这种损失是从来得不到赔偿的。

其二，“有罪推定论”：先把广大无辜者当作犯罪嫌疑人，“沙里淘金”地找真犯，实际上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翻版。对于这点，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中胡耀邦觉悟最彻底，他曾说，每次运动都说只打击5%，团结其余95%；一次次下来，终于发现95%都成了打击对象（大意）。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曾做出决定不再搞“运动”。不过实际上变相的大小“运动”又搞了几次。说明这种“传统”积习难改。

其三，以“运动”治国代替法治。那么多人，只因其工作涉及钱物，就被当作潜在的贪污犯，无端被剥夺人身自由，“审查”批斗的手段完全是逼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新政权建立伊始，就开了蔑视法律，任意侵犯人权的恶劣先例。以后历次“运动”都依此办理，施之于思想领域，就更加没有明确的边界，打击面一次比一次大，直到“文革”达于顶峰。“文革”号称“史无前例”，是就其“天下大乱”的规模和残酷、荒谬的程度而言，事实上在治国理念、思维模式上是有例可循的。

其四，以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法无天，而所有执行者都无法有“天”，这“天”就是一个人在某时某刻的一句话。“三反”前期的大打“老虎”是因一个人的几句话，并下令限期做出“打虎预算”；刘、张是否罪当死，亦无法律依据，只因“树典型”需要，就成钦定要犯，各地照此办理，“死罪”只凭第一把手意志决定。后期同一个人又说要“实事求是”，批评“主观主义”，把造成如此大面积的伤害的责任推给下面执行者的“主观主义”。这种驭下、驭民，收放自如之术，贯穿在历次政治运动之中。那使几十万大小知识分子上当的“阳谋”自不待言。接下来的“大跃进”，以一人的师心自用，造成饿殍遍野，又以彭德怀的冤案钳众人之口，忽然转而批评下面虚报、浮夸，下令“实事求是”。一人上下其手，永远英明正确，而在这过程中造成多少冤案、冤魂，在所不计。

其五，所谓树立“正气”，值得怀疑。从本质上讲，在全民范围内进行逼供，不是整人就是被整，鼓励互相揭发，造成杯弓蛇影互不信任，“正气”何在？事实上，正是以“三反”开始的（事实上在此前的“镇反”已经开始，不过规模较小）这种一浪高一浪的“运动”造成了一种“揭批”文化，把一时



的“政治”任务置于一切人伦、道德之上，或被迫，或自愿告密成风，至亲人反目，友情疏离。中国传统士大夫重名节，“士可杀，不可辱”，在“三反”中无端被诬为贪污是最大的的人格侮辱。所以王世襄老先生对各种人生坎坷、政治帽子都能泰然处之，唯独对于当年被诬陷贪污故宫文物这一点，至死耿耿于怀，一定要讨一个明确说法。自“三反”以降，历次“运动”中莫不对批斗对象采取人格侮辱的做法，使人人以最坏的设想加于他人，也加于自己。于是，善恶是非都被模糊、颠倒，似乎天下无“好人”，随便什么人，干什么坏事都是可以想象的。运动一来，高压之下，说假话成风，何来“正气”？“三反”运动实开其先河（这里只谈1949年之后，在此以前的，如延安“抢救运动”等等，姑且不论），只是时间比较早，范围尚不如以后的“反右”那样大，但本质上是具有共同之处的。

其六，“三反”与“五反”是分不开的，而且后者是重点，其对象是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就被打击的对象而言，“五反”与“三反”一样先扩大，后收缩，最后“落实政策”。但是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各阶层各党派代表共同制定的“共同纲领”不到两年，转身即遭废弃，从此时起，完全背离“新民主主义”道路，而企图跳跃进入“社会主义”。刚开始恢复元气的大小民族工商业受到当头一棒，逐步被取消或收归国有。国民经济受到破坏，几十年不断向“左”的建设弯路从此开始。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在运动一开始就自杀，主要不是因为个人受迫害，而是敏锐地意识到了前途绝望，是有象征意义的。

综上所述，“三反、五反”运动的负面影响深远。至于其一时间对经济贪腐起一定的震慑作用，远不足以抵消其所付出的近期和远期的代价，而且这种“反贪”的手段是难以持续的。在痛恨今日之腐败之余，人们往往留恋五十年代的政府“清廉”。诚然，在革命胜利初期，确实有一段政风比较清明的时期，这是承革命风暴之余威，还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任何朝代建立之初都是如此，总不能一上来就腐化堕落吧？再者，当时的分配制度中供给制还占一定的成分，钱财的用处不大，因而诱惑力还没有那么强。不过这种情况也未持续多久，随即悄悄地发生变化。那时不称“腐败”，而称“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在全民

物质匮乏之时，不一定表现在货币上，例如各种票据（粮票、油票等等）都可贪污；权无论大小都可以用来谋私，从农村大队长到京城高官，各自都可根据手中权力的范围谋取或交换某种私利。不过直到“文革”之前，还没有达到弥漫性的地步，还存在相当一部分净土。真正从观念到行为完全失控始于“文革”，此处暂不详述。

的确，毛泽东对进城之后革命队伍腐化的危险一直是戚戚于心的。从大力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都足以说明。但是他首先把革命胜利者的腐化责任推给外人（即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不认识到权力本身对掌权者的腐化作用，因此并未致力于建立监督权力的机制。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他也说了找到了“民主”的新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但是他实际做的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运动”代替民主制度的建立，把至高的权力绝对化。也许他心目中的“民主”就是如此，就是以他一人指挥全国群众批斗他所认定的革命对象？这就是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政府”不包括他本人？而且实际上以这种方式被监督的并非各级政府，相反，更多是权力体制以外的人。何时本该被监督者不“让”监督了，“人民”就监督不成了，甚或监督有罪了。总之，自新政府建立以来，没有切实建立监督公权力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而是屡屡凭一人或少数人指挥群众运动处理问题。今天的腐败严重程度令人扼腕，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权力缺乏监督，民主被歪曲为当权者“为民做主”。直到现在，以“运动”代替严格依法行事的做法依然存在，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小范围的。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向往再来一次“运动”以扫荡当前的社会污泥浊水，足见这一传统之影响深远，而依法行事，特别是尊重“人”却十分艰难。本期黄宗江先生的文章提出“唯人主义”，可以想见作者对这种“目中无人”、“心中无人”的传统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有鉴于此，我认为时至今日，再重弹“某某运动尽管‘扩大化’，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一类老调实乃误我苍生！



# 对资中筠文章的几点补充

• 何 方

资中筠关于“三反”的文章写成后送我一阅，我深有同感，现根据我当年的亲身见闻，再作几点补充。

1953年春，我参加了外交部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组织的驻外使节参观团，“走马看花”似地去了安徽、河南、陕西、察哈尔（后撤销，划归山西和河北）等省。参观目的是了解国内建设情况，便于作外交上的配合和进行对外宣传。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参观团内有身为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驻苏联大使张闻天，所以颇受各地重视，接待规格也较高，总有省领导人介绍情况和陪同参观。结果就引出了个“中央派人来检查工作”的谎信，在所去地方的一些干部中传开，带来了不少麻烦。当时正是“三反”运动才宣告结束，被整人员的处理大部定案的时候。我们每到一地，就有或多或少的干部前来喊冤告状，大多是要求为个人平反。他们一般都是避开地方干部，专找代表团反映情况的，因此总是在代表团住的招待所和休息时间找上门来。这可给代表团出了难题。张闻天同姬鹏飞等其他几位大使商议，提出不能干预地方工作，也不能承担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义务，劝他们有问题还是找地方党委。最后决定：凡来求见和反映情况的，一律由何方去“应对”，不要耽误大家的参观和休息。我当然只能服从。

其实，我对付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两条。第一，是说明我们并不是什么中央派来的，我们是整年派到外国工作，这次回国休假，趁机会到各地看看国内建设的。我们不但管不了地方上的事，他们的意见也没处反映，因为管我们的是外交部，外交部又无权管地方。第二，是劝他们有问题还得向地方党委反映，只有地方党委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来人总是说，由于他们是地方上整错的，找地方党委政府不解决问题，才找你们北京来的人。但我还是好言相劝，推出去不管。至于他们反映各地“打虎队”如何搞逼供信、如何违法乱纪，说老实话，我连听的兴趣都没有。因为一则讲的几乎千篇一律，我已听到过不少；二则这类

所谓的群众运动，我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早已“领教”过了。总之，每位前来告状的人，在我的好言相劝之下失望而归。但是我还是从这些告状中了解到不少有关“三反”的情况。

除接触“三反”运动中挨整的人前来告状外，同地方领导的座谈或聊天中也经常谈到“三反”。上下了解到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参观过的那几个地方，好像没有打到几只真“老虎”，花钱费力轰轰烈烈搞了一场“三反”运动，副作用反倒比正面影响大。因为运动搞得太离谱，弄得有点混淆是非，人们搞不清什么算贪污、什么不算。例如历史上著名的“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当时就听到一些不同的传说。一是说后来算做刘张们的贪污款项，大多是他们弄来搞了“机关生产”（这是从抗战时期搞生产运动开始就兴起的给机关单位搞积累、搞福利的传统，所以在解放区和解放初期还有大公家小公家之分，当时倒是很少听说有大干部或老干部搞私人财产的事）。另一传说来自外交部。说刘青山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出国参加了个什么农民国际组织的会，还当选为执行委员之类的领导成员。还没回国，毛主席就已批示枪毙。外交部有人反映，对他的处理是否应照顾国际影响。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政府处置中国人，洋人管得着吗？所以还是一回国就被逮捕起来，很快就枪毙了。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不太了解。但听说刘张被捕后态度还好，干部中议论这样老的干部可否留下脑袋以观后效，却是确实的。

在各省市了解的具体案例已记不清，但外交部办公厅一件案子却记得准确无误，印象特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一切机关都得打出“老虎”来，重点是各单位管钱管物的机构和个人。外交部就是办公厅和总务司，而办公厅只有文印处等少数单位能算得上。结果就把突破重点放到了处长——一位老干部余森的头，成天到晚硬逼他交待贪污的数量和项目。余森被迫无奈，又一时想不开，就用刮胡刀片割腕自尽了。后来虽查出他没什么问题，但由于他“自绝于党和



人民”,也得不到平反和家属照顾,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长期过着凄惨的生活。

那次参观,在听各地领导的汇报和闲谈中,也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三反”中的冤假错案。但由于经过多次运动的“熏陶”,他们也就见怪不怪,“都付笑谈中”了,并不感到惊奇。至今仍然记得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说河北有个县,在“三反”中把一个干部关在办公室,逼他交待问题。他实在过不了关,就乘“打虎队员”一时不在,不知怎么竟能把一盒大头针吞入腹中。人们发觉后立即报告领导。有人献计,不要紧张,强迫他吃下两个大白薯就行了。后来果然灵验,大头针很顺利地被他排泄了出来。还有一件,是在山西时负责陪同参观的省委副书记陶鲁笱说的。他在谈到“三反”运动中逼死不少人命时顺便提到,说咱们过去搞运动多了,而且每次运动都要死人。前两年山西搞扫盲运动,地方上也要制定计划、造声势,提出要限期消灭文盲,弄得不识字的老人都有点惊慌。一个农村老太太就吓得上吊自杀了,死前对人说,不要你们消灭,我自己消灭算了。

由于毛主席想象中的“老虎”过多,又勒令各地限期捉到,所以地方上就各显神通。例如他对上海就提出具体要求,在1952年1月24日的电

报中说,“上海可能有上千只”,“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于是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在捉不到贪污的“大老虎”的情况下,竟发明了个“思想老虎”。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顾准就是被定为“思想老虎”打倒的。在这里,我们就从2000年1月出版的《顾准全传》中引证一段作为结束。

“‘文革’结束后,华东和上海在‘三反’中被打倒的大多数高干,如黎玉、顾准、恽逸群、温仰春、黄逸峰(原华东局交通部长,经毛泽东亲自批示,华东捉出来的最后一个‘思想老虎’,开除党籍)、曹曼之、李剑华、王纪华、陈公祺……不仅得到彻底平反,并且成为党内外普遍尊敬和纪念的优秀人物,的确发人深省。可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根除干部腐败,就必须搞一次类似‘三反’的政治运动。不知这些人是否真正了解‘三反’的实际情况。根除腐败,难道是运动可以解决的吗?经过‘三反’,政治上的标准弄得是非混乱,同志间的信任被大大破坏;随便打倒一个人成为风气。‘三反’以后,各种运动接踵而至,直至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中国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可见,不能再为“三反”运动评功摆好了。借此恢复个人崇拜,就更加错误。

## 出版社约稿

### 国内正规出版、公开发行,或海外正规出版、公开发行

- **书稿内容** 1. 以回忆录、自传或其他人物传记,社会纪实作品为主的历史类书稿; 2. 以社会科学、人文与伦理、历史与年鉴、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题材的学术研究著作书稿; 3. 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文学类书稿; 4. 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败等各类题材的长篇、中篇小说集书稿; 5. 美术类: 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 书法类: 毛笔、硬笔、篆刻等作品。
- **书稿要求** 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可以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6-8万字以上;多人合集可以由2-10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每位作者单独或多篇作品字数应达到3万字以上。
- **出版发行办法** 本年度计划出版200部,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分别面向国内以及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网上备案查询。
- **其它事宜** 1. 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合同; 2. 组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一到二周内回复; 3. 来稿请勿寄原稿(切记!!),并保证字迹工整、清楚,已编好目录、顺序; 4. 书稿经审阅,如达到出版水平,我们将及时通知作者,如经审阅不符合出版要求,作者可以要求稿件退回(挂号或特快退回,须自付邮资); 5. 寄稿须知: 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E-mail)更佳,来稿时附彩色近照一张,200字内简历一份,注明联系地址、电话; 6. 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 24小时全国免费热线电话: 400-680-8368 (限投稿咨询)

我们每年运作300余部图书,新书欣赏、网上订购,请登录: <http://shop.chinesezj.com/> (学习新知网上书店)

投稿地址: 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邮编: 100025)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综合编辑部(收)  
电 话: (86)10-81118378、81118398、86878777、58429718 传真: (86)10-89506467  
在线投稿: [bookbj@126.com](mailto:bookbj@126.com) [bookbj@bookhk.com](mailto:bookbj@bookhk.com) 联系人: 羽菲、文馨(编辑)  
详情请浏览网站: <http://www.zuojiba.com> (中华出版热线)



# 《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 李 逊

## 柯庆施与批《海瑞罢官》似无关

1965年初,江青来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是修改京剧《林海雪原》;二是秘密特色人选批判《海瑞罢官》。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柯庆施。不过,此时的柯已身患绝症。他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去北戴河休养,9月18日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离开北京去广州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这个日程表全部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著《爸爸的身影》,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红星照耀的家庭》)

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有人说姚文元是柯庆施推荐给江青的。有回忆录说,柯庆施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所著《我的文革岁月》)

其实即使柯庆施曾经要张春桥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柯的支持大概只止于此。因为柯庆施此时已经不再主持上海工作,甚至从此没回上海。身患绝症的他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实质性参与。据不久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说,柯庆施离开上海去外地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外出养病期间,跟随柯的机要秘书从未接到过上海方面任何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件和电话(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而且,《海瑞罢官》所谓要害问题“罢官”,至1965年才提出,彼时柯已去世多时。

当时,这种批判很多,连比吴晗地位更高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也因其“合二而一”的

哲学思想在挨批判。柯庆施即使支持,也只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安排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夫人要求的事宜。如果说有什么超出共产党行事规则的地方,那是毛泽东让夫人越轨插手党务,应该不予理睬,但柯庆施包括全党,无人敢这样做。

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分管宣传口的书记,具体负责批判《海瑞罢官》,从市委书记的工作分工来说,名正言顺。他与江青结帮是后来的事情。

张春桥认真完成江青交办的事,甚至还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套《明史》。当时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起兴趣。

柯庆施逝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她对陈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李希凡不接受,才来上海。她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她要陈丕显也支持她。(《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 柯庆施对张春桥上升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张春桥也已经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到上海都与张春桥联系。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935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正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便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

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震林发现制止，并拟将他调离上海。柯庆施留下他。

和张春桥长期共事的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

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张春桥不与人往来，除了布置工作，不与人多说话，更别说聊天，从来没见过他与上海市委的其他领导们有谈得来的时候。他与当时的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门对门，但从来不和李聊天。给李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的李家齐 2009 年对笔者的回忆）

“阴”，是几乎所有与张春桥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时，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江青文革初期的秘书阎长贵著《问史求信集》第 418 页，红旗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 60 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活跃市场，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部征求意见。但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会议一开始，下面干部还没有发表观点，便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的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

不过，张春桥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文革以前，他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春节期间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丁也不以为意。

张春桥出名是在 1958 年“大跃进”。柯庆施去参加当年 8 月北戴河会议，回来后，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告诉张春桥。在这个讲话中毛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对 1949 年后实行八

级工资制所造成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张春桥从柯庆施处知道毛的这一想法后，根据毛的这些话，连夜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解放》杂志 6 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

张春桥对经济是外行，他这篇文章算不上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政论文。因与毛想法合拍，受到毛赞赏。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毛泽东也因此知道张春桥的名字。同年 10 月，毛泽东点名要张春桥和陈伯达一起去河南遂平嵯岬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毛开始注意张。

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柯庆施不搞家属株连，显示其胆识，更显示他对张的器重。

## “金棍子”姚文元

江青找李希凡写文章，李希凡婉言拒绝。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是机关干部，习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写批判文章只问符合不符合当前政治，不管学术层面能否自圆其说。

姚文元资格比李希凡老。

姚文元生于 1931 年 12 月。1948 年时还是中学生的他，便已加入中共地下党。1958 年，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1961 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文革前已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多本文集。他 1956 年 6 月 30 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以及 1957 年 6 月 10 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曾经引起毛泽东注意。这是柯庆施将他调往《解放》半月刊的原因。

但在文化圈内，姚文元口碑不太好，被称作“棍子”。因为他文艺思想核心，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艾青、巴金、丁玲，这些著名文化人都

挨过姚文元的批判。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的态度,是姚文元特别敏感的,捕捉此类信息,是他的特长。他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就是这种敏感的产物。又例如,姚文元曾对人说,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又是开会,又是出纪念文集,可196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却冷冷清清,你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5月16日对王知常的访谈)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如果只是个人观点,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姚文元的“棍子文章”成为党的棍子,挨棍子者没有辩解商榷余地,更不用说反驳和批判。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像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几乎没有私人交往,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嘎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鉴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学习。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谈姚:“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一直也没有改变。”(以上都是朱永嘉对笔者的回忆。)不过,他的棍子文章,虽然有揣摩局势投当局所好之嫌,但这是当时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文化界的潮流和大趋势,包括吴晗写《海瑞罢官》,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唯毛泽东所思为思,唯共产党所想为想。人们觉得应该站在党的一边,和党与领袖保持一致,唯恐跟不上。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别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等等,都是他的最爱。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判刑关押,他在写交代之余,写出三本著作,都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认识史的。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本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这三本书著作的手稿,笔者曾经都看到过)。一生以写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己任的姚文元,最后的写作却是“天、地、人”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

显示他对科学领域的由衷爱好。只是时代将他塑造成棍子,他自己也选择棍子人生。这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朱永嘉告诉笔者,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姚文元要向报社打招呼,张春桥说不必,随便找个理由,此事要保密。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等他。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版。作者王文正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接到写作任务后4月,正值华东局《未定文稿》与市委写作班对换办公场所,《未定文稿》从原来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11号。姚文元办公室在三楼,他让工作人员搬入两张大写字台,他喜欢大台子,可以随意摊开资料。他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张春桥替他向解放日报社请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他都不看了。所以,姚文元应该是从1965年5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彼时柯庆施已经去世。姚文元对明史不熟,江青又催得紧,他对张春桥说,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让他去一次。姚文元赶去见到张,张告诉他,为他找的人是朱永嘉。姚文元联系上朱永嘉,他对朱说,是市委安排他为自己当助手。

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而且是组长。毛泽东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查材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

最初姚文元只对朱永嘉说市委让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朱永嘉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我将吴晗的书和文章拿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的,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



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诫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 张春桥动笔前要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

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对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他起初不知道：“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但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见《问史求信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参与？让后人费尽猜详。

在开始批判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编著，香港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究竟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

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张春桥所说的“我们”，究竟是他和江青，还是再加上毛泽东？不得而知。暂存疑。不过，张春桥说他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不像他自己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

而且，早在张春桥通过江青询问毛泽东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虽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但毛泽东此举足以证明，他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和真正推手。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1965年6月间。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以上江青的话均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

的中心》第28-29页)

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

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到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想,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8-29页)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于是于11月5日和7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宛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以上材料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及李逊、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8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 上海市委讨论姚文元文章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常委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在场的朱永嘉当时觉得杨的意思,是要姚文元考虑文章分寸,不同意这样批判吴晗。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太把文章当回事。(李逊、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记录)

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稿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糜欣祥《铁骨铮铮,正气浩然——记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这次因是市委书记处讨论,曹才又仔细看一遍。

市委领导干部们都以为姚文元只是批判吴晗的剧本。1949年后这种批判太多,尤其60年代以后,今天批判著名哲学家冯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一会儿批判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一会儿又批判史学权威周谷城。上海市委干部们可能以为这次批判和那些批判差不多,批判一阵子,职务上调动一下就结束了。

即使上海市委领导觉察到什么,也无法明说。此时,毛泽东已决定发表姚文,上海市委对文章有什么态度,根本无力回天。

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1967年5月)

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1967年1月8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第16期《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作者是“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

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1949年前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当时是理论部主任。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这话张春桥对

陈丕显和朱永嘉都说过。(《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36页,以及未刊稿《己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朱永嘉2006年8月著)

所以,如果说当时保密得滴水不漏,上海市委除张春桥外都蒙在鼓里,有点言过其实。如前所叙述,首先,上海市委从姚文元开始写文章时就知道,而且文章也经由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其二,毛泽东在姚文发表前,向彭真透露过要批判吴晗;其三,张春桥曾向邓拓打过招呼,邓拓应该会告诉吴晗。

本来,新闻报刊应该有批评当政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1949年后这类批评根本不被允许。批判有一定职级的党或行政干部,必须经由相关部门允许,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制定的程序,也即“组织原则”。所以,即使是毛泽东在讲话时向彭真提了一下,彭真并不认为这样就是通知北京市委,他后来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的愤怒还有另一个来由,因为就在姚文元发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这一年,1965年上半年,中央曾两次发文规定报上点名要经过中宣部,还要求学术批判不要戴帽子。

定稿后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毛泽东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张春桥建议,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引起争论。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还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陈丕显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据朱永嘉对笔者说,这是姚文元女儿告诉他的)

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上海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飞夺泸定桥”的人和事

彭查理

《飞夺泸定桥》这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记事文稿,是我的父亲彭加伦先生于1936年写成并发表的,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篇有关中国红军夺取泸定桥战斗的记述。内容主要讲述了1935年5月29日在中国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领导)下属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指挥下,由二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带领22名战士夺取泸定桥战斗的纪实报道。后来中共党史、军史,凡官方记载史料均以我父亲所写的版本为依据,因此被外界称为“正史”。

1991年,由覃应机先生写的《硝烟岁月》一书中突然提出,1935年5月29日的泸定桥战斗,是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彭德怀领导)下属红十三团团长沙彭雪枫政委指挥下由侦察连长覃应机等12名战士夺取泸定桥的。

近年来,媒体对这两个版本做了不同程度的披露,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人们对泸定桥之战的质疑。作为学术争论,史实考证,这是一件好事情。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关飞夺泸定桥的信息提供出来,以供史学家们和有兴趣研究泸定桥之战的爱好人士作参考。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研究历史,让我们先从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讲起。

## 彭加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简单历史背景

我父亲1923年投身革命,先是受党的委派参加国民党,被委任县党部委员,1925年回归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起至长征结束,历任红军第八、九纵队政委,红22军(军长陈毅)军委秘书长、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

这里需要做一下解释。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是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自由组合而成的,这个组合并不是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当时红一军团是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林彪只是红一军团下属红四军的军长,而红三军团是由彭德怀领导,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朱德是平级,林彪则属于下级。记得父亲生前曾多次跟我们提到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关系,他说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撤下来后与红一军团会合,实际上有投奔红一军团的意思,当时红三军团的粮食供给只能靠红一军团的帮助。看到红一军团在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对中共中央下达的战斗任务,是只动不打,因此没有任何损失,彭德怀、朱德、毛泽东都认为中央下达的作战命令,把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开独立作战是不对的,应该联合作战才会增强实力。彭德怀这个人是个直脾气,他主动提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并明确表态他个人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职务,原意接受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父亲每提及此事,总是赞叹彭德怀有肚量有眼光。因此红一方面军组建初期,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都由一军团的人兼任,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父亲既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又是红一方面军宣传科长的原因。父亲说,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他们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朱、毛虽然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但是他们仍然兼红一军团的职务,红一军团指战员的职务几乎原封不变。朱、毛对红三军团只下达战斗任务,由彭德怀自己负责部队领导干部的使用和调动。我父亲由于是红一方面军具体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除此而外,也常常去红三军团帮助搞宣传。父亲讲,毛泽东和朱德特别嘱咐他,凡红三军团的事一定要经过彭德怀

的同意才能做。本着这个原则,凡红三军团的重要宣传事宜我父亲都会事先报给彭德怀同意后再报红一方面军总部做宣传。

我父亲去红三军团开展宣传,在三军团人眼里他是上级机关派来的人,但他同红三军团上下相处得都很融洽。特别是长征开始后,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改组,政委由周恩来代替了毛泽东,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人事变动很大,很多三军团的人进了一军团,也有很多一军团的人被调入三军团,打破了初期的建制格局,但两个军团的干部战士关系都很好。长征时中共中央落在红一方面军,实际随军于红一军团,红军到达陕北后彭德怀提出取消红三军团的编制,全部编入红一军团,至此红三军团建制取缔,所以后来人们把红一军团看成是中央的标志。

## 我听到父亲讲过的泸定桥之战

文革结束后,我曾到父亲的好朋友刘少卿将军(开国少将)家做客,他说我长得很像父亲年青时候,叫我小加伦将军(红军时代的人都叫我父亲“加伦将军”)。他谈到认识我父亲是在红三军团,他说那时他在红三军团任六团团团长,加伦同志从总部来帮助他们搞宣传学文化。当时红军干部大多数都没有文化,所以打完仗不会写战报。加伦同志人缘关系好,常常帮助他们写战报,红一方面军许多著名的战斗报道都是出自加伦同志之手。他说,你们在《星火燎原》中看到的《飞夺泸定桥》一文,原来就是加伦同志写的,不知道怎么现在成了杨成武写的了?我对他说,这件事我知道,我听父亲讲过这个事件的原委。

当时的情况是《星火燎原》编辑部向我父亲征稿,我父亲就把那篇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一文给了他们,不久杨成武来找我父亲求父亲帮他忙,成全他一个心愿,希望父亲把“飞夺泸定桥”这个标题让给他使用。原因是《星火燎原》编辑部说文章的标题不能重名,而圈内人士都知道“飞夺泸定桥”的标题是我父亲首创的,杨这才来请父亲帮忙。杨成武对我父亲说,老彭,泸定桥这一仗是我打的,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义上,你就把这篇文章让给我吧。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成全了他的心愿,并把自己的稿子从《星火燎原》编辑部撤了回

来,所以在《星火燎原》中的文章是我父亲的原文,又经过了杨成武增删的文章,署名也是杨成武。

尽管后来也有些高级军事将领,职务和级别都比杨成武高,要为我父亲“正名”,都被父亲拦下了,父亲说,我与成武同志几十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五个字吗?!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从此“飞夺泸定桥”成为杨成武将军的专用词汇。直到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又把我父亲这个《飞夺泸定桥》的文章“之父”搬了出来。

解放后,党史研究人员、军史研究人员、艺术创作人员到我家采访父亲不断。常来的有黄宗江(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电影《农奴》的编剧),常鹤龄(空政文工团团长),危聆(八一厂演员)。最多提及的是“飞夺泸定桥”之战时,当时的战况,及敌方兵力数字和我方参战的兵力及伤亡数字。父亲的解答是相当详细的:

1. 红军时期基层领导有文化的并不多,并不是每次战斗都能有详细的记载,军事干部只顾打仗了,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个别有文化的军事干部偶尔能做到战后的文字总结,大多数的都做不到。你们所说的,解放军有战后清点和总结的优良传统,那是抗日战争之后,解放战争之时才达到的,而在红军时代尤其是长征时期,命都顾不上,哪里可能做得那么好?

2. 写泸定桥战斗,我是受命跟踪报道。军委的命令是三天拿下泸定桥。我作为直接参与这场战斗的唯一文职官员,从安顺场跟着杨成武的部队一路夺隘架桥与杨森的部队战斗不断,320里路程攻击前进直到泸定桥头,又随部队冲过桥头,一路全神贯注,写出从安顺场开始到夺取泸定桥完整的战斗经过。部队冲过桥之后,接着追击攻打泸定城。我没有参加攻打泸定城的战斗,是因为我要赶着完成夺取泸定桥战斗的报道,并组织印刷。当大部队过桥的时候,夺取泸定桥的战报已经发往全军,极大的鼓舞了全军将士。毛主席在过草地时还专门对我说,你在战士报上写的《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一词用得真好哇,我们的战士都是天兵天将,激励全军嘛。(毛主席指的战士报就是一八五期战士报,可惜已经遗失)一九三六年我重新写《飞夺泸定桥》一文时,是根据我的原手稿以及我的调查资料修改后完成。当时有个别领导说文章标题中飞夺一词是否有些夸张,可否改成“泸定

桥的战斗”等,我说,连毛主席都非常欣赏“飞夺”一词。我坚决地拒绝了。我的这些手稿一直保存着,直到接收东北时,我们刚刚打开行李,国民党军队就到了,我们撒腿便跑,来不及收东西,所有的行李都丢了,我珍贵的手稿资料也在那时全部遗失。

3. 关于敌人兵力和为何能顺利夺桥。国民党驻守泸定城地区总兵力为两个旅,当然包括泸定桥地段。所以我写的对岸敌军两个旅是有根据的。直接守桥部队是两个团包括民团。我军非常重视夺取“泸定”,被中央认为是生死攸关之战,每一部署都是中央决定的,分左右两路军直扑泸定桥,志在必夺。因为早就知道敌军守备部队可随时增援至两个旅,我军准备了更加充足的兵力,几倍于敌。杨成武是开路先锋为第一梯队,一旦杨失利,后续部队会源源跟上继续攻击。原定左右两路军同时攻击泸定桥,可不知什么原因,右路军迟迟未到,肯定是遇到了敌人拦截,因为我们左路军一路走都受到敌军的拦阻。中央决定由杨成武部抢先攻击桥头,也许在战斗中右路军就会赶到了。我亲眼目睹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明显的是我军火力压制住了敌方。就在我们的战士快爬到对岸桥头时,桥头突然着起火来,我们战士急了,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大喊着冲了上去,敌人全吓跑了。我原以为战事还会长一些,等到右路军到达对岸桥头时敌人就会撤去。没想到战事突变,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对岸。我在写战报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根据我的所见记录下来做出报道。战后我思考,有可能是因为敌方得知我右路军已经接近桥头怕被双面夹击,那样就会被全歼,所以跑了。但那也只是猜测,我所见到的事实是敌人没有增援,而我们冲上去了,敌人跑了,我们胜利了。

4. 关于写作和回忆。写泸定桥战斗的有许多同志,但多数是根据回忆写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在战斗中边看边写,当场写出来的,应该是最真实的记录。你们来采访,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当事人,不是研究历史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身的经历、看到的和听到的记录下来,但是我们每个人战场的经历不一样,只能是写个人经历的一面,不可能写出面面俱到的文章。比如我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报道时,时间紧,写完后立即发往全军。所以我只能把我看到的写出来,看不到的不能去作

全面了解,也没有时间去了解。战地报道不是总结报告,更不是研究论文,主要写战场气氛战事情况,是真实的现场记录。当时有人口头告诉我了一些参战人员的名字,我只能记几个主要的,其他人就用“等”字代替了。我为什么写我方兵力为一个团呢,因为只有杨成武的这个团直接与敌军作战,右路军还没有赶到战斗就已经结束,左路军其他后备部队并没有参加战斗,我当然只能简明扼要地写我方参战部队是一个团的兵力,总不能把一方面军准备参战的所有团、连级部队的番号都写进去。

实际上泸定之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安顺场至泸定桥,320里路程边攻打敌军守备要塞边行进,第二阶段是攻打泸定桥,第三阶段是攻占泸定城。泸定城与泸定桥仅“一步之遥”,杨成武的四团在拿下泸定桥之后紧接着就打下泸定城。在泸定,敌方总兵力中可参战的兵力为两个旅,我方参战实用兵力是一个团,这是我所知道的。战时报道是会有些误差的,这些在所难免,也只能是历史的遗憾了。比如我在1935年写的《飞夺泸定桥》战报,文中在时间上就有误差。我写的是5月13日从安顺场出发,15日打下泸定桥,后来同志们告诉我,实际时间应该是5月27日出发,29日打下泸定桥。当时仗打得太激烈了,我也糊涂了,就这么发稿了。1936年,我重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文章就是完全根据1935年的手稿写的,我已经知道时间上有误差,但并没有把日期改过来,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原始文件是不能改的,改了就不是原始文件了,我要保持历史的原貌(包括错误),这才是真实的反映历史的记载,并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战争场面的激烈程度。即使要更改错误和误差,也是在另外的补充文件中作修正。

采访报道时常会有些错误,我当年为写报道在采访有关基层领导时就出现过一些可笑的事情。如我采访有关攻打遵义城的情况时,当时一位连长兴致盎然地讲给我听,我迅速地记录。可很快就有位领导告诉说,加伦同志,你要了解的是第一次攻打遵义城的情况,这位连长根本就没有参加,他参加的是第三次攻打遵义城!红军当中基层干部很多,大多没有文化,闹出过许多这类笑话,需要多找些人了解,尽量互补,才会清楚。

以上内容是我根据父亲被采访后他的一些笔



记手稿整理出来的。

## 关于覃应机先生的红三军团打的泸定桥之战的说法

1. 我父亲既是红一军团宣传科长,又是红一方面军宣传科长,负责全军的宣传工作。红一方面军里的重要的战斗都有可能派我父亲作现场报道。如果说,像泸定桥这样一场重要的战斗被他张冠李戴地搞错了,恐怕早就被撤职了。彭德怀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当时他与毛泽东、朱德是平起平坐的位置,朱、毛对他也要让三分。红一方面军建军初期,朱、毛在中央曾受压制,他们联合彭德怀,怎么可能抬一军团而压制三军团?到毛泽东重新掌管军权,那时毛并不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自己的位子都还没有坐稳,怎么可能压制彭德怀?再说,像泸定桥这样一场生死攸关重要的战斗,是要由中央直接决定由哪支部队哪个团担任主攻,这些任务命令的下达是有记录在案的。如果真是红三军团十三团打的泸定桥,是谁下达的命令?彭德怀作为红三军团的一把手能不知道么?我父亲受朱、毛的嘱托对红三军团的事一定小心又小心,再说我父亲当时无论从级别还是职务上说都比彭德怀要低,借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移花接木,把红三军团的功劳戴到红一军团头上。如果说我父亲有本位主义,有意贬压三军团,或者做了重大的失实报道,那么国共联合抗战后彭德怀怎么还会调我父亲去做他的宣传部长呢?这恰恰说明彭德怀认为我父亲在长征时期的宣传工作中没有重大失误,且同红三军团的人共事融洽,才有可能调父亲去和他一起工作负责前方全军的宣传。

2. 红三军团中很多人都跟我父亲相熟,长期以来为什么从没有一人指出我父亲的报道文章失实呢?如,彭德怀跟我父亲长期工作在一起,如果真是我父亲把彭德怀的功劳给了林彪,彭德怀这样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怎能容忍这种错误,还不得恨死我父亲?他怎么从来没有向我父亲提过此事?他们可一生都是好朋友啊。再如,彭雪枫,由于同姓关系,他同我父亲也很熟络,如果泸定桥战斗是他打的,他怎么也从没纠正过我父亲的“失误报道”呢?还有,文革后我去原红三军团六团团长沙

少卿将军家里做客,他夸奖我父亲写的文章,特别是《飞夺泸定桥》。他从没有说过泸定桥是红三军团打的,也从没提到我父亲有关泸定桥战事报道是件失实的事。1978年我在我大嫂家玩,我大哥的密友、罗华生的长子邀我大哥去看望他父亲。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大哥彭宁,电影《苦恋》的导演,我大嫂汪旋(前妻)的父亲汪祖美当时任铁道兵参谋长(少将衔),长征时是红一军团第三军七师十九团连长;罗华生,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开国少将),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四团党总支书记。这两家人都同住在铁道兵司令部大院,相隔只几步之路。罗华生是我父亲生前的老战友,我同大哥一同去看望他,到了罗家,罗华生伯伯非常亲热地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的父亲“加伦将军”,我们以前都这么称呼他,跟我好熟哩!长征时,打泸定桥,我们就在一起,那时候我在四团负责挑选攻打泸定桥突击队的战士,你们爸爸是中央专门派来写我们打泸定桥的报告的,他的文章写得好哩,他可是我们红军中的名人哩。我们这才知道原来罗伯伯也同泸定桥之战有关系。

长征路上《飞夺泸定桥》的战报全军都看得到,想必覃应机先生当时也看到过的,如果覃认为报道严重失实,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呢?或者直接找我父亲也可以呀。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中央领导跟大家一样行军,谁都可以随时在行进路上找他们说话,我父亲不是中央级领导更该好找。覃应机本人也在红一军团工作过,他完全可以找到红一军团的领导反映,或者直接向中央反映。如果说行军路上顾不了这许多,红军到达陕北后,安顿整编,也可以向总政治部反映,提供证人和证据。参与过泸定桥战斗的有关人员中许多人到解放后还活着,都是证人。可以作证的人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等,他们都是决定哪支部队参加这场战斗以及谁负责主攻的决策人。而林彪、杨成武、罗华生是具体执行人,我父亲是亲历目睹战斗的现场报道者,还有,中央党史馆至今仍保留着中央和红一军团给杨成武下达夺取泸定桥战斗命令的文件档案。从1935年我父亲写《飞夺泸定桥》一稿(1936年的那篇文稿是根据1935年的战报手稿整理写的)至1970年父亲去世,《飞夺泸定桥》只有一个版本,从没有过第二种说法。现在外界传说,一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父亲所写的一军团主攻版本，还有一个是三军团主攻版本，而三军团那个版本一直受压，一军团版本成为主流。这完全不是实事。事实是所谓“三军团主攻”的版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就根本不存在压制谁的问题。至少在我父亲去世之前没有一个什么三军团主攻的版本。覃应机先生的红三军团版本的说法不知最早从何时出现的？也不知有过哪些认证？

3. 我父亲是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的资深红军干部。长征时他的职务级别不是杨成武的下级，他在1930年时就已经是红军第八、九两个纵队的总指挥（政委），编入红军22军任军秘书长已经是师一级的干部。杨1930年入党，我父亲比杨大八岁，他的资历要比杨成武老。我父亲到四团是属于上级机关派下去临时写报道，他与杨并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因此不存在他有意要吹捧杨成武而不写彭雪枫的因素。彭雪枫是1926年入党，比我父亲小一岁，他与杨当时是同级与我父亲属于同等资历，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近一些才对。我父亲怎么可能在两个同级干部中抬杨成武压彭雪枫呢！他写的杨成武，完全出于公心，是对历史的真实记载。就连杨成武自己都承认说：在夺取泸定桥的关键时刻向战士们喊话，有些话我自己也记不大清楚了，加伦同志记得比我清楚。父亲说，浴血战斗中的战友情是很无私的。

4. 有关陈云和邓小平对泸定桥之战的说法。

外界传覃应机的说法很简单，与陈云在1936年向共产国际的一篇报告中关于泸定桥一战的说法以及邓小平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务卿助理所说的比较一致，都叙述得较为平淡没有做过多炫耀。实际不然！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并不是专门讲泸定桥之战，而是作关于中国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大渡河及泸定桥战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一般报告而言，都会尽写得可能简明扼要而不会长篇大论，能被提到的已经说明其重要性了。邓小平在1982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邓小平的谈话当然就更可以理解了。首先邓小平没有亲眼目睹泸定桥的战斗，其次，因为邓小平后来指挥过淮海战役，那是60万大军对80万大军的超大规模的战争场面。相比之下，泸定桥之战，

突击队的战士仅几十人之数，只能算是一场很小的战斗了。邓小平是有过打大仗经历的，反倒更加谦虚，说的是实话，才显大将风范。而在长征时，泸定桥一战就算是一场重要的比较大的“战役”了，虽然其规模和参与人数不能与后来的三大战役相比，但这毕竟是红军经历过的一段史实。

5. 现在外界还传有一种说法：“根本没有泸定桥之战，泸定桥之战是假的，是共产党编造的历史，神话了共产党的军队，其实他们没有那么英勇。”这种说法，是对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污蔑，是对红军历史的歪曲！如果红军战士都是脓包、软蛋，早就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何谈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

6. 覃应机先生在他的书中说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在这里，覃应机没有说兄弟部队是一军团的还是三军团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个“兄弟部队”是一军团的，怎么可能会由三军团的部队去夺桥？如果这个“兄弟部队”是三军团的，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右路军是由一军团的刘伯承、聂荣臻、陈赓负责指挥的，左路军怎么可能由三军团指挥呢？如果左路军真的是由三军团指挥，那么右路军也必定是由三军团指挥！一场战斗的军队指挥权都是由一个指挥部统一指挥，这是作战指挥的基本常识嘛。覃应机先生说参加过“泸定桥”之战，很可能是真的，但却不一定是我们所指的那一次！应该不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那次“泸定桥之战”，很可能正像我父亲说的，那时红军四渡赤水河，三克遵义城，许多基层干部战士都打昏了头，记不住自己打的是哪一次了。覃应机当时是连长，打仗都打红了眼，也许有记忆上的误差，也许把另外一次打泸定桥与这一次记混了，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一、我父亲作为随军报道者所做的战地报道泸定桥之战即《飞夺泸定桥》一文，由于是在战火纷飞的战斗中所写，并立即印发，没有时间去核对所有细节，有个别误差在所难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文章主体内容不会有重大失误，更不会是自己编出来的。非常明显的是，我父亲的文章对右路军的战斗只是一带而过，没有很详细的记载，说明他没有参与右路军的活动所以无法编写，而有着

非常详细的左路军的战斗过程，这恰恰说明我父亲是亲眼目睹的参与者。

二、因为我父亲是一军团的人所以只报道一军团而有意压制三军团的事 根本不存在。

三、泸定桥之战，以一个军团对付两个旅，兵力富富有余。用三军团和一军团两个指挥部去指挥这样一场小型的战斗，作为久经沙场的红军最高指挥决策人，朱德、毛泽东绝对不会犯如此低级

的兵法错误。

四、覃应机先生所亲身经历的泸定桥战斗，可以肯定，绝对不是我父亲亲身经历并报道过的那场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被誉为是通往共和国之路的、惊心动魄的、举世闻名的泸定桥之战。

2009年9月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市

(责任编辑 萧 徐)

##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吴江文稿(全三册)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李昌传	周士元	68.00	8.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南海人物春秋(上、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全三册)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胡国华 傅上伦 冯东书 戴国强	15.50	5.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张树德	69.80	8.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上下)	刘 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78大记忆	苏 峰	35.00	7.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7.00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	杨天石	60.00	8.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1957年	和风鸣	29.00	7.00
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	闫 建编	35.00	6.00
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著	32.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苗采青等	59.80	9.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30.00	7.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虽然我们不再因为思考与表达成为“右派”，但那段历史我们仍不敢忘记。作者因提出“神化与特权”问题，开始了长达21年的“右派”生涯——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李锐反左文选》 1957—1978年的20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经历——我的1957》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1957年的反右斗争，作者和丈夫共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丈夫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的大半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受尽各种凌辱委屈，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苏共亡党十年祭》 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问史求信集》 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直言》 尝忆50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泽东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颅犹在，其余皆已身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犹壮。今年80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体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李锐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

• 李继华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滋长和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迷信,并酿成严重后果。这些严重后果和极大危害,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对党和国家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为了深深地汲取这些教训,就要了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怎样滋生与发展的。

##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 1943 年 3 月之前对毛泽东的颂扬与个人崇拜的滋生

虽然都说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从此开始到 1938 年初,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不像后来那样稳固,对他的赞扬比较少,个人崇拜则基本上没有。对此,1936 年在陕北保安访问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美国记者斯诺,有一段颇有意味的描写:“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人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直到 1938 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稳固下来,才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从此开始,对毛泽东的赞扬也越来越多,并急剧升温。

就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洛甫)在代

表中共中央作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有着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这就是:……(2)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王明在发言中也肯定毛泽东是“我党的最著名领袖”,并指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这些,还是张闻天和王明在当时特定情况下的“表态”,未必就算是个人崇拜;但是在当时的中央内部,已经比较突出毛泽东个人,则是可以确定的。

1939 年 1 月 5 日,延安《新中华报》第 3 版报道:《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新年节向毛泽东同志致敬联名致信:努力抗战响应两大号召来当作献给领袖的新年礼物》。致敬信中讲到:“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你是被压迫者胜利的旗帜!你是光明的象征!……在这里,敬祝你的身体健康!”

3 月 12 日,延安举行了纪念马克思孙中山诞辰的盛大晚会。《新中华报》在 16 日第 3 版的报道中讲到:“毛泽东同志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步上了台子。他讲述了纪念两位伟大革命导师的意义。如雷的掌声冲破了会场上的肃静。”

5 月 4 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大会,作了关于青年运动政治方向的讲话。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了延安青年的献旗。为献旗而写的致词中说: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意,并献旗一面,写着新中国的火炬!

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

祝您的健康!

6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的纪念大会,在毛泽东作了关于“抗大”政治方针的讲话后,也向中共中央、毛泽东、边区政府、八路军献旗致敬。献给毛泽东的旗子上写着:“你亲手抚育抗大,抗大日趋于壮健”。献旗时的致词是:“你,人民的领袖,革命的导师,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亲手抚育的抗大,已诞生三周年了,他将要更加滋长,更加健壮!我们谨将此旗献给伟大的领袖……”

7月18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在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总结开荒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也称颂毛泽东为“伟大领袖”。

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开学典礼后,又举行了庆祝晚会。“晚会舞台上正中耸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的肖像,西边则左是朱德、王明、项英、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右是周恩来、洛甫、博古、康生、陈云、邓发等同志的肖像……”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这是中共历史上,特别是1938年底六届六中全会后,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另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受到批判并被罢免职务的彭真,再次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至于彭真是在什么时候最早喊毛泽东“万岁”的,现在还未查到原始材料。如果确实是他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话,应该是在1939年7月20日之前。当然,在对毛泽东喊“万岁”之前,先喊“女大万岁”,表明当时对“万岁”这个字眼看得还不像以后那么神圣,在挂马、恩、列、斯、季、毛肖像的同时,还挂了其他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像,也表明对领导人的崇拜比较普遍,还不像以后那么专一。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受到了特别突出的个人崇拜,则是显然的。

8月13日,陕甘宁边区学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毛泽东登台讲话时,“掌声又继续的象

春雷一样的响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屡次想开始讲话,都被这绝大的声音所阻止了。”

1940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落成的延安女子大学礼堂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讲演。讲演完毕,“会场顿时沸腾起来,掌声阵阵,高呼‘乌拉!乌拉!’(俄语‘万岁’之意)……”

194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即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青年干部学校(到1941年前后,山东等解放区还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分校)。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未讲话,王明则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他指出:“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他说,从建党以来,“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王明对毛泽东的这些赞扬,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一种无奈的迎合,但在其用语上,又确实包含了个人崇拜的意味。这些话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四天以后(1940年5月7日)又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反映了当时对毛泽东的赞扬已经到了较高的程度,也表现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明显地滋生。

当时,还创作了由胡乔木作词、冼星海谱曲的《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歌中唱道:“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同年,由胡乔木作词、李焕之谱曲的另一首歌《青春曲》则唱道:“可爱的青春发着亮光,我们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英明的舵师给我们掌舵,指挥着我们去冲破险恶的风波”。

同年7月,郭化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文,其中讲到:“八路军军

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人们也开始称颂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导师”，颂扬“毛主席”的“辉煌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

12月25日，王若飞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一文，开始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这是就笔者所见而言，最早这样称颂毛泽东的史料。实际上，这种称呼可能开始得更早。

大约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这是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了“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尽管最早这样做的未必是周恩来，当时的人们对这种称呼在以后产生的危害也很难看得清楚，但这种做法的不当之处还是明显的。到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也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过去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的论著也尖锐地指出：“这种（称呼）把‘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是完全违反了领袖和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明显表现。”

1941年3月，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中共的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5月17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关于皖南事变的高级干部会议。陈毅在报告中指出：“毛是例外天才，他在井冈山上就已有现在他的一套政治军事战略战术的理论轮廓。”

同年7月7日，《十八集团军抗战四周年战绩总结》指出：毛泽东是“天才的政治家战略家”。9、10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详尽地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者对毛泽东都作了

高度评价。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些发言，既是言必称“毛主席”的，又是对毛泽东热烈颂扬的。

综上所述，尽管不能说每一句话都是个人崇拜的语言，但在对毛泽东的逐渐热烈的颂扬中，的确已经滋生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这种个人崇拜，很快就被敌伪利用，攻击延安整风。在1942年11月对鲁中解放区的“扫荡”中，在政治麻痹欺骗方面，敌伪“捏造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同志实行独裁的手段”。

## 1943年3月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较快发展

如果说在1943年3月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处在滋生阶段；那么从1943年4月开始，这种个人崇拜就有了更快的发展。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和精简问题。16日，任弼时在会上说：（原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的联席会，性质和责任不明确。他提出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遵照政治局的方针和决议，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20日，刘少奇提出：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仅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权限，而不是指政治局对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但是在“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其他书记又仅为毛泽东“助手”的情况下，这种“最后决定之权”也是相当大的。因此，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却没



有同时建立起对他的明确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此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滋生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就不可避免地在这种个人崇拜产生强化作用,使之在此后有了更快的发展。

会后不久,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用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同年8月2日,周恩来在《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又指出:“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八路军在敌后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钳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

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一方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以后被全党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称为“英明领袖”,并说“毛泽东同志自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定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在这里,王稼祥把毛泽东称颂为在中国在中共高度重视农民运动的第一人。

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讲道:“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

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7月8日,林枫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一文,其中讲到:“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杰出人物”。

8月间,山东解放区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召开。8月20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在《山东抗日民主政权三年来的总结与今后施政之中心方案》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团结在他周围的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他们的预告和指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争取最后胜利的南针和方向。”这里说中共中央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有颠倒领导集体和个人关系之嫌。

10月2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号”,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称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

12月5日《中央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号召“各根据地党委……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地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同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表示:“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

从194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起草和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议》被原则通过。“《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

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

## 七大以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限度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已经滋生和发展,但与七大期间及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相比,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原因和表现,大致上有三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指出:“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

1941年8月2日,在给萧军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

1943年4月,党内有人提出为毛泽东祝贺50周岁生日,并大力宣传毛泽东的思想。4月22日,毛泽东复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何凯丰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4年3月,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还为

该书写了编者序言。为此,毛泽东于4月2日致信周扬:“你写的序言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注)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同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段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到:“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此时的毛泽东,正值52岁的盛年。20多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在73岁时发动了把整个中华民族拖入内乱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不幸而言中,真是因为随心所欲而大大地“逾矩”了。

在随后接着召开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又反复强调:“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这些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的清醒和谦虚谨慎。这种清醒和谦虚谨慎,自然是以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和蔓延为前提的。但他在此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初期)的谦虚谨慎,再加上革命战争环境的制约,使这种个人崇拜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没有发生太大的危害。

其次,颂扬者的颂扬还是有限度的。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了对毛泽东的过分颂扬和个人崇拜,但颂扬者大多出于衷心的钦佩和敬仰,较少有违心的迎合或屈从,在颂扬的语言上,也较少带迷信或神化的色彩。加之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因而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产生很大的危害。

再次,对领导者的颂扬还不仅仅限于毛泽东。当时,党内个人崇拜的客体还比较宽泛,在对毛泽东的颂扬和崇拜逐渐升温的同时,对其他领导人也有一些崇拜和颂扬,而不像建国以后只能

对毛泽东表示崇拜。

如前所引,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在对毛泽东喊“万岁”之前,先喊“女大万岁”,表明当时对“万岁”这个字眼看得还不像以后那么神圣;在挂马、恩、列、斯、季、毛肖像的同时,还挂了其他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像,也表明对领导人的崇拜比较普遍,还不像以后那么专一。

1943年8月,《山东省临参会致八路军电》中也讲到:“华北人民依八路军为长城,颂朱彭总副司令为救星”。

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43年3月以后到七大之前,为什么会在党内迅速滋长和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这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论述,许多论著也已作过分析,此处不赘。

(作者为滨州学院政法系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 更正

本刊2期作者张鸣身份介绍有误,应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无声的群落》序为刘小萌撰写。在此特向张鸣、刘小萌、王克明致歉!

《炎黄春秋》编辑部



# 三民主义新旧说的政治背景

● 匡萃坚

学术界有种长期居主流地位的看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之前，“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

如何看待这种关于三民主义的“新、旧”说，我以为，此说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有历史贡献。

“新三民主义”词语早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出现。那是共产国际代表在说明对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成绩时的偶尔用语。作为按共产党人的理论对三民主义作出完整解说，并成为党的主导见解的三民主义“新、旧”说，则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

此说出现前，流行的是三民主义的“真、假”说。孙中山去世之后，左右派斗争剧烈展开。大家都打“孙文主义”、“三民主义”旗号。老右派戴季陶，以“孙文主义”名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借口确立“共信”、建立“纯粹的国民党”，大造分共舆论。对此，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也不得不讲，“反共产这个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总而言之，总理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1925年9月）后来，他成为右派势力的中心，便在保卫“三民主义”的旗号下反苏、镇压工农运动、实行暴力“清党”。这时，左派以“三大政策”予以反击，指斥其为“假三民主义”，可谓击中要害。抗日战争爆发、新的国共合作建立后，则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共产党把坚持抗战置于首位，再三表示对蒋介石领导的服从和对三民主义理念的忠诚。另一方面，蒋介石在三民主义旗号下既要抗战、要国共合作，又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千方百计要“防共”、“限共”，其如意算盘和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通过“两党合组”、“永久

合作”的方法取消或溶化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此，蒋介石有两个说法：一是一般地说，真信仰就要一心一意，“在同一主义之下”（1937.2.22），达到对三民主义“真诚一致的信仰”（1937.9.23）。二是具体地说，三民主义“完备”，“能涵盖一切”，且“伟大悠久”，其他主义“皆有缺点”，应被取代。（1939.5）结论就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追随他们的御用文人循此发挥道，“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它是“集合了各种主义之大成的真理”，“其它任何主义都不应该有。它们是没有历史使命的。”还有人要求中共“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对此，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政治上作了回击，一再明确表示，绝对不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至于在思想理论上的回击，则要求进一步划清一些原则界限。这样，仅仅分辨三民主义的真、假似乎就不够了。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强调真信奉就要信“同一主义”，虽然别有用心，但如果他们只是倡导一致，并非禁止其他，只是“溶化”而不是排斥，那就难以说他们违背民权主义，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假”。他们宣称三民主义最完备、最伟大，从而认定对其他主义的明智选择就是自行放弃，这自然是其偏见，是对三民主义的拔高，但不能说他们如此尊奉的三民主义本身是假的。蒋介石过去主张“分共”，与孙中山的“容共”主张公然对立，而现在则不仅不讲“分”，还大讲“合”，不止于“容（纳）”，还要“溶（化）”；其手段也由“打”转为“不打”，貌似走向开明。对于这种变化，人们自然不能视而不见，乃至不加区别地将其归于一类，以一个“假”字囊括一切。

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真、假的范围。如何回答？一种新的提法在不断地酝酿着。毛泽东1937年5月3日指出，“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提出要“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1938年3月12

日,毛泽东肯定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手定了“三民主义新纲领”,“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10月12日,他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抗战胜利后出现的“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1939年6月10日,在《反投降提纲》中,他对人们言及的三民主义的状况作了新的划分,指出除“真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之外,还存在一种“中间性的”即“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只作真、假二分已经不够。在这里,他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同“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并在一起,划入“真三民主义”之列。至于在这种“真三民主义”中是否还要作进一步的区分,他当时未作回答。而提出“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问题,主要为揭示隐藏在抗战队伍中的投降危险,并不是对作为既抗战又建国的指导方针看的三民主义的全面概括。因此,当涉及对完整的三民主义的认识和评价时,这种分析框架便显得不够了。近两个月后,周恩来对人们所称的三民主义作出了多重划分,即孙中山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汪精卫是“伪三民主义”,戴季陶是“修正三民主义”,还有我们同志“企图马克思主义化的三民主义”,即把三民主义“解释成共产党的东西”。在这份报告提纲中,他实际上指出了当时国民党所主张的不与共产主义并存的三民主义中的严重问题:或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分别,共产党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或者认为“三民主义既可包括共产主义,则共产主义在中国无存在的必要”。不过在这里,他只是点出了问题,并表明问题超出了真、假的范围,却未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张闻天半个多月后谈了“个人见解”。他同毛泽东一致,对三民主义也作三重划分,即“假三民主义,如汪精卫的三民主义;不彻底的三民主义,即一民主义;真三民主义。”他强调,“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真、假三民主义的斗争,彻底的与不彻底的三民主义的斗争。”这里“不彻底”的提法显然是对“真三民主义”所作的再次区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真假二分说。可是,到年底,毛泽东在涉及对三民主义的区分问题时,用的依然是真假二分法,如号召青年“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实行真三民主义”。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也还是“揭穿汉奸的假三民主义”,“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这种情况表明,至此分析三民主

义的规范提法依然是“真、假”说。新的规范提法,不久后为毛泽东所首次提出。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再次提出,为共产党人所承认的三民主义究竟是“哪一种三民主义”的问题。他的意思很清楚,“这种三民主义”不仅是真的,而且是与共产主义相容的、接受共产党帮助的三民主义,因而是在共产党出现后才有的、是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明确表示,提出此说针对的是资产阶级顽固派,说他们知识贫乏、不知道历史的变化,“不知道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而半年前,他在批评人们对三民主义的误解时,说的则是他们“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

三民主义“新、旧”说是对蒋介石“一个主义”和“溶共”论的系统有力而又恰到好处的回答:既坚持了原则、坚持了共产主义信仰;又注意了策略,在斗争中把握了分寸。这就是既要驳倒他,又不针锋相对地把他列入假三民主义之列,甚至不说他“半真半假”。如说他“假”或“半假”,那就与汪伪或准汪伪并列了,置于异类,分量太重,也不合乎实际,混淆了基本界限。说他“旧”,就是只说他不合时宜,带有规劝、敦促其识时务,不要落伍之意,不那么咄咄逼人。关于问题出现的原因,毛泽东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将问题归结于大环境。意思是,一切皆时代使然,跟上就好。这是开导,而不是追究。在具体的解说中,则追溯到孙中山、三大政策及“一大宣言”,说明“新三民主义”早已有之,信奉它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这就牢牢抓住了孙中山的旗帜,具有雷霆之力。

如果说,分辨真、假是为了名正言顺地举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的话,那么,区分新、旧就更进了一步,既充分表达了对三民主义的忠诚,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又理直气壮地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信仰,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旗帜。在这里,区分三民主义真假、新旧的标准都是它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与共产主义无关的是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是假三民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并存、视共产主义为朋友的三民主义,才是既“真”又“新”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的新旧说在此时出台并非偶然。因为正是在此时,党的理论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已走向成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主主义革

命理论——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理论进一步确认，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阶段；而在民主革命中又分为新、旧两个阶段。与此相联系，三民主义也被区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既然新民主主义是民主革命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那么新三民主义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通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桥梁，于是有了“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的提法，将“新三民主义”等同于“新民主主义”。这样通过“新三民主义”就将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进而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从而不仅使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而且中国的全部革命运动都得到了系统的理论说明。

“新旧说”与“真假说”相比较，有多处不同。主要是辨真假与分新旧，二者指向的虽是同一对象（三民主义），然而对象自身的状况不一样；与之相应的认识 and 态度也不相同。真假说，以对不变的对象的崇信和尊奉为前提；新旧说则承认主义本身是发展变化着的。争辩真假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忠诚，区分新旧则足以彰显自身的高明。在这里，一个是仰视，一个是俯视。俯视表明的是对忠诚境界的超越，由此就将主义从信仰的对象转变为分析、研究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由简单的去伪、示忠，转变为客观的审视、评述。

具体说，三民主义新旧说较之真假说有如下几点变更：

1. 进一步突出并拔高“三大政策”。原来为了给维系国共合作提供权威依据，一直强调孙中山确立了三大政策，说明没有这种政策保障，三民主义就难以贯彻落实，就会沦为空谈，成为所谓“名词运动”。现在则提到了新的高度：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本身的一个根本特征，离开三大政策就谈不上什么新三民主义。而承认三大政策就是承认了共产党存在的当然理由，就不存在什么收起共产主义的问题。

2. 从突出“三大政策”的背景，进到突出世界革命的新时代。突出三大政策，那在苏俄与共产党诞生之前如何解释？这就牵涉到时代问题。在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变成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即中国与苏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旧时代不存在这个问题，到了新

的时代这就是个突出的问题，成为三民主义命运的主宰，即成为新三民主义之所以为“新”的决定因素。

3. 进一步突出国民党“一大宣言”。宣言是在鲍罗廷主导下起草的。毛泽东说，“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原来共产党人一直看重这一宣言，现在则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由于“一大宣言”使“三民主义”的面貌发生了由“旧”到“新”的根本性变化，成为三民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这里的政治意图是明显的：突出与拔高三大政策，就为了说明原来在国民革命中，国民党离不开共产党的帮助，现在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更离不开与共产党的合作。突出时代，就是要进一步论证实行三大政策是一个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突出“一大宣言”就是为了证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主张的正确性，三民主义只能循此精神的方向发展，自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总之，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政策结出来的果实，是经过了与“俄”与“共”密切相关的主义的改造的三民主义。如果真假说是要解决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的话，那么新旧说所要解决的就是确立共产党在合作中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权。

应该肯定，新旧说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尽管不为他们所接受，但剥夺了他们“限共”、“溶共”的口实。其次是，在思想理论上武装了共产党人和先进的中国人，从而推动了，至少是有利于其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核心和基础的作用。再次是，在中间派面前显得理直气壮。虽然这一论说并不为三民主义者所认可，但他们由此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既不搁置其共产主义旗帜，又不丢掉三民主义旗帜的态度是真诚的。自然，这种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它毕竟不过是对思想信仰的一种理论解说，在国内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且有一定的副作用，即被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来证明：共产党人信奉三民主义是假，借此来宣扬共产主义才是真，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变相地搞共产主义。

（责任编辑 萧 徐）



# “右派”省长沙文汉

• 泰 栋 尚 之

沙文汉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熟悉俄文、日文，有学术著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长期在白区（江苏省省委，上海局）担任领导，解放后又担任浙江省省长的老干部。他在京沪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屡建奇功，1957年错划为“右派”，是全国党内最大“右派”，而且是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大部分“右派”的改正时间是1979或1980年，沙文汉一直拖到1982年才改正。

1955年，发生潘汉年事件时，沙文汉就被说成是“浙江省潘汉年第二”

沙文汉曾经三进浙江，都在省里担任领导工作，省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省长。他的夫人陈修良也于1955年从上海华东局高校党委调到杭州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沙文汉1928年20岁时因领导勤奉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逃离家乡，1949年至1955年才在浙江工作，一直到1964年在杭州去世。他没有回宁波老家一次，他在浙江没有人脉，也没有老部下，可是却被有些人看做是浙江省地方主义的最大后台。另外，沙文汉与潘汉年并无直接的工作关系，30年代中期，上海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1936年后潘汉年、冯雪峰等受延安党中央委托，为恢复上海党组织做准备工作，把四散的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党员，通过个别审查重新组织起来。沙文汉、陈修良是最早经个别审查的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内骨干。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为宣传部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陈修良为省委妇委书记负责妇女、青年工作，而潘汉年属于中央直属的独立情报系统，与江苏省委分属不同系

统。可是1955年潘汉年案件一出，柯庆施在上海布置公安局“要认真追查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人与敌特的关系，他们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提出一批名单，其中也有沙文汉。5月20日，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江华宣布：“毛主席指示要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特别要注意‘一切’两字。”还称：“上海有三千三百个特务参加了公安局工作，事实上占领了公安局，扬帆已经被捕了，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内奸，秘密投敌，也已经被捕。”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省委书记提出：“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sup>注1</sup>省委书记不是一般人，他的浙江也有“潘汉年第二”，自然也就使干部注意到沙文汉。实际上潘汉年案发生后，沙文汉在杭州的住所——北山路葛岭山麓十七号住宅就受到暗中监视。离沙的住宅不远处新新饭店一个秘密装置，就可以窃听到沙文汉家中的电话。<sup>注2</sup>

从反胡风案引起的审干，沙文汉知道要严肃处理对待的，1956年8月他从北京开完人代会回来后即主动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安子文，补充说了自己1932年在安庆戒严时被拘留一夜随即脱险以及当时的证明人，不料，在白色恐怖下这样一件本来是可以庆幸的事，竟然被说成是“严重历史问题”，1957年中组部审查后告诉沙本人并告诉浙江省委，沙文汉没有被捕自首等事，历史清楚，可是一直到80年代仍说沙“有历史问题”，被作为阻挠平反改正的理由之一。

沙文汉是省长，党内是省委常委，但是他的分管工作范围被缩小，被架空，沙文汉感到“政治上被怀疑，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甚至连一般工作都不好去插手了，情绪上陷入更加苦闷的状态。”<sup>注3</sup>沙文汉采取顾大局和忍耐态度，不发牢骚，但在“反右”批判中反而指责他“不干工作，态度消极”，“对党不满”，“与省委离心离德”。

1955年8月,经中央批准,浙江省委书记处正式成立,成员清一色为外来干部,书记处成为浙江省最高的核心领导班子,据此,行政职务为正省级的省长需听从行政职务虽为副省级的省委分管领导决定,沙文汉被完全架空了,只负责一些接待外宾工作。5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多次到杭州,但是每次来的时候,省委都不告诉沙文汉,事后沙才知道。沙文汉心中有数,但从不打听消息,当然也不可能去迎送。省委统战部长有一次告诉沙文汉的弟弟史永说:“沙文汉来浙江后,省委领导怀疑他被捕过,毛主席来杭州不通知他,沙不能去迎接。毛主席有一次问沙省长为什么不来。省委领导说,沙身体不好,不参加应酬。毛主席老人家听了后很生气。”<sup>注4</sup>

沙文汉1956年前后共起草过四次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改进领导方法和调整组织的报告,但均被置之不理,沙文汉甚至提出“四个阶级联合专政”的主张,实际上是《共同纲领》的规定,可是却被省委书记斥之为对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认识不清。省委某些领导当时有所依据地说:“民主革命时期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要反对三大敌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消灭资产阶级自己。”省委组织部长对沙提出的改进“党政不分”斥之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甚至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说过“所谓党政分工,首先是党统一,然后提分工,可以派一个省委书记去当省长”<sup>注5</sup>,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意思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常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sup>注6</sup>1955年初,继反胡风反革命案后,省委首先决定“撤销省人委的总党组,省人委工作由省委对口平行领导来管”<sup>注7</sup>,立即停止了沙文汉原计划在省文教部门进行“党政分工”的试验,立即建立省委书记处,加强对省委的全面领导,实际上是更加强了“以党代政”。“关于党政分工”是1956年沙文汉在省党代会上正式发言提出的,这是打成右派的最重要依据。

### “沙、杨、彭、孙反党集团”

1957年反右号角吹响后,浙江省委在10月

10日召开了有1338人参加的省、地、县、区四级干部会议,与此同时还召开了浙江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省委整风,因为外围已打响,11月13日会议上,省委已宣布陈修良是“十足的右派”,大轴戏是要找到“关键”人物,挖她的后台沙文汉,并进一步挖出了一个“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反党集团”。

沙文汉、杨思一在1957年6月20日至7月15日,作为正副团长,曾带了浙江省代表团参加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其中团员有浙江省民盟宋云彬、农工民主党的李士豪。省里打电话来要求发起对宋、李“右派”公开批判,而沙、杨没有像浙江地方上那样积极地响应,于是包庇“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也就成了批沙杨的突破口。开始向沙、杨二人发起总攻,第一条罪状就是“和党内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支持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向党猖狂进攻”。沙文汉的第二条罪状是“支持右派分子黄源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支持黄源搞民间艺术狮子龙灯,排演昆曲《十五贯》等等。为了彻底搞臭沙文汉,就在生活上无限上纲,对一向自律清廉的沙文汉泼脏水,例如沙与其兄沙孟海讨论古文、书法、做诗,研究佛经、元曲,扣上“生活腐化、革命意志衰退”,过的是“封建士大夫生活”。

沙文汉与杨思一都是浙江人,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起工作过,彭瑞林与孙章禄都不是浙江人,根本谈不上浙江地方宗派集团。

杨思一是十年内战时期入党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宁绍后来是金萧地区搞革命,是金萧地委书记、金萧支队政委,工作踏实,得到了群众拥护,北撤后在新四军和华野部队中任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到浙江,当过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他对地方干部很关心,说过“省委有圈子”,他分管政法部门,但肃反时不让他参加“五人小组”,说他历史上有问题,他有意见。他与沙文汉“共同反党联盟”的事实就是“两人抗拒中央的方针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包庇宋云彬、李士豪”;特别是李士豪,“抗日战争时杨思一与李士豪统战工作中有很多交往”,1956年党代会对于省委候选人提名时,陈修良和高光都提出过杨思一是“好干部”,这些都构成了罪名,而且和沙文汉一起挂上钩。杨思一的血压很高,眼底出

血,经受大会批小会斗,在大会上被迫做长篇检讨,到午夜才回家,宣布为“右派”后,家门口已布了岗哨,11月17日半夜杨思一脑溢血加重,失明,而家中电话也打不出去了,车也找不到,延迟到天亮才送医院,昏迷两天后于20日去世,终年56岁。

彭瑞林是山东南下干部,长期在冀鲁边区抗战,反右时是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彭为人正直。他敢于当面批评省委书记,反右开始,省委领导有意向他透露信息:“省委主要斗争对象是沙、杨”,希望他“不要再做炮手”,他胸怀坦白,根本不认这个理。彭瑞林平反后有一本回忆录说:“在会议中,省委江华等四位领导把我请到大华饭店老房子江华住处,他们要我揭发沙、杨的反党罪行,说我在党代会上提沙文汉为候选人,说在某些方面沙比江好,说我与沙、杨关系密切,以不同方式向党进攻,但是他们说我的问题同沙杨性质上有不同,只要能揭发他们,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我再三说明:‘沙杨有错误,但没有反党言行。’两天后,江和另一位副书记又找我谈话,一再逼我揭发沙、杨问题,这时,我已看出他们的目的是要我昧着良心陷害人,我很气愤,什么话也没有说,最后指着江华说:‘沙文汉作风比你民主,没有像你这样粗暴。’江华非常恼火。我二话没讲,拎起皮包就走。”<sup>注8</sup>彭最后划进反党集团的罪名是:“恶毒向党进攻,诽谤省委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从严重自由主义发展到在党内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一贯以‘炮手’自命,支持沙、杨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孙章禄,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也不是浙江人,而是江苏人,曾在苏浙皖边区工委担任过工委副书记,他与杨思一、彭瑞林意见比较合得来,1956年二次党代会大闹主席团会议中,他支持彭瑞林,被说成“反党宗派活动的主谋”,特别是还发表过对江华不满的意见,说过“江华不如江渭清(江苏省委书记)”。

1957年12月13日,省二届二次党代大会做出决议,开除沙、杨、彭、孙四个“右派”党籍。同时开除省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长黄源党籍,江华在报告中称:“从根本上解决了浙江党组织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浙江省委有9名“右派分子”撤销职务,有

7名全国人大代表撤销了资格。在宣布对杨思一的处理时,也不提杨思一已死这事。浙江省一级新闻单位,四个月来打成右派的45名,占从业人员352人中的12%,省民盟委员中划右派的占27.5%,省人大代表有50多名被划作右派。这就是反沙、杨、彭、孙“右派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1958年1月25日在《人民日报》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一文编者按说:“此文对国内矛盾的分析 and 阐明是有普遍意义的”,“沙、杨、彭、孙案件证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已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是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1958年3月9日至26日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到“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对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该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他又举出浙江例子,提出浙江“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他点了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党内“反右”在他看来,是一次“新式肃反”<sup>注9</sup>，“这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

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当谈到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时,毛泽东再次点出浙江沙文汉、安徽李世农和广东广西等省负责人名字,他们刚刚打成“右派”或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要求各省都要“献宝”,称沙文汉等人“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sup>注10</sup>

## 沙文汉在无尽的检讨中沉思

1957年反右以后,沙文汉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工资级别从原来六级降为十二级,经省市公安厅、局抄家后,被赶出北山路葛岭的原住所。在新的住处(保防路宝石新村四幢)对面的楼下,当局另安排住了一户人家,全天候监视沙家出入人员情况。



撤职后他虽然挂了一个省政协委员名义,但被长期搁置起来,终日在家不分配任何工作。他虽几经要求,提出自己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编写地方志等,都不予理会。他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有两件事:首先,他被要求不断反复写检讨,他趁机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希望能从中找到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同时可以整理与思考自己对政权建设,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第二,他最想研究的是中国的政治和党史,但因为自己的这一身份不可能被允许,因而决定从被他称为“死人的政治”——古代历史的研究着手。

沙文汉对家人还说过自己“一贯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整人”。在一份底稿中,他认真检查自己有很深的儒家“仁爱”思想与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并以此作为“个人主义”的表现来检查。

1957年12月底,当陈修良问他为什么在检讨中说了违心的话,如:“提出党政分工是与党唱了对台戏”?他说:“这是照顾省委的威望,皇帝把大臣推出午门斩首,被害人必须跪在地下,朝北向皇帝叩头,口称罪该万死。”沙文汉心里很清楚,浙江某些当权者与封建帝王的思想实在没有什么差别。<sup>注11</sup>从沙文汉诸多的检讨稿、信件,不仅反映出他的政治观点,也充分展示了他的世界观和人性。沙文汉所处的时代与教育,决定了他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受到西方民主与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典型中国式的对上服从忍辱负重等深厚的儒家文化影响。

沙文汉从1959年起,拖着病体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制度问题。他当时给正下放嘉兴农村劳动的陈修良写信说,自己“要弄清楚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则也算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良心上稍可对得起党和人民”。<sup>注12</sup>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并阅读大量资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终于在1963年6月底完成八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sup>注13</sup>

他的研究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后,会开始分化为阶级社会,这一点与西方是共同的。但是不能用西方的奴隶制度硬套到中国来。因为在不同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会形成不同制度。

他发现由于中国的初民早已是农业民族,生产方式强烈依赖土地,常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形

成稳定的耕作群体。从史料考证,他证明中国的奴隶制最大特点竟然是“土地和奴隶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人们从商周起就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他论证: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国王或诸侯的(实际上,人都是奴隶)。他说,这种发展,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只形成为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sup>注14</sup>

沙文汉毕竟是一位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革命家,他懂得一切政治现象都是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历史环境分不开的。这个研究结果,使他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一贯是实行专制与皇权的统治,为什么中国人易表现出对上盲目服从的奴性,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总可以用“集中”统一为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为什么在历史和现实中常见由同乡、同宗结成小帮派间的争斗与党同伐异的现象,也包括自己为什么会深深陷入这场运动。

对中国奴隶制探讨是他的一个尝试。遗憾的是无法完成自己的心愿。

1963年12月底,沙文汉因参加政协的会议来回步行在雨雪中受寒,引发心肺性疾病。于1964年1月2日病逝于杭州,享年56岁。临终前一天,统战部长向中央请示后来向他宣布摘掉帽子,半昏迷的他仍不忘记努力地说了声“谢谢”,这成为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 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艰难平反路

陈修良作为沙杨集团中的一员“先锋”,早在1957年9月省委各部整风时第一批被点名批判,到1958年2月25日,在沙杨彭孙组织处理后两个月升级为“极右派”。同年3月她被下放到嘉兴农村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年代农村的饥饿,亲见了干部的浮夸与强迫命令作风。1960年4月陈修良被省委调至杭州大学外语系,在那里她被管制改造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倒台一年后,1977年12月,她与彭瑞林、孙章录被

省委统战部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经本人要求于1978年1月调至上海市政协。她开始向中央申诉,直到1979年9月,浙江省委同意批准正式予以平反,撤销了浙江省委1958年2月错划“极右派”的决定,恢复党籍、工资(原级别)与名誉。改正后1983年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党委顾问。

沙文汉的平反历程却要困难得多。1977年以后,浙江省委由中央另派铁瑛任第一书记。他是部队干部,对浙江“反右”情况不了解,江华在北京任最高法院院长。1978年中央发出55号文件,对“右派”案件进行复查。杨、彭、孙、宋云彬、李士豪等都改正了,但对沙文汉案近一年多没有反应,浙江省委不复查也不报中央。家属与许多干部都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1979年2月20日,沙文汉的四弟,当时在全国政协工作的老干部史永,向中央组织部写出第一封申诉信。信中除了全面陈述了对此案各种错误批判与强加的不实之词外,也指出平反此案在浙江有重大阻力。例如:1977年9月8日在“四人帮”打倒近一年后,《浙江日报》还用长篇文章宣传如下观点:对沙文汉案子的平反“就是砍掉反右派斗争的伟大红旗”;甚至宣传:“浙江省的反右斗争没有扩大化”。

1979年7月,史永在北京遇到一位浙江来出差的干部告诉他,文革后复出的谭震林给省委写过信,他提出要关心沙文汉案的改正。

1979年8月20日,史永又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顺元,直接把信转给了陈云。信中指出,浙江省委将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三人在6月已经宣布改正,唯独留下沙文汉一人不予上报,理由是“浙江省委认为沙有政治历史问题,待查清”,“中央组织部多次催促,浙江省委仍没有报上来”,并说明沙的历史早有结论。<sup>注15</sup>由中纪委批转到中组部催促办理。

这样,一直拖到1979年9月6日浙江省委才向中央上报了一个复查报告。<sup>注16</sup>复查结论针对当年划右派理由,作了非常勉强的解释,继续称:“沙文汉同志同省委离心离德的问题是存在的,长期不工作也是事实”;“沙文汉同志在省第二次党代表会上的发言,是有错误的。”此外,复查报告竟出人意外地写了:“江华同志提供,沙

文汉同志在划为右派分子后,曾交代过历史上被捕的问题。但进行了复查,只有本人1956年的交待和中央组织部1957年的审查结论。江华同志所说的材料我们没有查到。”对沙文汉复查的结论是“沙文汉同志在当时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予以改正”。

1957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已经对沙文汉政历审查做了结论,安子文部长于6月30日全国人代会期间,曾约见沙文汉谈话,亲自告诉他这个结论,他提出沙可以进书记处工作。可是1955年以后,浙江省曾多次在大会上讲沙文汉有历史问题,当被中央结论否定之后,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宣布过这个正式组织结论。这次出现的无中生有的所谓“被捕”问题,甚至在1958年“反右”期间和此后多年也从未有人提出来过。

作为家属代表的陈修良,坚决拒绝在这份复查报告上签字。在上海家中,她当面严厉指责浙江省派来的干部,把报告退了回去。

同时,史永在北京找到上海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如经济学家孙冶方、刘晓夫妇、张执一等许多人讨论此事,纷纷出主意和为沙文汉的工作与历史作证明,孙冶方仗义执言驳斥这个错误的复查报告。1979年12月27日,在身患肝癌住院开刀期间,孙冶方给中纪委陈云和中央组织部长写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沙文汉被捕“不是事实,无非是当年给沙文汉同志戴上右派帽子的原省委负责人,感到今天这顶帽子戴不住了,又想找个理由为自己辩护而已!”孙冶方还说沙文汉当年提出的两个问题:党内民主与以党代政,“不仅在当时,而且即使把它全文登在今天的报刊上,也不失为切中时弊的好文章”,可是至今浙江省委还认为“这个发言是错误的”还要“给他留尾巴”是“怕否定自己”。<sup>注17</sup>

陈修良在1980年1月18日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申诉信,指出:复查报告关于历史问题的说法不符事实;对于原决议中指责的沙、杨、彭、孙反党集团问题是否要改正只字未提;对于沙在党代会发言提出党政分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今天,究竟是对还是错不能回避,必须讲清。

<sup>注18</sup>

1980年5月19日浙江省委向中央报告:

“中共中央(1978)11号、55号文件下达以来,‘省右派摘帽办公室’(1978年10月成立——笔者注)经过两年努力,全省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全部摘掉,错划的经上级党委复查批准,也已全部改正。”<sup>注19</sup>

对此,陈修良于1981年4月4日再次给总书记胡耀邦并中央政治局写了申诉信。<sup>注20</sup>表示省委这个文件完全没有新内容,只是转批1979年的复查报告,且许多内容错误,这是对落实政策不负责任。

很快到了1981年底,对沙文汉彻底的改正,还是没有消息。1982年1月全国人大谭震林副委员长来到上海,他让妻子葛慧敏找到陈修良,请她到东湖宾馆来,他自己因感冒高烧躺在床上。谭震林向陈修良了解沙文汉平反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以后,很快表态说:“那好办”,并让陈修良随后写一份情况寄到北京他的住处。

陈修良在1982年1月24日给谭震林的信中,提出目前对沙文汉的“改正”是留下了“政治尾巴”,并没有真正平反。中央组织部早对沙的历史做了“从未被捕”、“历史清楚”结论,浙江省至今不肯宣布。也许是谭震林的行动在最后一刻起了作用,陈修良的信写出后不久,一份浙江省委重新修正的关于沙文汉错划为右派的复查报告终于与陈修良见面了。<sup>注21</sup>

这次修改后的复查报告明确了三条:首先,否决了1957年12月13日的沙、杨、彭、孙定性为“反党集团”决议;其次,肯定了沙文汉在党代会上关于发扬民主、党政分工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最后,说明沙文汉一生没有被捕,政治历史清楚,并撤销原处分决议。这次修改时间为1982年8月10日,但采用了同文号换发方式,仍按第一次复查报告时间写作1979年9月6日。<sup>注22</sup>

1982年11月沙文汉平反消息在浙江、上海、北京等地主要党报发表。

1983年11月25日,在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正式撤销了1957年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开除沙、杨、彭、孙党籍的决议和同日开除黄源党籍的决定。<sup>注23</sup>至此,这件历时26年,影响全国的大案,从程序上正式结束。此时离开沙文汉逝世已经19年。

注释:

注1 陈修良回忆:《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

注2 见陈修良《西湖纪事》,1993年。

注3 参见沙文汉检讨底稿1组。

注4 见史永私人信,1997年12月25日。

注5 1957年10月22日浙江省委七次会议记录(二)第70页。

注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72页。

注7 1954年底省委曾决定在新建立的行政机构省人大常委会中建立党组,沙文汉是党组五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杨思一、彭瑞林也是执行组成员,但没有多久,1955年3月江华提出取消党组,恢复由省委直接对政府的领导。

注8 《彭瑞林回忆录》。

注9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672页。

注10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182页,第18页。

注11 修良:《西湖纪事》1993年。

注12 1959年5月30日沙文汉陈修良家信。

注13 文汉:《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沙文汉诗文集》第215页。

注14 黄仁柯著:《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第385页。

注15、16 1979年9月6日浙江省委给中央的复查报告[省委发(1979)210号]。

注17 沙尚之编:《记孙治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注18 陈修良1980年1月18日给胡耀邦的信。

注19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浙江省历史大事》(1949—1993)。

注20 陈修良1981年4月4日给胡耀邦的信。

注21 陈修良1981年1月24日给谭震林的信,《陈修良文集》第437页。

注22 1982年中共浙江省委复查报告。

注23 关于此指示,至少已有两个不同来源证实。一位是新华社某高级记者在初解放时看到过;一位是江苏省有关厅局负责人在查阅其他档案时看到。

(责任编辑 萧 徐)

## 作者更正

因记忆有误,1期发表的《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一文中提及的小弟弟应为小妹妹,偷袭石家庄之事,傅冬并不知情,特此更正。

金凤



# 周恩来秘会左尔格

● 杨国光

1930年1月,理查德·左尔格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身份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三年的中国之行。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四部(格柏乌 rpy)特工,名义上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他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以及西方列强特别是德、日的对华政策,尽快恢复和重建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到破坏的情报网。

## 左尔格情报网分为两类

左尔格在上海落脚后,莫斯科随即给他配备了几个核心骨干。他们是:军事顾问、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鲍威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少将军衔),无线电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摄影师、波兰人约翰,电报译码员、爱沙尼亚人克尔曼,联络员、德国人鲁特·维尔纳(汉布尔格夫人)等。维尔纳在法租界的家一直是左尔格与中央特科人员秘密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

美国进步女作家、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交际很广,宋庆龄、鲁迅、丁玲都是她的朋友。1930年2月,在一次外国记者联谊会上,左尔格高兴地结识了她。还在德国时,左尔格对她就有耳闻,也读过她的书和文章,知道她很有叛逆精神。左尔格回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形时说:

“我立即明白,我可以依靠史沫特莱……我在组建上海小组时,特别是在物色中国合作人时,就请她协助。只要是她的一些中国年轻朋友,我都设法认识他们。特别是设法结交那些自愿合作的人,结交自愿为左翼事业与外国人共事的朋友。”

史沫特莱为左尔格情报网的建立起了穿针

引线的重要作用。除中国朋友,经史沫特莱引见结识的就有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资深记者、后来担任近卫文麿首相私人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随后,尾崎又介绍了川合贞吉、船越寿雄、水野成等在华日本记者或报人加入情报小组。

左尔格在上海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上述国际组,一是中国组。关于国际组,中外相关著作已多有涉及介绍。然而,关于中国组,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这是由于保密工作性质决定的。

经济学家王学文及夫人刘静淑、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及夫人顾淑型都是经史沫特莱介绍与左尔格相识,成为他的合作人的。他们不仅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又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更是维尔纳家每周一次碰头会的“常客”。不夸张地说,左尔格中国行的关键,是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当然,这需要他广结人脉,独立开展工作。

## 与中央联络员张文秋合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突然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此时的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决定,正准备撤退、前往苏区。一天,他找到中央联络员张文秋说,因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需要,经组织研究决定,同意她到远东局协助左尔格工作。说那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机密,希望她不要辜负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期待。张文秋回忆道:

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

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左尔格高兴地给我们让坐，同时回答说：“请你放心，我会给她安排适当工作的。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你给我把张一萍调来了。我还要求你，再帮我调几位来好吗？”

周恩来同志满口答应，说：“你点名要谁，我就给你调谁来。”

左尔格说：“我不认识党内什么人，不知道点谁好，你看着办吧！”

周恩来笑了笑，表示同意了。左尔格高兴得连连称谢。”（《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

周恩来还就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作了介绍。随后，便和左尔格握手告别。

原来这次会面之前，张文秋曾见过左尔格。那还是两周前的事。一天，史沫特莱特约她在董秋斯（她把女儿思齐寄养在董家）家相见。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个陌生的外国人，他就是左尔格。不过，左尔格并没有做自我介绍。顺便说明，董秋斯（原名董绍明）及夫人蔡步虚（原名蔡咏裳）也都是左尔格情报组的成员，董秋斯还是颇有造诣的翻译家，译著中有苏联文学名著、库拉特可夫的《士敏土》和世界名著、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

那天送走周恩来，左尔格转身对张文秋说：“我已经很了解你。董秋斯和史沫特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所以我指名要求调你来。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把国际的工作开展起来。”随后，他把助手吴照高请来相见，告诉他们假扮夫妻租赁房屋，建立机关。

按照左尔格的指示，张文秋和吴照高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分别租下两栋三层洋楼，开始情报收集工作。吴照高还向她宣布了国际的工作纪律和保密原则：从此切断与中共的一切关系，只接受国际分配的任务。

据张文秋回忆，左尔格当年三十七八岁，颇

有风度，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兼学者，住在福开森路一栋大洋楼里。吴照高是她的顶头上司，年纪和左尔格相仿。他是德共党员，原籍福建，出生在德国。公开身份是旅欧华侨资本家，妻子是进步书店“时代精神”老板，名叫伊萨，德国人。吴照高领一班人马住在吕班路。

张文秋说，取得情报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报纸上收集各方面信息；一种是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交给她的工作是前一种，即每天翻阅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十多种报刊，如《上海每日新闻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字林西报》等，从中摘录国民党的军政、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包括各地的所谓“匪情”和蒋介石的“围剿”计划等，并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整理成第一手资料。其他同事则分管翻译、打字等，最后汇集到左尔格处，由他核对印证，再用密码电报或经缩微技术处理，经哈尔滨或香港，转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

后来，张文秋被任命为南方站站长，负责与南方情报网的联系。有一次，她还化装成阔太太，乘英国《皇后》豪华客轮去过香港，送机密文件和传达左尔格的指示。

在安排好张文秋的工作后不久，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告别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长汀等一条秘密交通线，于12月15日进入江西瑞金，与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抵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人会合，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 “很有本事的王君”——方文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一个核心骨干，他在左尔格情报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左尔格在《狱中手记》中提到的，在上海时一道工作的“很有本事的王君”，即方文，又名张放、刘进中、陈浩笙，是左尔格和史沫特莱去广州采访时经董秋斯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助手。方文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随后，他把进步学生柳忆遥、肖炳实也发展为小组骨干。因他们精通英语，平时在小组里做中翻英工作。方文夫人鲁丝（曾在苏联受训一年）也是小组成员，后来协助丈夫去南

京建立新的情报网。

至今得知的，中国组还有以下人员：

章文先，周恩来离沪前推荐给左尔格的又一名中国助手，一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来的高材生。

吴仙青（女），当年29岁。1928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她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青睐，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不久，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十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原中共上海局成员，解放后出任浙江省长）、陈修良（沙文汉妻子，潘汉年战友，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沙文威（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人入党。中共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吴仙青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蔡叔厚，早年是共产党人，学机电专业的留日学生。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秘密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并调蔡叔厚协助他。时至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便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仍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中国组里还有中央特科介绍来的常同志（不知真实姓名），北京站的张永兴、于毅夫、张树棣，武汉站的刘思慕（刘燧元，解放后任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等。这样，截止1932年8月，左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包括上述国际组和中国组，已发展到近百人，其间还向苏联保送了一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

## 为红军反围剿提供重要情报

30年代初，一度遭到严重挫败的中国革命，首先在广袤的偏僻农村开始走向复兴。党领导的



30年代初的左尔格和周恩来

游击区扩大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等12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等大小15个根据地。工农红军则扩大到10万人，其中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力量最强。

蒋介石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发动一次次“围剿”，企图将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

一天，左尔格对方文说，中共中央现在急需国民党策划中的“围剿”计划，包括它的进攻方向、兵力、装备以及部队集结的日期等等，“现在要建立一个情报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双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数日后，方文按左尔格所说的一家咖啡店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在交谈中提出了特科对国际的要求，方文则将事前准备好的材料交给了他。从此，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多个渠道的有效合作。

1932年夏，蒋介石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将枪口对准苏区，筹划第四次“围剿”。为此，在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德国顾问魏策尔退役大将同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左尔格从顾问朋友得到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也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



区。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他们得到情报后,立即作战术转移,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工农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多月,又一次彻底打垮了他们消灭红军的图谋,随后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

左尔格对工农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战后,其陆海空武器装备受到凡尔赛条约的诸多限制。为此,德国曾利用国民党在中国内地秘密试验各种新式武器,包括远射程的大口径火炮、跨越欧亚航线的大型飞行器等。所有这些都未能逃过左尔格的眼睛。他还从德国教官处搞到了一张南京最大的军火库的示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集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

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对于左尔格这一段工作,前苏联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中曾说,当年“左尔格搜集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莫斯科制定其远东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左尔格的最后杰作

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军方情报系统、持有瑞士护照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刚满五岁的儿子和保姆。罪名是特务嫌疑。同年8月14日,主要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而被认定为国际间谍,秘密引渡给了国民党军事当局,并传言将被判处死刑。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

牛兰(Nougat)只是他多个化名中的一个,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支·鲁特尼克,俄国十

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在中国,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老板作掩护,登记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

牛兰是有丰富经验的“契卡”人员,为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判两年徒刑。从审讯记录看,牛兰夫妇被押解南京后也保持沉默,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因他身兼“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书记职务,营救活动遂发展成为抗议蒋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权的世界性运动。然而,南京方面对此始终保持缄默,从不作公开表态。

1932年新年刚过,左尔格奉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之命,开始介入此案。他一方面请史沫特莱进一步动员国际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另一方面开始秘密侦察牛兰被押解南京后的下落,并疏通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

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中央俱乐部CC派,即陈立夫的中统手中。左尔格小组里的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左尔格便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果然,柳忆遥通过一个可靠的亲戚得知,CC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不仅知道牛兰的下落,而且还是此案的主管。

左尔格没有满足于这点信息,认为最好有个文字依据,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证明他确实实在南京。有了这个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抗议活动。于是在左尔格的积极支持下,方文和柳忆遥设法派人与张冲秘密接触。双方经过一番周旋,最终达成一项协议:以三万美元换取牛兰在狱中的手迹。

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不过,左尔格考虑张冲的为人以及他在20年代曾留学苏联等经历,认为他未必是一个反共的死硬派。国民党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是家常便饭,不算犯法。可是“暗通共党”则格杀勿论。张冲竟然敢冒这个风险,同意做这笔交易,必然另有企图。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有拒绝我们的请求,说明他

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即有了牛兰的字条,等于我们又多了一个情报员。“中共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刘顺章或马顺章吗?不但有而且比共产党多得多。只要我们的方法对头,就能找到这样的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转引自《红色国际特工》)

左尔格只要求一条:先交货,后付款。对方对此也未表示异议。于是左尔格当即电告莫斯科,莫斯科欣然采纳他的建议,并告知两个携款人(其中一人为李德)已上路。左尔格拿到牛兰一张3寸长、1寸宽的俄文手迹并鉴别其真假后,照价付了款。随后,国际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牛兰运动。顺便说,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公开审理牛兰案件,于1932年5月以所谓扰乱治安、触犯“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随后援引大赦条例,减刑无期徒刑。他们被关押至1937年。同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2月8日),牛兰夫妇逃出监狱,后在宋庆龄协助下于1939年回到苏联。

关于这一次交易,事态的后续发展证实,左尔格当初估计的那样,张冲成为共产党的朋友,在周恩来的正确指引和帮助下,以民族利益为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 左尔格被捕

话说回来,左尔格对张冲所做的分析,当时只是一种乐观的估计,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这次交易,无形中留下了左尔格情报网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这是不可忽视的。1932年5月,左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

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1932年10月10日,总参四部的别尔津将军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

(左尔格的暗号——笔者注)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

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为安全起见,莫斯科要求相关人员迅速撤离中国,从而导致左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在被召回莫斯科时,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左尔格于1932年底告别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离的,还有方文、柳忆遥和肖炳实等。左尔格的离去,也意味着他在中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张文秋等一批中国情报战士回到了中共党内。

回到莫斯科后四个月,左尔格于1933年5月被派往东京,揭开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左尔格和他的“拉姆扎”小组在日本工作8年,其间准确无误地预告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南进的国策,在二战情报史上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手笔,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左尔格于1941年10月在东京被日本反间谍机关“特别高等警察”(“特高”)逮捕,1944年11月7日和他的终生战友、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一道被送上绞刑架,结束了他49年的光辉生涯。

20年后的1964年,苏联公开了左尔格的秘密,追授他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并在莫斯科竖起他的巨大塑像和纪念碑。

主要参考文献:

- 1、张文秋著:《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2、张晓宏、许文龙著:《红色国际特工》,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 萧 徐)

## 启 事

2008年精装合订本 85元,简装 80元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 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

• 刘立强

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曰《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下面所写的，就是我自己亲历和了解的有关《反击》影片的一些情况。

## “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1976年10月8日前后，我从部队到北京出差，住在李先念伯伯家里。那时，距离“四人帮”被党中央隔离审查刚刚没两天。作为核心决策人之一，李先念虽然每天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精神却格外的好，和我在一月周总理逝世时见到他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

一天吃饭时，就像那些日子许多寻常百姓家里一样，他与我们共同品尝螃蟹。老人家不喝酒，但他并不阻拦我们以酒佐餐。席间，大家话意正浓。忽然老人家话锋陡转，扭脸问我：“你看没看过《反击》呀？”我回答道：“没有！”李先念随即大声地说：“要看看啊！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下午一两点钟，办公室的秘书就来通知了。我和周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赵炜乘坐一辆轿车，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礼堂，一起观看了《反击》影片。赵炜曾经长期担任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后来还连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副秘书长。

就在车上闲聊中，赵炜感慨地对我说：“先念同志就是有水平、有经验。年初那段日子里，我们给王震等老同志送文件，王震同志憋不住，当着我们的面就开骂（四人帮），可是先念同志却沉得住气，给他送文件时，有时遇见他正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身体，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向中央请假休息了，送么事文件啊！不要送了吧，送了也不一定看哦。其实他是深谋远虑，早已经谋略在心、成竹在胸。关键时刻，先念同志协助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共同决策，在取得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同意的情况下，最后不费一枪一弹，一下子就把‘四人帮’彻底解决了。真是太棒了……”

得知我看过《反击》后，李先念问我：“是不是反你爸爸的啊？”

我说：“爸爸算老几呀？实际上还不是对着你们中央来的啊！（四人帮）他们也忒下作了，什么黄河省，含沙射影，不要脸！（影片中黄河省委书记韩凌的儿子）连我的小名都用上啦！一模一样，叫小强……”

李先念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还没等我“发表”完观后感，老人家早已乐得哈哈大笑。

## “我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

父亲临终前，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也简明扼要地报告了这件事。父亲的信里是这么写的：“当时，‘四人帮’还在河南拍摄反动电影《反击》，使我和省委压力很大。于是我就在三所一个几百人的会议上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他们。”（引自《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

那时父亲的这个讲话，很快就传到了北京。1976年8月20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的一个副



书记给迟群、谢静宜写信打小报告，说我父亲“在一次省委干部会上讲：‘你们为什么对《反击》这样感兴趣？！……中央还要审查嘛！’”他还汇报说有个持“闹派”观点的人也曾当场起立，反过来质问父亲：“你为什么对《反击》这样不感兴趣呢？！”……

可见，尽管《反击》影片尚未出笼，在河南的干部群众中，围绕着《反击》是好还是坏，针对各级党组织是闹还是保，两种观点已经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了。



刘建勋陪同李先念(左)会见非洲客人

## “刘建勋不批邓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

当时，《反击》影片的宣传可谓铺天盖地、来势汹汹。河南各地的闹派分子把《反击》的剧情介绍、演员台词印成传单、抄成大小字报，在机关学校、厂矿农村到处张贴。影片中的人物对白录音也被他们想方设法从摄制组弄出来，在全省的许多城市乡镇播放。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一个——搞乱前一年各项整顿后初定的人心、搅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趁乱上台，篡党夺权。

而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当时担任着河南省党政一把手的父亲，闹派分子在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高楼大院，贴满了“刘建勋不批邓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之类的标语口号。各地市县乡、各厅局委办、各企事业单位……依此类推，就像串糖葫芦一样，许多领导干部都成了闹派分子口诛笔伐、狂轰滥炸、批斗围攻，甚至抄家游街的目标。

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张俊卿，六十多岁了，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挂了铁制的二十多斤重的“黑牌”，然后推上卡车，游街示众转了半个城区。没过几天，闹派分子又强行把他从市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上绑架走了。我父亲和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张树芝闻讯立即下令，迅速派人将他从秘密关押处解救出来。（引自梁心明《名如其人》，见《走近大海》第55页）

洛阳市的闹派分子纠集上千人，乘坐了近百部汽车冲进郑州的省委大院，高音喇叭昼夜不停

地攻击谩骂，他们还抄了省委秘书长王大海的家，要把他揪回洛阳批斗。幸亏父亲事先得到了消息，将王大海悄悄藏到黄河岸边驻军弹药库的军事禁区内，后来又转移到了外地。（引自王力著《怀念大海——感悟他的百姓情结》，见《走近大海》第302页）

多年之后，曾任纪登奎的秘书、当时任河南省委常委的赵俊峰回忆道：“1976年批邓时，省委领导人里，人家反对得最凶的，一个是刘建勋，一个就是我。有些人闹得很厉害，我们俩怎么也过不了关，建勋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也让闹病了。后来，我们两个躲进离郑州市区三十多华里的省委三所，就在那儿呆着。这么大个省，几千万人，有许多工作呢，我们心里也着急。可那一阵，外面闹得很凶，又是静坐，又是罢工，建勋要是折磨得受不了，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怎么交代？所以，我也出不去，也不能让他出去……”（纪坡民著《听父亲谈往事：“唐山地震”的回忆与反思——政治斗争中的抗震救灾和抗震救灾中的政治斗争》，第39页）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当时也在省委领导集体中找到了应和者和代言人。4月前后，河南省委做出决定，把郑州市闹派代表人物四大金刚、土司令张永和等坏头头抓了起来，唐岐山就幕后操纵组织大批人马到郑州市公安局静坐示威，向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施加压力。接着，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上，包括郑州市委领导张俊卿、王均智等在内的全省各地、市委书记们都一致坚决不同意释放张永和等坏头



河南省游行庆祝华国锋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 《反击》是“文革”期间阴谋电影的“重中之重”

一位资深的影评人在多年研究“文革”电影史后指出：“文革”期间真正能够算做“阴谋影片”重中之重的就是《反击》。（引自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台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

“四人帮”正是《反击》的幕后总导演。江青说：“我抓了七年电影，王洪文抓了三年。”“我呼吁多拍故事片！”“要写同走资派作斗争

的作品。”迟群、谢静宜等则是台前的指挥者，他们给《反击》定的基调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的一个拳头，是一枚重型炸弹”（迟群），是“打在敌人的前沿上，爆炸力要强，杀伤力要大”的“排炮”（于会咏）。

认真盘点一下就能够发现《反击》出笼的时间表与当时全国的政治气候同步，与“四人帮”的夺权计划同步，也与河南“闹派”制造的动乱局势同步——

1976年2月，江青找到河南的唐岐山，告诉他“河南省委不行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不行了”，要唐“到省委主持工作”，“当省委第一书记”，还要唐“管一管湖北”，当两省“总督”。（引自《乱我中原意在篡党夺权》，刊登于《河南日报》，1977年3月16日）

3月1日，党中央召开的“转弯子”会议刚刚结束，迟群就急急忙忙布置赶写剧本，文化部、电影局也很快批复了。

3月12日，迟群给《反击》的主题、人物、情节定下调子：“要写出走资派比还乡团还厉害！走资派就是法西斯，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

3月13日，迟群一天之内两次下令，先将《反击》中的第一号反面人物从大学党委副书记升为省委副书记，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一定要把省委副书记改为省委第一书记，写大的，写一把手，这是一条原则，现在有些走资派还在走。”

3月底，剧本由《占领》改名为《反击》。迟群批示要求点明省委第一书记韩凌的五大特点是

头。但是，“文革”期间始终负责全省宣传、文教和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戴某某随后却在省委常委会上突然站出来，提出要释放张永和。他的理由是“张永和是批邓的，现在邓出了问题，主罪消失”。戴某某的这个提议被省委领导集体否决了。

在此之前，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县委书记杨贵已经由周总理提名，选进了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成了候补中央委员，之后不久他又被周总理提名担任了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这时杨贵已由中央派回河南帮助省委工作。于是杨贵就以这种身份，代表中央对省委的决定表示明确支持，在干部大会上当众宣布：“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张永和不能放！”话音刚落，立即引来全场同志的掌声一片。会后，为了支持各地、市委与闹派分子做坚决的斗争，省委决定所有的常委们一律分头下去开展工作、加强领导。可是戴某某一到了平顶山市，就公开表态支持闹派分子反对省委和平顶山市委，给平顶山市委书记张成国等领导同志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加剧了当地的混乱局面。粉碎“四人帮”后，张成国同志曾经在党的会议上对戴某某那时的表现提出过批评，不料这却成了日后他自己挨整的口实。

对于戴某某的这些言行举止，父亲在1982年底《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都向组织作了报告。虽然调到中央工作，但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一直还兼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纪登奎在父亲去世半年以后，看到父亲的这封信，他提笔写下的批注里记述得更为详细具体。

“走资派、第一把手、不肯改悔、比还乡团还厉害、反革命分子的后台”。为什么要把黄河省委的第一书记取名叫韩凌呢？对他们来说，老干部就如同冬天的寒凌一样。

6月初《反击》开机不久，剧组到河南三门峡市拍摄外景，“四人帮”把持下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破例组成了联合记者团随行采访，由电视台拍摄了长达近一个小时的专题节目，进行前所未有的重点介绍。他们还提前搞剧照，提前写评论文章，提前改编京剧，提前绘制连环画。（引自“《反击》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宣言书”，刊登于《南方日报》，1976年12月3日）

《反击》把黄河大学所在地的省委第一书记作为“走资派”来刻画，河南又地处黄河流域，河南省委本来就担着心，预感到闹派分子可能会牵强附会，果不其然，摄制组里的个别成员下车伊始，与当地的闹派分子里应外合、推波助澜，使原先就存在两种不同政治观点的河南局势，进一步出现了混乱。

得知《反击》在河南产生了影响，迟群兴高采烈地说：“《反击》在走资派那里已成为强级地震。”

过了快三十年后，我在采访《反击》的导演李文化先生时，他对《反击》摄制过程中那些闹派分子给河南许多地区造成的动荡和破坏记忆犹新。

时任河南省委秘书长的王大海在晚年写的《艰难的步履》一文里，有更为详尽的回忆：“‘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把我在讲话中批评派头头的话：‘欺负老干部欺负透了，整整受了八年气，挨打受气，像个小媳妇’等话作为原型，写进他们炮制的电影《反击》中，在全国播放。洛阳的派头头更是将广播车开到省委大门口，用高音喇叭对着省委播放《反击》的电影录音。”（引自王大海回忆文章《艰难的步履》，见《走近大海》第520页）

8月中下旬，迟群看了手下人员写的河南情况汇报，兴奋不已，他批示：“对这些人，这个片子是一次强烈的大地震！……是赶走资产阶级老爷的保证。”

9月21日，刘庆棠、迟群、谢静宜审查影片后表态：一次通过，国内外发行，并决定在国庆节公开上映，而且布置提前于9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布广告。

## 《反击》终成覆灭的挽歌

就在此时，河南省委不断向中央报告申诉，认为《反击》是影射河南政治状况，而且由于摄制组中一些人参与了当地“闹派”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河南的不少地区局势紧张，倘若影片上映，势必造成全省大乱。

由于河南省委的不懈努力，迫使张春桥向文化部下达了一个指示：“能否避免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反应，修改掉影片太像河南的部分？”9月26日，张春桥调看了《反击》后，再次打电话通知文化部：“上映先停下来……先不见报，也不宣传。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去。拷贝继续印。”

《反击》被推迟公开放映了。10月4日的晚上，预感末日即将来临的迟群哀叹道：“我们可能看不到《反击》上映，自己的头就被倒挂在天安门上了！”

48小时后，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等人协助，一举擒拿了“四人帮”。《反击》影片也连同它的炮制者一道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最后，我还想起两段轶闻小事：

其一，父亲去世前，在聊天时他曾告诉我，当年在中央正式传达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他和刘子厚、张平化、赵辛初等许多在“批邓”期间被整得死去活来的省委书记们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家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经久不息。

其二，著名围棋国手罗建文是父亲的忘年交。父亲去世后，他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在文中，罗建文老师说到：“……76年10月8日，聂卫平正在河南代训，那天吃过晚饭，建勋同志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处河南省体育场。由于主席的去世，我们已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见面后，他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和卫平都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因此，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是十分振奋。而建勋同志的振奋程度更甚于我们。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由于高兴，还喝了点酒。我心想，四人帮倒台了，以后刘书记可以更加支持我们的围棋事业了……”（引自罗建文著《刘建勋同志与围棋》）

（责任编辑 萧 徐）



# 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

## ——《黄克诚自述》读记

• 苗振亚

1959年7月初召开、8月中旬结束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个以反“左”始、反“右”终的会议,最令人震惊的是,它把几个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究其原因,是他们不迎合、不盲从,敢于讲真话,坚持自己的认知。

如果要盘点这场会议的政治遗产,有两条对中国政坛影响深远,一是党内不同的声音小了,争论的气氛少了,讲真话不再是一种权力,而变成了一种冒险。二是极“左”路线占据上风,从庐山会议发源,如江河呼啸,直流无碍,最终导致一场更大的灾难——十年浩劫的发生。

作为当事人,黄克诚身居庐山会议的风暴中心,而《黄克诚自述》中所涉及到的庐山会议,不仅能让我们深度体味那场斗争中的人和事,更能从跨越时空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悄然转折。

庐山会议,原本并未安排黄克诚出席。

1959年7月中旬,已经开了半个月的庐山会议,按原定日期即将结束。这时,黄克诚突然接到通知,召他上山。他当时的感觉是:会议上有事了,一是分歧意见很大,二是彭德怀可能要受到批评。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面对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的混乱,河北、山东都有饥馑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他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希望能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说出自己的看法。

因而,黄克诚把上山看成是一次讲问题、说真话的机会。

上山的第二天,与谭震林的一次接触,就证明他想错了。在接触谭之前,他先拜访了李先念,谈了一些情况,李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

定要改变才行。随后在拜访谭震林时,谭听说黄在拜访自己之前先拜访了李先念,就有些不太高兴,说黄的观点已先入为主地受到李的影响,黄不承认受到影响,两个人就争论起来。争论中谭无法说服黄,就有些急不择言,直接向黄兜出了底细:“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想不到召他上山的目的,竟是“搬救兵”——批判彭德怀,就想也没想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就是这朋友间不经意的一句话,最后也成了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明。

但是,既然要搬救兵,这就说明,彭德怀的观点,在庐山并非形成一边倒的反对与批判。

黄克诚于7月17日上山,以后的几天都是开小组会。小组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黄也在19日的发言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的意见。从《黄克诚自述》中知道:当时小组里除了罗瑞卿、谭震林之外,都对黄的发言表示认同。这似乎可以说明,大部分与会干部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纠“左”是多数人的愿望,而彭德怀的信正好说出了他们心里话。

对这种局面,毛泽东主席是不满意的。

为扭转这种局面,7月23日,毛召开大会做长篇讲话。讲话以闲谈方式,进入正题,立场鲜明地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目的是把更多的人从彭德怀那一边拉过来,扭转会议方向。毛的有些话说得很重,很有敲山震虎的味儿。他说:“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

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这段讲话让大家明显意识到,毛已经把小组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党内路线斗争的表现来看待了。既然性质是党内路线斗争,站在哪一边,跟谁走,也就成了一些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放弃或否定原先的观点,也就成了一些人趋利避害的首要选择。

那么,黄克诚又是什么态度呢?

黄克诚并未因毛的“警告”而改变观点。他只是感到惊诧与不解:难道就因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与大多数人对“大跃进”的看法不合己意,就要来个180度大转弯,把一个原本“纠左”的大会,变成一个“反右”的大会?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怎么能说变就变了呢?

这天晚上,周小舟打电话给黄克诚,说他与周惠、李锐要过来谈谈。黄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周坚持要来,黄也就同意了。几个人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他们都快成右派了,黄劝他们别着急,说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黄说:我认为不会。周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说: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这样说,也许并不表示他的真正判断,他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应该给周小舟降温息怒,不然就会坏事。他还劝周,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议论不好,这才让周平静下来。大家接着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正准备离开时,彭德怀拿着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周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随口说了一句: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大概觉得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就说太晚了,催着周小舟走。处事谨慎的周惠,一直没说什么话。

这就是几个人这天晚上会面的情况。

按常理说,二周一李与黄克诚同是湖南人,都先后在湖南工作过,对“大跃进”同样都是不赞成的,希望早点结束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想在一块谈谈,听听老领导的意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就在几个人出门离开时,正巧碰上了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也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迫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了这个“反党集团”活动的重要罪证。

毛23日的讲话,效果又如何呢?

毛讲话后,大家的发言依然不太激烈,对彭的批判也还没有离开信的内容,预期目似乎并未达到。毛26日又下指示:批判要对事,也要对人。于是,批评的火力加强了,目标除了集中彭德怀以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就在很多人调头转舵,纷纷发言表态时,黄克诚也作了检讨,言辞虽变得缓和,但基本观点并未改变。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上,他说“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在对彭的“意见书”的认识上,他说“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对黄克诚的劝说工作也开始了。

7月30日,毛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谈话。这次谈话,有一种特别的气氛。毛的话说得很重,但显得火气不大,空气不紧张,几个人也较敢讲真话。

毛一上来就给黄戴了几顶很具威慑力的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与彭的基本观点一致,与彭是“父子关系”。黄没有屈从,逐条答辩: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在逐条答辩中,黄的有些话说得很不客气: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黄克诚最不客气的话,当属与毛争论四平保卫战往事。四平保卫战时,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也在东北战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晚年黄克诚

他曾多次电告林彪,建议从四平撤退,林不回电,也不撤兵。黄无奈,只好电告中央,还是不见回复。最后的结果是,我军伤亡惨重,才不得被迫放弃阵地,撤离四平。毛此时反问黄:“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答:“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跟上来一句很有些犯上的话:“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毛也只得自下台阶:“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毛最后又把话头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这分明是暗示他们赶快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们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又都是不会作伪的人,他们的态度可能让毛失望了。

从另外一个资料中得知,在毛找黄谈话前,作为党内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的刘少奇与周恩来,曾先此找他谈过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因为他仍然“执迷不悟”,毛才决定亲自出马。对于毛来说,这是一次毫无效果的谈话,但对于黄克诚来说,却不无收获——虽然毛对他的指责颇重,但他到底有个机会,把想说的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这里还需要补充交代一件事,看看彭黄之间是否有像毛说的那种关系。

就在黄克诚7月17日上山刚住下,彭德怀拿着那份“意见书”给他看。他看过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说尖锐的话,我就是提得引起重视。黄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由此看来,彭写信的善意,黄待人的坦诚,党性人品,确是白玉无瑕。而毛确有些过敏了,一从

党内斗争想问题,难免疑窦丛生,就不能从道理上服人了。

对黄的劝说在继续。

7月31日和8月1日,毛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特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列席。会上主要由毛讲话,讲话特别令人惊愕的是那些上纲定性之言。谈到彭的“意见书”,毛说: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党中央,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谈到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毛说彭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毛最厉害的话,已不仅是针对彭,同时也针对黄克诚等人,讲话中的“你”,已变成“你们”。毛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在这个会上,彭也不断插话,以事实对毛的话进行反驳。黄克诚也说了几句表态的话,他既劝说彭冷静听取批评,也还依然为彭说公道话,说在中央苏区后期,毛被夺去了领导权,彭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证明彭不是一个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的人。

会后,毛又把他们四人留下,还是劝他们别



再受彭的影响。毛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对黄克诚,毛似乎也还有争取他回头的意思。可是,依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几个人,再一次让毛失望了。

劝说既无效果,那只靠批斗解决问题了。

其后,对黄克诚的批斗会就摆开了阵势。开始时,黄克诚的态度依然很强硬,对不符事实不合情理的批评,就进行反驳。慢慢地他就意识到,在这种场合,摆事实讲道理是没有作用的,只好光听不说,保持沉默,但检讨总是过不了关。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谈了一次不行,又谈一次,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以摆脱困境。但是,诬陷他人以解脱自己的事,在黄克诚是绝对不会做的,因而他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他终于也没有在自己的交代中,揭发出彭德怀的什么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困境。

可以说,庐山会议最考验黄克诚的,是他的诚实。而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也还是他的诚实。

小组批判会上,有人穷追7月23日晚,他与二周一李谈些什么。他经过思想斗争,觉得有一句话是说不得的,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呢,又是对党组织隐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中央委员,良心上会不安。他只好如实说出了那晚的前后经过,把“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那句话说出了。正好,彭德怀与张闻天也曾如此议论过毛,这时也被揭露出来。这无异于给大会投下一枚炸弹,瞬时一片哗然。那些在批“右倾”时还有些同情他们的人,改变了态度;原先还以为“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定讞是空穴来风,有了确证,黄克诚也因此成了“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前些时,毛只把批判重点放在彭德怀的右倾上,还想争取他们几个,到这时也就完全确认,除周惠是沾了点边以外,他们几人确乎是“反党集团”成员了。

毛的确认,常委同意,剩下的就是履程序,要当事人签字划押认罪了。黄克诚不承认自己反党,拒绝签字。为此,陶铸三次找到他,说会议已经开这么长了,大会决议总得公布,总不能这样拖着,劝他多为党和国家大局着想。最后,黄克诚也意识到,毛的性格之强,中央全体又都站在毛

的一边,也只有自己受委屈、背冤枉、“顾大局”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克诚没有因免官戴罪而痛苦,他“无日得安”的痛苦是,不该因“顾大局”而违心地认罪,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大会的“决议草案”。所以会如此,他找出的深层原因是:“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其实,黄克诚这一次并没有“服从主席的决定”,也没有“接受主席的批评”,否则他就不会有此一劫。他只是在接受处理决定上缺少坚持,他的自责与痛苦,只能说明他的诚实是容不得一粒沙子的。

读《黄克诚自述》,可以让人强烈感受到,从参加革命开始,他就对极“左”的做法十分反感,由反感到怀疑,由怀疑到抵制。为此,他曾一次又一次被划入“右倾”之列,遭到整肃,陷入险境,最终又都化险为夷,恢复清白,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他确实是一个无私无畏者。而庐山这一次,他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对于那顶“右倾”帽子,他还可以接受,比起那些原本就是“极左”的人,或被政治风浪逼上“极左”的人,他确实是右倾了。对于“反党”这顶帽子,他就不能认同了。他承认,在他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但因此把他打入“反党集团”,硬要他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并写进党的决议,他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了。然而谁又能想得通呢?如果黄克诚反党,那谁又是热爱党的人呢?

黄克诚一生所受到的委屈太多,惟以庐山会议受到的委屈为最重。那么,受了委屈的黄克诚,又是如何看待庐山会议的呢?他认为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不是他一个人或他们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责任编辑 萧 徐)

## 公民教育三人谈

## 官员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

• 丁东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共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是第一次。然而三年时间过去了,公民意识教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作为状态。相反,伤害公民教育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主持下,由100多名学者和一线中小学教师历时数年,编写了一套8册的公民课教材《新公民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的小学四册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方面,有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在公民价值观方面,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主题;在公民知识方面,包括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等主题;在公民参与技能方面,包括与人沟通、演讲、讨论、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向责任部门或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等主题。我认为,这是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好教材,公民教育的框架,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像“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要收税”,“新闻舆论的力量”、“维护公正”、“走近民主”,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重大主题,但课本通过孩子容易理解的小故事,做出通俗活泼的讲解,并且配了生动有趣的插图,让人耳目一新。这套教材在一些小学试用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以这套教材的诞生为契机,让公民教育普遍走进我国中小学校的课堂。某些掌握权力者对教材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来并不奇怪。

但他们不是善意地提出改进意见,也不和编者进入平等的沟通,而是强令北京大学出版社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必须收回,把这套教材打入冷宫,上百名教育工作的心血付之东流。

建国六十年来,公民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受到伤害的不只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学生,同时还有各级官员。中国的平民固然需要提高公民意识,官员更需要提高公民意识。自80年代提出干部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以来,中国官员的学历提高很快,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绝大多数,博士、硕士的比例也不小。他们在学校学了专业课、政治课、外语课,但没有接受公民教育,公民意识在许多官员那里仍然是个空白。

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官员在公开场所的一言一行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有些官员的雷人言辞,例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瞬间传遍了世界。也许这位官员是一时失语,但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许多官员的内心并不承认主权在民。地方官员无视公民权利的行为,也是接连不断。从贵州彭水诗案、辽宁西丰抓记者案、河南灵宝赴沪抓王帅案,一系列相似的案件,都表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大量地方领导人不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何物?支配他们执政的,其实还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代牧民思维,还是和“公安六条”一脉相承的专政思维,与现代公民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辽阳市进行公车改革,公长岭区给

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的车补高达8万元,宏伟区委书记和区长的车补也高达7.6万元,是当地职工平均收入的3倍。可见这些官员设计政策根本没有对纳税人的敬畏。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也缺乏公民意识的系统教育,但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对于公民意识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对官员,如果不有意地进行公民意识

教育,权力就会使他们头脑膨胀,做出种种现代公民社会不能接受的蠢事。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公民意识教育的补课。并且应当排除干扰,尽快在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立公民教育的应有位置,这样才可能使未来官员的政治素质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因为明天的官员必定出自今天的学生。

#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

## ● 智效民

公民与臣民,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前者具有人格独立、政治参与、社会责任等特征,乃现代社会的标志;后者具有人格依附、政治陪衬、不负责任等特色,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培养公民还是造就臣民,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公民教育或党化教育来实现的。因此,了解一下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或有补益。

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以后。当时严复就认为,只有智识、力量、道德优秀者,才有实行自治、享受自由的能力。因此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的新人。于是,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办学堂、废科举、兴西学、育人才,就成了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并终于迎来推翻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公民时代的到来;但是公民社会的形成,还需要广大民众由专制社会的臣民变成现代社会的公民。于是,公民教育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据我所知,清末学堂的修身课虽然已经初步借鉴了先进国家公民教育的内容,但并没有摆脱“忠君、尊孔、奉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直到民国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以后,才在原有的“修身课”内增加了“公民须知”和“中国法制大全”等内容。后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正式提出“补

定公民教材案”,其中包括编写中小学公民教材等内容。1923年,教育当局终于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以公民课代替修身课,这可能是我国第一次将公民课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与此同时,在民间教育团体和基督教在华教育机构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政的国民党根据“训政”需要,在学校里推行党化教育。1929年4月,当局首先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有“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的规定(参见《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有关方面又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公开声明,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页)。同年8月,当局在《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中要求将公民课与三民主义课合并为党义课,从而取消了公民教育。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现代极权制



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工具、专制集团的奴隶。面对这种局面,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当时胡适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吴健雄、罗尔纲、吴晗都是该校的学生。据罗尔纲回忆,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后来,胡适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许多文章,对党化教育予以深刻的批判。比如著名学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负责人任鸿隽就专门撰文分析了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的本质区别。他说:

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

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

正因为如此,任先生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由于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当局又很快恢复了公民课。1999年,李慎之在《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中说:“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此外,他在去延安之前,还在学校里教过公民课程。这对他影响很大,可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公民教育不但有相当大的空间,而且效果也不错。

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国民党搞党化教育,显然是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所幸的是,当时还给社会留下公民教育的空间。然而,新中国初期实行“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教育体制,公民教育就在中国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走出缺位状态。

# 公民教育需要实践

• 赵 诚

我认为公民教育不仅是个理念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雅典的城邦制度堪称模范。当时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有创意的政治家梭伦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基础上,经过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里的努力,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雅典建立了以直接民主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从而进入了公民社会。因为理性有趋向真理的本能,所以公民社会相信公民的理性。雅典让公民对公共事物发表意见,进行讨论,重大的

决策由全体公民表决,执政官由公民选出,司法审判由公民抽签选出的陪审员进行判决,都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理念完全是通过实践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雅典的公民教育就是在这种信任公民理性和判断力的基础上,实践行出来的。

所谓公民教育,应该落实在政治实践上,而不是局限在学校里,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假如没有实践公民权利的条件,单靠学校教育是不可

能培养出成熟公民的。因此,执政者在注重公民教育的时候,不仅要在课本上体现公民教育的内容,同时也要让社会成为一个公民教育的大课堂,让大家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借用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治及相互帮助救助的社会,公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社会的主人。公民社会公共权力的发生,是要靠公民自己选出受委托人来执行。而且在受委托治理的全过程,始终受到公民的监督。近代以来,从尼德兰,到英国、美国、法国等都开始建立代议制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允许公民自己组织社团,自办教育、自办报纸等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公民在这些自治团体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充分学习和履行公民的生活。这种训练使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能有理性的见解。马克思当年留居英国时很喜欢去海德公园,在那里听形形色色的言论。可见真正公民社会的成熟就是在公民运用自己理性的灵光进行思考、进行讨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公民教育既需要课堂的理念教育,也需要社会的实践教育。

早在一百多年前,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就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提出以下三点看法:第一,西方国家的报纸让国民了解天下事,就各种问题在报纸公开讨论,也是对国民的教育。第二,新闻媒体是人民表达意见的最重要的场所,同时也是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地方。第三,不让人民办报议政,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除弊兴利。因此他在《盛世危言》中回顾了历史的教训之后说:“欲通民情者,莫如广设日报矣。”

总之,公民教育不只是一种课堂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学习。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公民意识开始觉醒,并付诸社会实践。NGO组织的发育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中国现在的法律环境,对公民组成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按照现行的社团登记规定,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的非营利组织,都必须找到一个托管的主管单位。找不到主管单位就不予登记。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已有300万家,但只有40万家经民政部门合法登记。这种现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绝大多数的NGO在民政登记无门,只好在非法

状态下生存,或为了合法生存,被迫选择工商注册,以“公司”的面貌出现。外部是公司,内部是NGO,这两套模式给公益组织带来很多尴尬。按照现行税法,一旦是以工商注册的企业,任何捐赠都将被视为企业的收入。这样对待NGO,严重伤害了青年一代关怀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了。如今的中国,在经济基础和人心所向上,已经具备了走向公民社会的物质条件和心理基础。及时修改不利于公民社会发育的政策法规,让下位法符合宪法,让中国公民真正行使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拖延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 萧 徐)

## 书屋 2010年第3期目录

书屋讲坛	自由意识的失与得 ——品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从“禁低俗”说到权力的边界	薛理禹 肖雪慧
灯下随笔	喜剧·悲剧·闹剧 郁金香风潮与金融风暴	韩羽 李炜光
编读往来	我真的是“无事找事”吗? ——答蔡淑萍女士 就秦始皇事,致蔡淑萍君 秦始皇不过是嗜血的暴徒 ——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何错之有?》的意见	蔡放波 梁正齐 韩志柏
书屋品茗	宋美龄的爱情小说 丰子恺致新加坡的书简 性而上的梦悟与幻像 ——读周实《性比天高》 刘恒近期电影剧作中的新主旋律 中国近代传统藏书楼的绝响 ——记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	徐珣 王炳根 杜进明 秦立彦
人物春秋	国土无双傅斯年 断肠人在天涯 ——为范烟桥自定年谱《驹光留影录》补白 原出须眉两枝笔 王闾运的官运 梦觉尚心寒	王开林 张永久 吴心海 刘诚龙 李源田
说长论短	也谈诺曼底战役的意义 ——与刘洪玉先生商榷 “穿凿”和“附会”之例 且炒陈饭说月光 “让教科书述说自己的历史”	谢天明 贺越明 任辛 辛继湘
艺术天地	杨福音艺术散论 血色幽默与时代宿命	鲍尔吉·原野 哈米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 陈明守护丁玲的尴尬

● 徐庆全

著名作家丁玲和陈明的爱情，在文学圈甚至圈外，都引起人们关注。近日，年过九旬的陈明，出版了《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以亲历者的身份，系统地回顾两人相伴走过的历程。书中在陈明的简介中说：这本书，“对于了解丁玲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极其宝贵的独家史料”，对于像我这样关注丁玲的人来说，自然是必读的书了。读后有所感，为小文与读者分享，恳请陈明及方家批评指正。

## 陈明对丁玲的两个担当

丁玲与陈明的结合在 1942 年的延安。那时，丁玲 38 岁，陈明 25 岁，13 岁的差距，典型的老妻少夫；此前，丁玲经历过两次婚姻——先与胡也频，胡被国民党杀害后与冯达——和一次恋情——与冯雪峰相恋，陈明经历过一次婚姻。尽管陈明比丁玲小 13 岁，但自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后，陈明一直扮演了丁玲守护者的角色。这角色，基本上是两个担当：一是在丁玲命途多舛的岁月中，不离不弃，成为其坚强的后盾；一是在政治上、历史上维护丁玲的名誉，尤其在丁玲 1986 年去世后，陈明虽再婚，但一直没有放弃丁玲名誉坚定捍卫者的责任。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的作家中，丁玲属于命运最为坎坷的一个。这种命运，肇始于 1933 年她被自己第二任丈夫冯达出卖的被捕。在被国民党软禁 3 年的岁月中，丁玲与冯达育有一女，直到 1936 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陕北。在延安，丁玲又写过使她受了“几十年苦楚”（丁玲语）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成为延安整风中被批评的对象；而在接踵的“审干”中，丁玲被捕的历史又似霍桑笔下无法隐灭的“红字”，梦魇般地纠缠着她。然而，梦魇并未结束。1955 年，丁

玲又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头目，1957 年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右派”。经历了风霜雨雪的北大荒岁月后又进秦城监狱；出狱后又被流放山西，直到 1979 年才重返北京，恢复党籍；而她被捕那段历史的结论，几经周折，直到 1984 年才尘埃落定，丁玲用“我可以死了”来告慰自己。此时，距离丁玲谢世仅有不足两年的时间！

在丁玲所遭受的几次大的创痛中，陈明不管从现今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党性”来说，还是从自己的命运考虑，都可以选择离开而不用背负道德的指责，但陈明坚定地 and 丁玲站在一起，成为丁玲栖息的港湾。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爱情，用“荡气回肠”的字眼来表达，都轻了。

丁玲谢世后，陈明依然没有放弃守护者的责任。虽然这种守护，使陈明常常有“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忙碌和尴尬，但陈明一直坚守，直到如今出版这本回忆录，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守护。

本来，丁玲一生坎坷，涉及到的历史事件甚多，而自身的经历又是那样丰富，她的性格又是那样特立。对于研究者来说，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不足为怪。但在陈明看来，凡是离开了他心目中丁玲形象的观点、言论，基本不足取，应该按照他的观点而对丁玲保持“舆论一律”。为此，陈明首先写下了大量文章批驳研究者，甚至采取上书的方式动用组织手段以维护丁玲的形象；其次，以对丁玲日记、讲话以及作品整理的方式，修改原始记录，以有利于己。在陈明这本回忆录中，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守护痕迹。

## “改家”陈明的“夫子自道”

丁玲称陈明为“改家”，意即丁玲的作品都经过陈明的修改。在回忆录中，陈明专门有“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一节，说明自己这



样做的理由，其中着重谈到了他对丁玲四十年代日记的修改原因：

至于丁玲 40 年代的日记，因为要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只得我独自替她改。我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她的日记本来就记得很不完全。我修改过她和毛主席的谈话，因为她与主席的谈话，也是凭记忆记下来的要点，不可能一字不差，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比如毛主席说，矛盾的东西不忍卒读，看不下去。没有讲到矛盾作品的好处。我认为，如果把丁玲的日记原封不动地公开，人们会以为，丁玲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矛盾。

考虑到毛主席说这番话，只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不是太严谨，同时对矛盾也稍过了一点，所以我把这段话做了适当的修改，把丁玲说的矛盾的话加进去了。再比如毛主席说郭沫若，有才华，但组织能力差一些，我的修改也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丁玲接着毛主席的话说，他们的作品还是写得好，我不如他们。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丁玲去世后，我觉得这段谈话有意义，可以发表，比如毛主席一再对她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几年，而要看几十年。

这可以看作陈明修改丁玲作品的“夫子自道”。陈明何以要着重谈对丁玲日记的修改呢？缘于陈明与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关于丁玲日记的“笔墨官司”。我在 2001 年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也谈到这一“官司”，因而与我也有点关系。

丁玲 1947 年至 1954 年的日记，经过陈明整理后，以《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为题，首先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3 年第 2 期上，注为“陈明整理稿”，陈明在注文中还说：“括弧内的字是我加的简注。”那么，未加括弧的，读者当然认为都是丁玲自己的亲笔内容，是原始的记录，陈明只是原稿照录，未经丝毫的改动或删除。

不料，丁玲和前夫胡也频的儿子蒋祖林于



丁 玲

1994 年 5 月 22 日给《新文学史料》(见 1995 年第 1 期第 53 页)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严正指出经陈明之手整理发表的丁玲日记《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与原稿不符”，并以丁玲 1948 年 6 月 15 日的日记为例加以说明。蒋先生特意在括弧内加注说明：丁玲日记的原稿“现存我处”。

陈明“整理”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

蒋先生披露的日记原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

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放。

除了蒋祖林指出的“丁玲的话，经‘整理’，成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了”之外，陈明还把丁玲式有些语言上的表述作了他自己以为通顺的修改。

蒋先生在信末指出：“总之，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在内容上，不应随意修改和编造。在文字上，若修改不当，也会影响史料的文字水平。原稿中明显误写的地方，如修改，应注明是修改者的意见。”

当时，我为蒋先生认真求实的精神所感动，也为陈明对涉及毛泽东和丁玲谈矛盾、郭沫若的日记的“整理”感到震惊！因此，2001 年我在一篇文章中特意引用了这个例子（该文收在拙著《知情者眼中的周扬》一书中）：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陈明当然知道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也知道完整地保存史料对研究者的重要性，尤其是涉及到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的时候，更应慎之又慎。陈明的做法，名为整理，实则是肆意删改。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令我深感失望。失望之余，我还抱有希望——为保持丁玲的“完人”形象，陈明对文

艺界发表的有关丁玲的文章,从“事实上”加以驳斥得很多,这回是涉及到他自己了,我真希望他也能撰文据理驳斥。

我在文末还特意说:“顺带提个恳求:陈明可否就丁玲日记的修改问题,给像我这样的热爱丁玲、又有点‘考据癖’的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呢?”

由此说来,陈明回忆录中的“夫子自道”,算是给蒋先生和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不过,陈明这个答复,实在难以服人。首先,陈明认为,在丁玲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的情况下,“只得我独自替她改”;还说,“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日记本来就不是为了发表才写下的,若是为了日后发表而写,那么这日记就失去了真实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且不说,但说陈明把修改日记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连蒋先生这样不是历史的专门研究者都知道“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专门的研究者就更不同意陈明的观点和做法了。道理浅显易见,不必多费笔墨。其次,陈明认为,丁玲记毛的“意思可能不完整”,等等。陈明并没有与闻这次谈话,如何知道的?再说,日记是什么?私密的个人感受的记录,意思完整不完整,是个人的感受,旁人,哪怕是丈夫这样的亲人,怎么能越俎代庖呢。第三,陈明认为毛的话“不是太严谨”才做修改。且不说这是率意的断语,即使毛的话就需要句句“严谨”、“句句是真理”吗?更何况,毛是领袖,但毛也是人,他为什么就不能作为矛盾的读者,对矛盾的作品提出自己的评价呢?第四,陈明认为自己对毛的话的修改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而根据蒋先生披露的日记原文,毛评郭沫若只说“有才奔放”,陈明生生地把丁玲的“郭文组织较差”的评价强加给毛,让丁玲背上“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郭沫若的黑锅不说,如果这样还不叫“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那倒真让人无话可说了。

关于丁玲这一天的日记,还有一处也需要改正,这就是陈明“夫子自道”所提到的“比如毛主席一再对她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几年,而要看几十年”的那段话。现根据2001年出版的《丁玲全集》(11卷,第338页,这一卷是蒋祖林担任副主编的)收录的丁玲日记引如下:

毛主席坐在空地里的躺椅上,他很鼓励了

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我不懂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又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他又说:“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又邀我一道吃完饭。我在他院子里树下坐谈时,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他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

其实,毛在说了这一番话后,还有话,只是丁玲没有在日记中记载而已。

1978年7月24日,丁玲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简述自己的历史,“作为党了解我,处理我的政治问题的参考”。信中,丁玲提到了这一天与毛谈话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出国前夕,在西北坡一天黄昏,伟大领袖毛主席见到我,肯定了我这几年的努力的方向和工作,谈到决定派我出国的理由,并恳切地说:“看一个人不是看几年,而是要看几十年。”又说:“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最后又说到:“以后可以到工厂,写工人……。”(《丁玲全集》12卷第96页)

把毛的“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这句话,放在日记中的语境来理解,毛对丁玲有鼓励,当然也继续有批评,丁玲则只记鼓励,不记批评。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日记的内容才完整。“改家”陈明如果真的认为丁玲这一天日记“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倒应该把这句话补充进去。但陈明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明白,丁玲后来一系列的磨难,完全可以在这句话中找到源头。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且按下不表。

## 子之矛、子之盾的尴尬

上述陈明的“夫子自道”,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凡是不利于丁玲形象的,就改,这是“明改”。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别人有关丁玲的人和事记载,不好也不能改的,就按“夫子自道”予以“暗改”,方法是含混事实。这样的例子,在回忆录中可以随手拈来。

比如,书中关于周扬与丁玲在延安时的一段描述:

《“三八节”有感》之后,周扬编了一些马、恩、

列、斯、毛的书,地位渐渐上去了,跑在丁玲的前面。有人劝丁玲也要走上层路线。丁玲说:“首长们都很忙,我没事找他们干什么?”1936、1937年丁玲刚到保安和延安时,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常在一起谈天,很随便。那时中央领导都很容易接近。后来丁玲看到首长门前有了站岗的,就不进去了。毛主席后来也跟丁玲谈过周扬:“周扬这个人有点逻辑。他的特点是,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第78—79页)



丁玲与陈明

丁玲与“首长们”疏远是否因为“首长们都很忙”,是否因为“有了站岗的”,即使一般读者,想一想就能明白。这段话所暗藏的玄机在周扬编书上。

所谓周扬编马恩列斯毛的书,不是一些,就是一本,即《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44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1984年作家出版社再版。而“地位渐渐上去了”的潜台词,用通俗的话说,周扬善于拍马屁,“走上层路线”,以后才官运亨通;而丁玲因为不“走上层路线”,后来才屡遭磨难。周扬是否是只会“走上层路线”,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暗示令人生疑: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延安发展壮大起来的,如果在延安时,这个党的组织,这个党组织的领袖,就只重视“走上层路线”的人,怎么能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结果?陈明说这番话的时候,大概忘了自己也是在这个组织中生活了一个甲子的老党员吧?

另一个事实,也让陈明这种说法陷入自相矛盾。晚年的陈明,致力于一项社会活动,就是担任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的领导工作,从副会长到会长。他的回忆录中,专门写到了这个学会的目的:是“要学习、纪念和发扬延安的精神”,不但“组织出版延安文艺丛书”,而且“每到重要年份纪念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候,我们总要搞些活动”(第296页)。周扬这本书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第二年(1943年)开始编辑,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宣传毛泽东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吗?周扬第一次把毛

泽东与马恩列斯等关于文艺的论述并列在一起,在当年自然是“学习、纪念和发扬延安的精神”的最好的教科书,现今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这门学科的源头,恰恰是这本书形成的概念。怎么周扬在延安为讲话宣传就成了“走上层路线”,而晚年陈明在北京主持的重要年份纪念《讲话》、搞活动,就成了冠冕堂皇的“学习、纪念和发扬延安精神”了?子之矛,子之盾,我都为陈明的“夫子自道”尴尬。我相信,陈明晚年致力于对延安精神的弘扬与传播,绝没有什么私心,而是出于公心,我也同样相信,当年周扬在延安编的那本书,也是出于公心。

尴尬的还有,再举一例。

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怨,一直是文坛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说法:

丁玲看到《记丁玲》(沈从文在丁玲30年代被捕后所写——引者)之后,说沈从文是在写小说,很生气,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但没有写文章反驳。后来《诗刊》要发表胡也频的几首未刊诗,请丁玲写几句话,丁玲在文章里捎带了沈从文几句,说他市侩,当时不听友人劝告,一心依附胡适往上爬。……丁玲纪念胡也频的文章,是在沈从文健在时写的,发表的,沈对丁文有意见,是通过给徐迟等人的信来表达的,在丁玲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的。



这段话的玄机在最后一句：丁玲对沈有意见，在沈在世时就说了，沈可以反驳，沈不公开发表，反而暗地里写信给别人，在丁玲去世后才公开发表。潜台词是，丁玲光明磊落，而沈从文则躲在暗地里；丁玲去世后才由友人发表信，使丁玲失去了答辩的机会。

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怨是否像陈明所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做讨论。但从学术规范上来说，要对某人进行批驳，应当在某人健在时进行，给人家一个答辩的机会；否则，人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批驳者也胜之不武。陈明所言不无道理。但且慢，陈明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沈从文的要求是一种学术规范标准，而对自己则是另一种标准。这，可从陈明对待周扬的态度看出。

丁玲与周扬的恩恩怨怨，更为文坛所关注。陈明晚年维护丁玲形象的重点，就是反复地说周扬与丁玲的关系，反复地批驳周扬的一些说法。不过，如果把陈明从1979年丁玲复出后一直到今天所写的文章包括这本回忆录，作一个排列、研究，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大致的事实：在1989年，也就是周扬去世之前，陈明的文章中，即使谈到丁玲所遭受的磨难，也没有点到周扬的名字：丁玲在延安审干中的磨难，那账是算在“康生”头上的；丁玲在1955年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头目，那账是算在“作协党组”头上的；丁玲一直得不到自己满意历史问题结论，那账是算在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头上的。但1989年之后，陈明在文章中开始直呼周扬的名字，开始对周扬此前的做法、说法予以批驳。这只要翻翻汇集陈明1979年以后所写的文章的《我说丁玲》一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就不难看出来。最典型的事例是，周扬在1978年答赵浩生的访问，提到了丁玲，并有一个在延安就分两派——以丁玲为首的“暴露黑暗”和以他为首的“歌颂光明”——的说法。该文1979年就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但在事隔十多年后，陈明才在1992年专门写文章进行批驳。在这本回忆录中，凡涉及到周扬的地方，更是不放过。

用陈明对沈从文的要求反观他对周扬的做法，如果说陈明等的就是这种“死无对证”的时机，虽合乎逻辑但毕竟是我的揣测，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这里，又有必要把我在2001年对陈明

的“恳求”重复一遍，希望陈明点拨迷津。

顺带补充一则史料。

陈明在书中提到，1978年他在北京为丁玲和自己的平反奔波的时候，看到过邓小平和当时文化部两位领导人的一个谈话，内中提到了丁玲。当时他没有抄下来，现在书中凭记忆写道：“邓小平说，丁玲和我同年，听说她现在还在写文章，写东西，对她应该有个比较宽的结论，这样比较好。可以不参加外事工作、外事活动。”（第259页）

我在搜集有关丁玲的资料时，在当年作协一位老人家里看到过邓小平谈话的记录稿，并特意把这段话抄录下来。谈话时间是1979年8月19日。邓小平说：

丁玲在长治，现在结论做得松了些，她表示感激。丁玲和我同庚，七十四了，现在还准备写长篇呢！

邓小平所言对丁玲的“结论做得松了些”，是指1978年7月6日，长治老顶山公社党委根据中央11号文件和山西省委的指示，为她摘掉右派帽子（第255页）。邓小平的话，与陈明记忆中的“对她应该有个比较宽的结论”语意显然不同；况且，邓小平也没有说过丁玲不能参加外事工作及活动的话。如同对待毛泽东一样，对待邓小平这样的历史伟人的话，也应慎之又慎，力求准确。

（责任编辑 吴 思）

##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 “合理想象”的妄言

● 王海光

话由是从最近的一场笔墨官司引起的。2009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等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一位名叫师东兵的纪实文学作家,指责其作品《政坛秘闻录》的所谓高层访谈纯属虚构编造。质疑者证据凿凿,真假是非一目了然,大可不必赘言,但由此相关的当代史研究的问题则不能不说说清楚。

这篇文章中用第三者的立场,请了一位中央党校党史部的教授来评论这件事情。这位教授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文革’研究谈不上禁区,只是比较谨慎。”还说:“有些纪实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他觉得师东兵的书,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问题,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这位匿名的“知名党史专家”的话,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文革”研究有没有禁区;二是“纪实文学”是不是历史研究。

首先,“文革”研究是不是禁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文革”结束后,对“文革”的研究一直是高度敏感的领域。“文革”档案不开放,研究受限制,成果发表难,这都是党史学界人所共知的问题。1988年12月,中宣部对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专门下达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著作和译著,“极易导致翻腾旧账,引起争论,实无必要”,明令规定此类书籍的出版必须经有关部门“严格审查”。所以,“文革”结束虽然30多年了,大陆公开出版的“文革史”研究专著不过四部。其中,80年代两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90年代两部,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1995),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可见,所谓“严格审查”,并非什么“比较谨慎”,实际上就是设置出版禁区。如金春明的《史稿》一书,是一部完全按照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精神写作的著作,但仍被有关部门指责为

“违规”出版,还追究出版社方面的责任。再如,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在80年代还翻译出版了前两卷,第三卷国内早已翻译,有关部门报批到今天,仍还没有出版。各家报刊对发表“文革”研究的文章,尽管都是慎之又慎,还是动辄得咎。笔者曾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张春桥的文章,结果这家报纸就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批评责难。

这位教授为证明“文革”研究不是禁区,还举了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再版为例。殊不知,已故的王年一教授生前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能对这部书进行修改。王年一后来的“文革”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成书时的认识。但这些呕心沥血的新见解,没有在该书再版时修改进去。理由很简单,该书一旦修改,就得重新报批,而报批就不得出版。所以,尽管再版四次,都只能是保持“原貌”了。这份学者抱憾终身的无奈,难道他“只是比较谨慎”,还能说不是禁区吗?恰恰正是因为有禁区,严肃的学术研究开展不起来,所留下的巨大的历史空白,只能是由那些假语村言的“纪实文学”来填补了。这些向壁虚构的“野史”,自然就成为百姓们了解这段历史的主要渠道,成为地摊上的畅销书。

第二,“纪实文学”与历史研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对师东兵和他的作品,党史学界的严肃学者从来不以为然,无人挂齿。但偏偏这位“知名党史专家”却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既然这位“专业人士”能把“纪实文学”当作为他的专业知识来源,这也就难怪“非专业人士”会把“野史”当作“正史”了。

这位党史教授还说,师东兵的东西“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有问题”,又说“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我们姑且不说这位教授的言语如何自相矛盾,也不(下转84页)

# 与江青有关的两本小说

● 小 鹰

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是1926年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的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二人因早期的两篇小说《客人》和《贵宾》，涉及到与江青有关的一段公案。

妈妈葛琴是一个三十年代参加过“左联”的老作家，自1961年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副厂长，这样的人在文革中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

运动开始时，妈妈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文艺黑线”参与者在北影厂受到批斗的。生性乐观的妈妈那时并不太在乎，回家后常向我讲起，造反派是怎样让他们这些当权派排着队伍，一边敲打着盆子，一边自报姓名和“罪行”，有时还笑着做样子学给我看。但她的的问题很快就升级了。1968年3月她正式被隔离审查，在中央文革专案组“一办”立案，内查外调，据说是叛徒嫌疑的重大历史问题。此后，妈妈在北影便受到严重迫害，有病不予治疗，直到弄得偏瘫失语，还要被隔离关押，谓之曰：“案情重于病情，病情服从案情。”

妈妈只是一个普通的司局级干部，怎么会在中央专案组立案？妈妈在历史上从未被捕过，怎么就成了叛徒？专案组为何在生活和病情上待她如此狠毒，非置其于死地不可？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我心里一直记得的一件事。

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妈妈除了常在厂里受到批斗之外，还要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大量地写“交待材料，检查认罪”。这已成为国内历届运动的常规了。

妈妈有时会被允许在家里写，每写出一些，她就把它放到抽斗中去，为的是不叫我们看到。有一次我要找什么东西，在抽斗中无意间看到一叠这种材料，出于好奇和紧张我便拿起来看。由于没有得到妈妈的允许，属于偷看，因此我

有些内疚和慌张，只是匆匆地看了一些，没有细读。记得认罪内容大致是自己写小说“攻击污蔑了江青同志，罪该万死！”一类话。这种自我责骂的空话，在那种用皮鞭和拳脚“横扫一切”的年代里，实在是很普通的事。

不过，我却记住了其中几个细节。其一，是有“黄蕓女士”的字样，其二，是妈妈在认罪的同时所作的辩解。妈妈写道，“小说里我虽然写过有人说：‘说不定她是毛主席夫人吧？’但马上就有别人驳斥他：‘毛主席夫人哪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决不是在攻击江青。”

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江青在三十年代时曾是上海的一名三流影艺演员，原名叫李云鹤，艺名是“蓝蕓”。由于丑闻和绯闻不断，报纸上常有披露，她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好。后来去了延安，改名江青，于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此婚事当时在党内反应强烈，因事关毛的领袖地位，从总书记张闻天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不少知情人都写信、发电报表示不宜和反对。据说后来政治局做出折衷决定，同意毛江结婚，但限制江青不得参与政治。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建国，江青由延安两次飞赴重庆看牙科，期间她大量接触云集在渝的各界文化人士，探询影艺故旧，招待社会名流，四处馈赠私人照片，这曾再一次轰动报界。旧日上海滩影星作为中共领袖毛主席夫人的出现，这自然引起不少议论。那时我父母也在重庆，对这些事情都有耳闻目睹。

解放初期的江青并不甘于寂寞，她试图在文化界，特别是电影界，建立和发展她的势力。为此，江青曾经来找过妈妈。

妈妈本来一直写小说，与电影界无关。1949年初妈妈与夏衍一起把她自己的小说《结亲》改编为电影剧本，同年由章泯导演，于南群影业公



司拍成了电影《风雨江南》，这个契机使她从此进入了电影界。1949年秋来到北京后，妈妈便在“中央电影局”从事电影剧本创作，根据她的剧本，后来也拍成了故事片《女司机》和《三年》。

1950或1951年的一天，江青忽然亲临我们在东四九条的住处造访妈妈。

“那是陈波儿介绍她来的。波儿是30年代进步电影演员，主演过《桃李劫》等电影，后来去了延安。”妈妈向我解释道，“那天江青坐了小汽车来，穿着还算朴素。我们不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会儿。”

此后，她们之间再没有过来往。显然，江青并没有看上妈妈，妈妈也无意与她结交。然而从此，我便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了。

1951年11月16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胡乔木的建议，由江青出任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当时她手下只有两名干事。虽然江青在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后来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上，均扮演过“兴风作浪”的角色，但是她那时在党内外的知名度甚低，一些中宣部的领导人并不把她放在眼里，只是逢场敷衍一下罢了，这大约使她颇为恼火。后来江青自己称病不来，那个电影处也就不存在了。

文化革命开始后，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自诩为文化革命之“旗手”；此后权势如日方中，“炙手可热”，且处处以伟大领袖的夫人自居，骄横不可一世。同时，她对知其根底的文化界人士又尤其恨之入骨。为了尽其可能消除流散于社会上关于她历史的所谓“黑材料”（包括旧报刊、杂志、照片、私人通信等），江青假叶群之手，于1966年10月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对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五位文化名人抄家、隔离。一些对其丑史了解的知情人，像郑君里、孙维世、王莹、徐来等艺术家，在文革中均被江青指使抓捕入狱，迫害至死。就是连当年在上海接济和帮助过她的保姆秦桂贞这样文化不高的人，她也不放过，以至无辜的秦竟也与“政治重犯”一起被关入秦城大狱达七年之久。江青这些“睚眦必报”，甚至於“恩将仇报”的黑心丑事，于文革后期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尽为世人所知。

“四人帮”倒台之后，1977年夏我去看望著名的三十年代老作家唐弢，向他提起妈妈写的

“黄蕨女士”这篇给她带来无数迫害的小说，讲了我所记得的检查中关于“毛主席夫人”对话的一些细节。胖胖的唐弢凝视我片刻，用和妈妈相似的江苏口音慢慢地说：“哦？我倒不记得你妈妈有过这样一篇小说。不过，让我来找找看。”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葛琴的小说集，好像是她的《窑厂》、《磨坊》、《犯》、《结亲》、《一个被迫害的女人》、和《总退却》等。我对他还保存有这些业已发黄的原版书甚感惊奇。唐弢老先生非常耐心地一边翻阅，一边沉思，好像是在做学问一般。忽然，他笑了起来，说“啊！是在这里了。”他说着便指给我看。那是收在小说集《结亲》里的一篇叫做《贵宾》的小说，那里果然有我记得的对话情节。接着唐弢又仔细地将小说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笑着对我讲，“写得倒是蛮像江青的，尤其是在路旁‘颐指气使’地要人服侍吃药那一段；又故作谦虚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一类的话；还有对区长指控汽车司机要谋害她，说什么‘我把司机交给你，绝对不许他离开此地，你得审问他，他玩忽职务，有什么企图没有？要他老实承认，不然的话——’，完全是一付文革中她那种小题大作、无理取闹、专横跋扈、歇斯底里的样子！”事实上，据“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揭发，江青身边的护士、工作人员，甚至许多与她打过交道的老干部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和感受。

不过，这篇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并不是“黄蕨”，而是“陆锦霞”。那么“黄蕨女士”又是谁呢？我深信不疑我在妈妈的“检查交待”中看到过这个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唐弢老先生也相信我，于



邵荃麟全家在香港(1948年)



1957年荃麟和葛琴在浙江(前排从左至右“葛琴、陈学昭、邵荃麟、艾芜,后排左一为张天翼)

是又继续查找妈妈的作品,结果没有找到。但他并不放弃,“会不会是你爸爸写的呢?”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又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荃麟的小说集,同样也是那种抗战前后印行的业已发黄的册子。老先生专心致志地翻看着,不久便又笑了起来,说“找到了!”原来那是一篇叫做《客人》的短篇小说,收在荃麟的小说集《英雄》中。

《客人》是爸爸在1939年8月发表于《改进》杂志(第1卷第9、10期)的一个短篇。那是讽刺一位从都市来的叫做“黄蕨”的著名女士,到地处抗日战区的乡下,进行所谓“采访调查”的经历。她的自高自大、自我中心、夸夸其谈的作风与基层人员及贫苦乡民处处“格格不入”,充其量实在只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客人”。大凡经过文革运动的人,从“黄蕨”身上不难看到“蓝蕨”(江青)的影子;二者“指手画脚”,“自命不凡”的形象,如此“惟妙惟肖”,令人忍俊。

然而,平心而论,爸爸在1939年写作时决不可能是针对30年后的江青。至于取什么名字不好,为什么偏偏“鬼使神差”地犯了江青有“难言之隐”的忌讳,倒是值得思考一下。

爸妈从20年代起一直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和文艺活动,他们对于上海文化影艺界的人和事是了解的。1938年10月到1940年5月爸爸曾任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他人虽在浙江金华,但与皖南泾县的新四军总部常有请示汇报等工作

上的来往。项英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因此,不能排除爸爸知道毛江联姻的事情,甚至支持项英等党内反对意见的可能。但这是否就是他给小说的讽刺对象取名“黄蕨”的背景原因,抑或那只是巧合,现已难以确定了。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项英当年敢于发电报“直谏”,是代表了党内一批人的忧虑,他们了解“蓝蕨”的历史和为人,反对这场联姻是为了保护党的事业。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政治敏感不幸被言中,但是这一行动却说明当时党内的生活还算是民主和正常,不像是后来那样,有些话不能讲、不敢讲,只要是批评反对某一个人或一件事就能被定为反党、反革命分子,以“欺君”之名治罪。

事实上,这种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帝王专制观念,在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颇有市场,特别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名义,它们很容易变相地为大众普遍接受;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则更是被鼓吹、发挥到了极致。其时,全国上下一片“无限忠于红太阳”的狂热,到处都是“誓死捍卫”和“砸烂狗头”之类的怒吼,在这种氛围之下“文字狱”自然十分盛行。所谓“搞专案”就是要把你的祖宗八代都查个遍,凡你说过和写过的只言片语都要拿来仔细地推考联想一番。像是《水浒》中从屏风后闪出个通判黄文炳,来解读宋江的反诗一样,这个“黄蕨”的名字肯定是触动了某些趋炎附势者的神经,于是也成了“攻击污蔑江青同志”的重大罪证而被上报邀功。看来,妈妈的《贵宾》是被逮个正着,接着又“顺藤摸瓜”,来抓爸爸的《客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妈妈的交代检查中也要回答“造反派”关于“黄蕨女士”的问题。可以想象,爸爸也是一定要被迫交代从《客人》到《贵宾》这样“夫唱妇随”的“反党罪行”了。难怪爸爸被隔离之后,“仅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个月,就对他进行了三十一法西斯式的审讯”。

爸爸和妈妈双双被诬陷为“叛徒”,最终一死一残的悲惨命运,已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事了。

《贵宾》是1949年1月1日发表在香港的《小说》月刊2卷1期上。这篇小说实际上是由主

编茅盾促成的,在一次编委会上,茅盾提议写幻想小说,想象全国解放之后,人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是“势不可当”、“指日可待”的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的确,在一个社会中,生活总有一定的次序,人们也有着各得其所的位置。但是,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特别是政权的更替,这种固有的社会关系就会被打乱了。社会分配关系和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剧烈变化,会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这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也是可以被预见的现象。

文学上“典型”的创造是一个抽象和具体化的过程,因此,文学不仅可以正确地反映现实,它也具有预见未来的功能。爸爸妈妈在旧时代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接触和了解了各式各样的人物,颇有些阅历和经验。从爸爸的《客人》“黄蕨女士”到妈妈的《贵宾》“陆锦霞会长”,都是作者对社会上常见的一些类似人物所做的概括和集中。我们知道,一个成功的“典型”往往会引来无数的“对号入座”:这句话是在影射某人,那句话又是在暗示什么,以及对人物的身份或原型作各种猜测和联想,等等。但是我认为,作品的原意却是要强调,即使是革命队伍里的成员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尽管也参加过一些革命工作,也有了相当的地位和身份,但他们旧有的思想作风总是同新时代、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小说《贵宾》有着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要人们警惕这样一种高踞于人民头上的人物,他们“没吃过苦”,“白享革命的福啊!”

历史像是“大江东去”浪淘沙。江青在文革中的兴亡证明她实际上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典型,人们从她的过去是不难想象她日后的行为。我相信茅盾和《小说》月刊的编辑们,包括楼适夷、巴人、叶以群、孟超、蒋牧良和周而复等人,是看过这篇小说稿子,并同意刊登的。那时国统区的作家们并没有后来那么多的顾忌。如果说,《客人》攻击江青还有些“牵强附会”,那么《贵宾》则实在难脱干系。不过历史证明,父母并没有看错江青这一类人的为人本性。从抗战后的重庆到解放前的香港,当时进步的文化界私下对江青究竟如何议论?母亲为何会有如此大胆尖锐的影射之作?因

同时代人多已作古,已很难得知。我们现在所能说的只是,我的父母的确写过这样两篇小说,也的确因此在“文化革命”中被认为是“恶毒攻击江青”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妈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集了包括《贵宾》在内的十二篇旧作,由老作家骆宾基作序。该集并附有鲁迅1933年底为她的第一个小说集《总退却》所作的序言、茅盾1937年对妈妈小说所作的评论文章《〈窑场〉及其他》,以及妈妈自己于1948年写的《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一文。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三十年代的文学和作家无疑是有价值的。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由于作者的上述遭遇,小说集便以《贵宾》题名。

2007年当我回忆这些历史时,又找出这本集子,重读《贵宾》这一篇。使我吃惊的是,我竟找不到关于“毛主席夫人”的那些对话,而我明明记得唐弢的确指给我看过的。这使我一度陷入混乱,难道那都是梦境?是我的杜撰不成?

幸好,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里曾查到收藏有我父母的一些原版小说集,也做了些复印件,其中便有葛琴的《结亲》,那是1949年7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印行的。我在里面找到了《贵宾》一文,末尾标明它是1948年12月稿,其内容与我的记忆一致。

对比这两个版本的《贵宾》,我发现它们在文字上有相当的出入,所有敏感的字句都被删改了,但小说基本内容未变。最近从家姐处得知,全国解放后母亲自己对《贵宾》一文用毛笔做过仔细的修改,可能是准备出版集子用。我不清楚这是哪一年的事,但可以想象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与1948年的香港已是截然不同了,这样的“直言不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母亲必须把“冒犯”之处改掉才可能出版。这正如战争年代的师哲在报销问题上敢于发火,“仗义执言”直接顶撞江青,而解放后就不大可能这样做了。不过,据我所知,解放后母亲就没有再出版过旧作,此事一定是搁下了。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贵宾》时是根据这份改稿来排印的。据我猜想,当时很可能还是顾忌领袖声望的缘故,没有敢取用“更大胆的”原版。

(责任编辑 萧 徐)



# 艺术使我们如何面对苦难

——读画家张鉴墙系列油画《上访信》有感

● 高全喜

近来,北京宋庄画家村的青年画家张鉴墙创作的系列油画《上访信》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没有想到,在中国现代派新潮艺术的重镇,竟然产生出这样一种接续传统现实主义精神的架上作品。张鉴墙的《上访信》使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浮现出来:艺术使我们如何面对苦难?

说起来中西方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从来都是把面对生活、投入生活、提升生活视为自己的创作理念,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伟大的经典作品。但是,随着现代派艺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在中国现代语境下与后现代艺术的合流,使得上述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艺术问题,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进而退出来中国当代主流艺术的领域。当今的画家们纷纷以追捧现代和后现代思潮为时尚,以刻意挖掘和咀嚼自我的个性欲望为能事,甚至为此不惜扭曲社会与自我的真实面相。在这样一个缺乏宏大叙事的嬉皮玩世的现代艺术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苦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和遗弃。所以,张鉴墙的这个系列组画《上访信》甫一问世,便以其敏锐的触角、冷静的沉思和质朴的画面,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它表明中国的新一代现代艺术家们开始有能力突破自我,走向社会和民众,面对真实的人间生活。

古往今来的艺术经验告诉我们,最能震撼人的艺术并不是那种看似华美风光的艺术,也不是那种自我独尊的艺术,更不是那种远离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所谓“无我之境”,真正震撼人的是那种能够穿透人类生活苦难的艺术。欣赏张鉴墙的《上访信》,我感到他们这一批年轻的现代派画家,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即成长于“85”和“89”美术新潮的现代派画家,超越了

那种以决裂的姿态对抗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画家和波普主义画家。张鉴墙他们能够冷静地面对传统,理性地审视自我,以平等的视角切入到中国现实生活场景之中,与他们描绘的客体物象共同分享着这个生活世界的艰难、无助,甚至苦难,并且通过现代艺术的技艺,把它们表现出来。我曾经把这种基于新的文化批判立场的艺术形态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现代艺术与传统现实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种现实的现代主义。

谁都知道,信访问题在中国不单纯是一个社会信息的民意反馈,而是一部中国社会政治与民情的浓缩历史,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方方面面,其中隐含着说不尽的政治机制的扭曲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张鉴墙基于朴素的生活经历,以其艺术家的独特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信访这个从未被中国画家们收入“法眼”的卑微物象,实际上承载着百年中国的历史宿命。据张鉴墙自己的述说,当他从同住在宋庄画家村的社会学家于建嵘那里借来近百份上访信时,他感到自己的那双手是颤抖的,他知道其中的每一封信都埋藏着一个悲惨的故事,甚至悬挂着一条冤屈的生命。其实对于这些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它们随时随地地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亲朋好友身上,甚至我们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受访者。所以,在感同身受地阅读了于建嵘提供的上访信之后,张鉴墙并没有刻意去表现上访信中的各种各样令人荡气回肠、惨不忍睹的故事,以及其中的情节与人物,而是采取了自己创作实践中的一贯的减法原则,用最简单、朴实、近乎白描的手法,把四十余封表面样态大体一致的信封展示出来,这样就构成了他近来的这个名为《上访信》的系列

油画。

初看下来,张鉴墙这组油画的艺术成色不是太高,不过是一些近乎重复的上访信的复制,色彩简陋,质地粗糙,结构平淡,感情松懈,单纯从艺术形式和绘画技巧来说,很多画家都具备这样的看家功夫。四十余幅系列组画中的大部分物象,有很大的雷同,是人们常见的几种寄信用的信封,如白色的、牛皮黄的,在文具店和邮局随手可以买到的信封,其外还有几幅挂号的航空快递的专用信封。

但如果稍加仔细地审看张鉴墙的这组作品,你会发现,这些近乎雷同的上访信封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最令我震惊的是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地址、收件人姓名和发件人地址。按说上访信的邮递单位和收件人应该是国家各级政府的相关信访单位和工作人员,这些信件没有一封是寄给他们的,而是寄给了几个按照常规不应该接收这些上访信的单位和个人。他们是:“北京西城区府右大街中南海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胡锦涛收”、“北京市西城区府右大街中南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温家宝收”、“北京市西交民巷23号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吴邦国收”、“北京市复兴路乙11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收”、“北京市复兴路11号中央电视台敬一丹收”、“北京这个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于建嵘收”……再看发件者的地址,几乎覆盖了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尤其是一些欠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他们是:“辽宁营口市射线仪器厂”、“贵州省镇守自治县城关镇北关村农民高大兴缄”、“山西省大同县聚乐乡塔儿村”、“北京南站上访村冤民临时代言人”……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这些不该投递的信件,有事找中央,找总书记,找总理,这是中国上访者的真实呼声,而且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各大报刊杂志都曾经多次隆重报道了总理直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所以,上访信的几乎所有收件地址和收件人无非是上述的中国党政部门的最高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以及电视新闻单位,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其实是中国的特殊政治本性,对此即便是广大下层的中国人民也都知道这个理。

令我深思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上述这个理

的深层政治逻辑,这些则是广大的上访者远没有意识到的。我们看张鉴墙这组作品中的那些真实的通过公共邮政体系寄出的上访信,它们填写的通信地址很多是不规范的,有的缺准确的街道名牌号码,有的缺具体的接收单位,有的缺明确的收件人(只是写负责人收),而且邮政编码几乎全都是错误的,或者干脆空缺没写,大多写的是抽象、笼统的投递单位,诸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中央电视台等等,唯一很清楚的是收件人,即几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这些上访信按照现行的高度科技化的中国邮政运营体系,它们是根本无法投递到收件人手中的,而且即便是几件按照现行的邮政体系的规范要求的合格的信件,它们也不可能如愿地投递到收件人手中。因为,中国的政治运行体制并非公共化的体制,通过上访信的邮政体系也无法走通中国的政治之路的,我们的政治编码不是公开的邮政编码,而是至上而下的秘密编码,虽然偶然也有隆重的报道说是我们的总理替农民工讨了个说法,我们的省长为某个案子的无辜者申了冤屈,但那不是农民工、含冤者至下而上上访的结果,而是另外一套政治逻辑的结果。

当然,张鉴墙是一个画家,他未必懂得中国的政治,也未必像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那样了解上访信的政治与社会的深刻蕴含,但是他有艺术家的敏感和现代艺术赋予他的节制。他清楚地知道手中的上访信不是一件可以肆意发挥的东西,他也没有理论家、思想家那样的能力去剖析其中的密码,他说他所能所做的,不过是把上访信这个理论家们视为中国政治的黑洞的物象以一种系列组画的形式,原封不动地展现出来。在此,他不去发挥,不加图解,也不包含满腔的同情或义愤填膺的批判,只是如实地、冷静地、审慎地,但力求准确地把从于建嵘教授那里借来的各种各样的上访信勾勒赋形。对于那些诸如收件地址、收件人等等的隐含意义,以及每封上访信背后的故事,只能留给观众去体会、感受和挖掘。

本文不是旨在阐释张鉴墙作品的社会政治学意义,而是艺术评论,我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系列油画作品,张鉴墙创作的《上访信》在艺术上有哪些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意义。我们看到,张鉴

墙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但他并不信奉所谓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以及时代精神等那些传统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用写实主义的技巧构建他的艺术主题。他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不具有任何典型性的真实而苦难的生活图景。在此,艺术家的立场是冷静的、有距离的和中立的,没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寓意传情,文以载道,更没有主观精神的自以为是的积极投入和立场正确的鞭策批判。就这个创作倾向来说,张鉴墙毋宁属于现代派的画家,他对传统现实主义对于现实的体认是持质疑态度的。但是,张鉴墙的这组画又不属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的谱系,因为它没有丝毫的对于现实生活的挖苦、扭曲和虚无主义的宣泄,在冷静的白描中渗透着真诚,在理性的节制里潜伏着情感,在单调的图式下隐含着张力。

我认为张鉴墙所代表的这一批新的现代派画家,他们是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和当下现代派艺术的双重的超越,属于新的现实主义,或者说现实的现代主义。他们知道艺术的限度和边界,也

(上接 77 页)说师东兵的书违背历史常识之处如何不胜枚举,仅仅指出一点——不合理想象固然不是历史,合理想象就能是历史吗?

历史研究是一门严肃的追寻历史证据的学术活动,“事必务真,言必务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绝不能够任意添枝加叶。这与“合理想象”的纪实文学是大相径庭的两码事儿。历史科学是复原历史的科学,需要做大量的考证功夫发掘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求得事实真相,丰富我们的人文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讲,“以粗不宜细”是政治,但决不是历史研究。纪实文学中描写的那些床帷密语,暗室私话,心理活动,都是无迹可寻的事情,尽管栩栩如生,生动可人,但决不可能是事实。这种作者向壁虚构得来的东西,即便“想象”的再合理也

(上接 86 页)但国际红十字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在李、戈冲突 40 年后的 1904 年,已开始被民间和官方接受。在这几十年中,中国逐渐抛弃、改变了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接受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李、戈冲突固然是中西观念冲突,但“地域性”的中、西冲突背后,其实是“时间性”的某些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是“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冲突。

知道自我的缺憾与不足,因此,对于社会生活,尤其是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生活,他们意识到是没有资格以艺术家的眼光来加以俯视的,更没有能力去加以正确的阐释和批判的;审慎地保持一定的距离,用平等的姿态展现出来,就实属不易了。人民的生活苦难已经足够沉重,艺术家不能再以所谓艺术的说辞而对苦难的生活给予另外一种“艺术”的伤害。张鉴墙的这个艺术原则,在我看来,是对于他过去的减法原则的提升。《上访信》系列油画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则,而具有了历史的活化石的意义。面对苦难,他的艺术所教给我们的不是理论家们的一些分析性的逻辑和结论,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所传递给我们的鼓动性的激情,或现代派艺术、后现代艺术所宣泄的个人主义的偏见,而是艺术节制下的广阔的视觉和思想的空间,让每个人都能寻找到各自的自我。在中国的大地上,苦难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不是克服苦难的法宝,它们只是苦难的记忆。

(责任编辑 萧 徐)

是“想象”,好听点说是历史演义,严重点说就是编造历史,根本谈不上历史研究。

如果说,师东兵这类纪实东西在没有知识的一般民众中还能有些市场,能够契合他们的知情心理,这还是有情可原的。可以说,只要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能正常开展,必然是三国演义压倒三国志。但是,作为一个号称研究党史的专业人士,能说出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来,可真是让学界瞠目结舌了。能发表出这番“合理想象”的言论,只能说明这位教授的“以粗不宜细”的水平。既然有其敢于信口开河的胆气,那也只能是在这位知名学者的名号前,再添加上一个“伪”字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今日世界,无论情势所迫有再多“杀俘”、“杀降”的理由,任何政权已不敢公开“杀俘”“杀降”,不敢公开为这种行为辩护。无论何国,只要“虐俘”消息传出,更不必说“杀俘”、“杀降”,便会遭到举世谴责,说明给战俘人道待遇的价值观念,已成“公例”,成为人所公认的普适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萧 徐)



#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 雷 颐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季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

苏州太平军守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领导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屡攻不下,而且伤亡不小,李鸿章明白如果强攻将会付出更大代价,而且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于是,他决定“智取”,策反太平军守将。在谭绍光领导之下守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这“四大天将”,他们控制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却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常胜军首领戈登(Gordon, Charles George)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原就是熟人。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

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个降将。据记载,正当这八名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怀希望的接受红顶花翎时,埋伏在帐的武弁立斩八人之头!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而南京以上口音者则“不分良莠尽杀”,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为降将作保,于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 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Brown, Major-General)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调遣的问题,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同时对李鸿章大发雷霆,指其背信弃义,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则以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指责干涉,针锋相对回答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伯郎只得“一怒而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

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面对洋人的严厉指责,李鸿章毕竟有些慌乱,他在给朝廷的几次奏折中辩解说,如此杀降是因为叛变“诸王未理发,叛逆显然”,“挟制要求,不肯散其众,硬请保为总兵副将官职”,“降众多达二十万,难以安置”等理由,表示“臣思受降与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其实,根本就没有“降酋”谋反的任何迹象,而是他仅仅担心难以控制,就采取如此残酷手段。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复苏州折》中就明言“该酋等久在贼中为大头目,狼子野心,恐其难制”,所以要采取措施“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巩其难制”此四字是他杀降的真实动机,仅因其“恐”,数万人生命便化为乌有!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洋洋得意地说,这次“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亦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愜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将戈登反对杀降的原因归结于他先将常胜军调回昆山、未让其攻入苏州,戈登因此心怀不满、故意找碴,并强调“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并向朝廷表示此时的淮军已不是初抵上海的初创之师,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对戈登的“屡称对仗”他“亦不甚惧怯也”。最后,他以退为进,说如果因此破坏“中外和好”大局,“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

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攻克苏州,戈登的“常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论功行赏当然不能少了他这一份,即赏银一万两、稍加变通的仿照外国奖章的“头等功牌”。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发生了“杀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朝廷的赏赐,并在给他赏赐银两的皇帝诏令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同时,他还拒收李鸿章先前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拒受朝廷赏赐,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对堂堂华夏“礼仪”

的老大不敬。几个月后攻下常州,“常胜军”遣散,戈登准备回国,经过赫德(Hart, Sir Robert)的调解,戈登最后接受了朝廷赏赐他的名誉提督衔、几套华服、奖旗、奖章和最高荣誉的象征——黄马褂,但仍拒收赏银。

李鸿章确实没想到洋人对“杀降”如此大动肝火,在他看来,这只是“稍可自娱”的小事。中国虽有“杀降不祥”之说,但现实政治、战争传统更加讲求的是“势”与“术”。因此,中国历史上不乏“杀降”之事:战国末期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当时关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对手赵国,也给其他关东诸侯国以极大的震慑。秦末群雄并起,项羽在入咸阳之前害怕秦将章邯部下投降过来的20万秦军谋反,在新安把这20万降卒全部活埋。有此传统,所以清廷和理学家曾国藩都不认为李鸿章的杀降有何不妥,反而赞赏有加。

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要改变,此次李、戈严重冲突,即是传统即将改变的先兆。戈登乃一介武夫,且是要钱不要命的雇佣军头目,却对“雇主”的杀降万难接受,说明这种价值观念在西方此时已较为普遍,因此,这种价值观念制度化的红十字会组织才可能成立。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李、戈为杀降激烈冲突的1863年,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在这一年首倡创立红十字会的国际会议,第二年8月,正式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12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和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上述公约曾于1906年和192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不仅不能“杀降”,而且不能“杀俘”,甚至不能“虐俘”。1904年3月,中国先后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6月末,清政府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作为会员国,取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的资格。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红十字协会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下转84页)

# 我 的 一 段 回 忆

编辑同志：

我读了贵刊 2009 年 7 月号上刘济生写的《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一文，其中第四部分有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 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 1981 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人物有 44 人被处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的“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

这段文字勾起了我 40 多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工作在东北边陲的一座煤城，这里的政治神经并不敏感，可就是在这里，于 1968 年 7 月 2 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大街的醒目处，有人张贴蜡纸钢板油印的传单，贴传单者自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其内容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大学停办。并引经据典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动人们抵制这个运动。这在当时，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弄得人们如临大敌，当时被定为“6872”重大反革命案件，限期破获。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于是，就由造反派们负责地毯式的排查，各单位、机关、学校、街道都掀起了揭发检举高潮，人人都必须说明白，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还好，毛泽东思想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几天案件就宣布告破。人们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并更加证明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搞“文化大革命”十分必要。

原来，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几个工人和

几个学生组成，其主犯为马俊发、王成福（工人），成员有卢雪玲（马之妻）、吕守福、程佳生（66 届高中毕业生）、马俊生（马俊发之弟）、闫胜官（矿工）、李国志、宋永安（中学生）等十多人。其中马俊发、程佳生、卢雪玲、吕守福等人贴完传单后自知罪责难逃，便从密山国境线越境逃往前苏联。据宣判时称，苏联还为他们提供了电台，让他们在电台上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实属十恶不赦。后经我国外交途径交涉，苏联将马俊发、卢雪玲等递解回国，但留下了吕守福和程佳生。在国内的当然都一一抓捕归案。

全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马俊发、王成福、卢雪玲、闫胜官、李国志、宋永安等六人被判死刑（军管会首长宣判），当场枪决。卢雪玲时值预产期，即将分娩。宋永安只有十六岁。马俊生等人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

时过一年左右，程佳生潜回国内，据说是受苏联派遣充当苏修特务，一入境便被抓获，当然死罪难逃，枪毙了事。至此，这个小组只有吕守福一人逍遥法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马俊生等人均被释放，并都安排了工作。死者平反与否，因未公布，不得而知。

还有余音需说明一下，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到处招商引资，吕守福从俄罗斯回国探亲，据说是他在俄罗斯娶了一个俄罗斯女人为妻，并当上了一个皮革厂的厂长。回来时市政府曾设宴款待。昔日死囚犯，今日座上宾，因祸得福，让人嗟叹。

我写此信的目的是借贵刊一角，让那几个游魂的名字留下一点痕迹，也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他们是普通人，也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此文如有不实之处，愿负全责。

黑龙江读者 任振邦





个人文集  
家史传记！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

出版范围

一、出版个人、家庭著作：

1. 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2. 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个人文章合集。
3. 思想、学术著作，旧文结集、旧书翻印等。

二、传承家族历史、文化：

1. 家庭诗文集、书画集，家史档案、家庭照片书。
2. 家族大事记、先贤传，家谱族谱、家族纪念册。
3. 制做“传家宝盒”：家史文集、纪念画册、影音光碟。

服务流程

作者来说明打算→出版专员寄送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出版附赠光盘，需录音摄像另商）。

出版说明

一般标准：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  
基本价格：200页出版50本两千元，300页50本三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特别说明：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协商安排。

欢迎代理组稿

《个人出书网》《老人出书网》《家族出书网》自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干部、老教授与各地民间作者的由衷喜爱，每月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家史传记50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们计划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愿与有地方或行业组稿资源与出版能力者洽商合作。

出版服务专员热线：010—68920114 68920182

时代文化出版机构：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五号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507室 邮编100089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老人出书网）（www.l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长途免费咨询电话  
400 633 2311

# 欢迎订阅2010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

**“右派”省长沙文汉**

**周恩来秘会左尔格**

**公民教育三人谈**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